

目 录

-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萨拉齐——访当年大青山抗日
游击队老队员陈顺同志……陈顺口述、李维章整理（1）
- 绥远省乡村指导员的培训和解散
白星桥口述、董文华整理……………（9）
- 日寇在萨拉齐的暴行
刘绍仁供稿、李维章整理……………（13）
- 抗日时期在毛岱乡散传单的回忆……………宋 玉（23）
- 抗战时期国民党萨县游击县政府始末……………程景华（29）
- 水洞沟门水利制度今昔
郭汉、王之业供稿、王怀瑾整理……………（31）
- 民生渠的变迁……………土 夫（34）
- 萨县种植鸦片及其恶果……………刘绍仁供稿、李维章整理（38）
- 对昔日货币的浅谈……………李巨才（43）
- 萨拉齐的饮食行业……………张静安（46）
- 土右旗的铺沙西瓜……………张静安（71）
- 土右旗有一条重要古道……………刘文信（78）
- 浅谈二人台的形成与发展……………张 毅（84）
- 旧话新叙萨县的人材……………李维章（93）
- 略谈萨拉齐庙宇古迹……………葛子英供稿、王怀瑾整理（107）
- 萨拉齐街巷取名由来……………葛子英供稿、王怀瑾整理（112）

百灵庙暴动的领头人——云继先.....	土 夫(117)
王经雨传.....	史银堂(121)
晋梅五.....	云呈玉回忆、董文华整理(144)
内蒙二人台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全同志纪实.....	李 微(147)
记一生多难的贾海峰先生.....	吕 贵(171)
两包草药除百忧、一根银针解千疾——记萨 拉齐著名中医大夫董贵.....	葛子英(184)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萨拉齐

——访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老队员 陈顺同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四省。国民党独裁统治者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察绥相继失守，萨拉齐也被日本占领，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老队员陈顺同志曾亲身经历这一时期，以下情况是根据陈顺同志的口述整理成的。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表面上高唱什么“抗日救国”，实际是组织力量，加强防共。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伪绥远省政府从各中等学校的高中学生和地富子弟中招收了一批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安排到各县乡村任“乡村指导员”。它的主要任务是：抽时集中农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并且灌输防共论调，教学唱反共歌曲。记得有这样支歌，歌词内容是：“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富农要觉悟，贫农要知道，共产党来了一齐都糟糕。共产党骗人的法子高，土地给人买人好，等到收粮食，他要全拿跑，先甜后苦众人吃不了”。

国民党绥远省政府连续培训了三批壮丁，他们大部是地富子弟，毕业后都回到各自村里，加强组织反共力量。

日寇侵占东北四省后，利用东北地区的一些坏人，以经商作掩护，潜来绥远省各地，给日本人通风报信，送情报。当时萨拉齐县城内（就是现在的新华书店靠西）有一个坐南朝北，招牌很亮的洋货庄叫“大生源”。里面全是一伙东北商人，其中有个叫曹合年的就是日寇的特务头子。这个据点就在国民党萨县政府警察局的眼皮底下，但无人过问。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仍是宣传动员老百姓防共反共。1937年3月份，萨县县长于纯斋亲自出马，到各大村庄召集青壮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惨无人道，说什么共产共妻。记得当时我曾同本村的青年去苏卜盖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大会，并听过于纯斋的讲话。

1937年9月末，日军侵占了绥远省接着萨拉齐也沦为敌手。从此，“大生源”洋货庄的这一伙东北商人摇身一变都成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处处为日寇效劳，残害老百姓。同时这伙人也都成为当时日伪政权的重要人物了。日军进入萨拉齐县城后，穿城而过，只留下少数人组织维持会，建立伪萨县政府。这年冬天，县城外十分混乱，尤其是县城里，有时不知什么原因，四个城门紧闭，鬼子兵不准老百姓出入城门。城里有财产的人恐慌万状，度日如年。当时不仅可能丢掉财产，就是连性命也很难得到保证。如美岱召村康全朝的儿子，在本村保甲团服务，日军去了该村，不知是何原因，将他捆上就走，一直没有下落。当时人们都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王经雨家紧靠着美岱召火车站，他常到我家里来。听他说，他不准备继续种地了，想找个时机去做抗日救亡工作，为的是能有一条光明的出路。他说：“大家只要组织起来，同心同德，做抗日工作，才是中国人民的一条根本出路”。从那

时起他四出活动，整日不在家。

日寇占领了绥、包之后，为了保证这段铁路线的畅通无阻，在沿线每个车站都驻有二三十个鬼子兵。这些鬼子兵白天三五成群到附近的村庄乱窜，侮辱妇女。到了晚上，他们向各村庄乱打机枪。搞得农民不能安心生活。有财产的人家，都迁到别的地方去住，就连在铁路工作人员的家属也不能在车站居住。当时农村很乱，老百姓受各种势力的压迫真是一言难尽。首先是日本鬼子，其次是日伪军李守信的骑兵，人们称“二日本”。“二日本”行军路过各村，不论打间住夜，一进村就要男人给他们溜马，他们则在村里乱窜，人马吃喝都得向农民要，稍有怠慢，便遭毒打。因此，老百姓自发地反抗事件也时有发生。如：纳太村去了几个敌人的骑兵，因残酷压迫当地老百姓，被该村的刘格父子缴枪后杀死。后来，刘格父子二人带上敌人的枪、马，加入了郭长青的部队。又如：在美岱召镇瓦窖村，去了几个敌人的骑兵在村里乱窜，也被村民马标小、焦满好缴枪后杀掉。以后也加入郭长青部队。还有古雁村同样也有类似反抗敌人的事例发生。

在那个时代，老百姓除受日本鬼子、汉奸、特务的压迫外，还得受当时萨拉齐沦陷后留下的残兵败将的践踏。如当时的郭长青之流，经常在城周围摸来摸去。白天不知躲到哪里，一到晚上就到各村乱窜，向农民要吃要喝。农民的牲畜常常被他们强行“借”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当时郭长青家住六道坝村，其队伍后改编为“抗日自卫军”，属“绥远省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于存灏领导。郭长青任师长，参谋长是史宜亭。同年冬天，日本人放弃城外，在县城里先成立了维持会，稍微稳住脚跟后，便开始建立伪萨县政府，下设各种机构。当时

“大生源”洋货庄的那伙东北商人都被安排到日本人的内部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和伪警察署当了署长。曹合年留到县城里的特务机关成了头目。

1938年初，日寇在萨县城里稍取得了些秩序后，便开始组织各伪行政机关，将原来的四区改为四署，设在何家圈村。署长就是“大生源”的一个东北商人，姓元，人们称呼其为元署长。指导官是日本人村田。当时苏卜盖村被改为协理乡，沙兵崖村的成士全动员美岱召村的刘温当了协理乡乡长。成又动员该村村民裴德当了日伪四署的自卫团总团长。日本人利用裴德把四署地区的土匪收编为日伪自卫团。张老猫，赵明亮部改编为第一团。张老猫驻防沙图沟村，赵明亮驻防美岱召村。王经雨1938年改名为王生民参加了赵明亮部，给赵部当文书。当时管大咀、陈老卜部被改为日伪第二团。管大咀驻防苏卜盖村，陈老卜驻防东老丈营村。沿山地区大股土匪都被改编为日伪自卫军，当时萨县和绥远省留下的一些地方绅士和散兵游勇都躲藏在武川西南地带的大山里，人数很多，后来被国民党改编为“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名为抗日，实际上是欺压老百姓，这些自卫军之间也互不干涉，谁也管不了谁。37年——38年：这伙自卫军因人马供给都向当地农民摊派，致使当地农民无力承担，最后弄得兵无粮自散。虽然还留下些人保存下来，但人数不多。据我知道，有毛招财、韩二宏、鄂友山等。当时郭长青部都过了黄河南。但趁机过黄河北岸进行骚扰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第一批做日伪军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沙图沟。不久，于原跟张老猫联系起来，张老猫虽然是土匪并投降了日军，但他就不拥护日本军，也不给日军出力办事。当时于原住在沙图沟村，

穿着日伪自卫团的服装，出入很方便。他白不知去向，晚上回到村里印发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到处散发，后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年冬末，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刘启焕同志来到美岱召村和王经雨同志联系起来。时间不久，王弼承同志也来到该村，三人同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会员，当时组织很机密，工作十分顺利。为什么能够这样呢？首先，日伪自卫团的裴德和张老猫拥护八路军；其次，共产党开展新的地区工作方式方法和指导思想对头；再次，三位领导同志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地宣传工作。尤其是刘启焕、王弼承两位同志在美岱召村对群众工作做得相当深入群众很信任。有一次，日本鬼子兵、汉奸、特务把美岱召村包围起来，挨门逐户搜查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当时王弼承同志就在村中，恰好正遇的村里一家老人去世，儿子们穿了孝衣孝裤去给娘舅家磕头报丧。村里群众就让这家儿子把孝衣脱下，让王弼承穿上并送其顺利出村。由于王经雨同志在日伪自卫团熟悉情况，而且掌握的很好，便利了党的工作人员的活动。仅一年多的时间，美岱召、美岱桥、沙图沟、河子村就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武装游击除奸小组，并且到其他村庄开展活动。日伪萨县政府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人员，到了美岱召村后有来无回。从此，日伪机关对美岱召村十分注视。由于管大咀是靠近日本人的，因此当接到命令后立即率他的部下进城接受整训，而张老猫及其部下则不愿进城受训（张本人是拥护八路军工作人员的），对此设法搪塞过去了（我们离退休的干部田恩旺同志能作证明）。

为什么当时我们的抗日游击队能够在美岱召村建立起来呢？因与裴德、张老猫也有一些关系。当时日伪自卫团和张老

猫团一调走，王经雨就离开了自卫团。他和王弼承同志早就有建立游击队的想法，在除奸小组的基础上，逐渐扩大队伍，武器来源就地取材，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细致的工作。刘玉贵从他们村保甲团里给抗日游击队拿出武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拿。后来游击队壮大了，仅美岱召、美岱桥两村就拿出二十支步枪。东老丈营、苏卜盖村又拿出十多支步枪，共计三十多支枪。不到两个月抗日游击队发展成70多名。当时，杨思华同志、王经雨同志担任游击队长。上级对萨县游击队很重视，大青山的八路军最高领导人白如冰同志，经常来游击队视察工作。靳崇智同志常住游击队给予指导并和游击队一起外出活动，跟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三县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从一九三九年后半年起至一九四三年四月止，对牵制敌人起了很重要作用。日本鬼子每年至少四次派兵进攻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特别在春耕、夏锄、秋收季节是比较有规律的。

一九四三年初，萨县游击队和鄂友山部发生了摩擦，因游击队人数少，于是上级决定暂时放弃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萨县游击队一走，国民党的军队就逐步增加，但他们不是对付敌人，消灭敌人，而是欺压人民群众。万家沟刘龙正、二德子是王有功的部下，他们的队伍人数很多。一九四三年秋，把驻扎在美岱召车站的日本鬼子包围起来，把何家圪塔警察署也包围了，这种机会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消灭敌人，而是把何家圪塔村的骡马抢了个精光。

一九四四年冬，鄂友山派魏结卡的部队进驻古雁沟红坝村。当时魏的军队向巧尔气村要下些粮食，因时值冬季，寒气袭人，农民衣不蔽体，没有按时把粮食送到。这下可惹恼了魏结卡，于是他就率部凶神恶煞般地开进了巧尔气村。该村保甲

团员李三挠见状，开枪就打，魏的军队遭到突然袭击，难以入村。魏结卡便老羞成怒进行疯狂的反击，见人就开枪。一刹时，巧尔气村喊声四起，死尸遍地，笼上了一层白色恐怖的阴影。沙图沟村有个叫武旺士的青年，当时因随带刚生了小孩的妻子，正住在巧尔气村。他听到枪声后，马上跑了出去，他一个人出去不要紧，这下可使他的妻儿老小遭了殃。魏的军队一进他家就把他的妻子打死，他的岳母也吓死了，孩子也不长时间给冻死了，一家死了三口人。此次，农民共被打死五十余人。

一九四五年初，魏结卡的军队去三间房乡东牛五营村，该村中央赵光耀院内有座大炮台，这里有准格尔旗的一个蒙族兵。他见魏的军队进到这个院子，开枪就打。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不仅他一人被击毙，而且使该村遭到了空前浩劫，有四十余人被魏部打死。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前半年，沙图沟后干沟常住郭长青的部队。他手下有个白连长，这个人狡诈凶残，诡计多端，平时他让部下化装成农民，腰里带上手枪，到处乱抓人。抓回来后就一个一个地拷打，美其名曰：“请财神”。通过拷打，逼要大烟，能多拿大烟的就叫“财神”。沙图沟四队抓回高米换、高大财，大脑包村的赵挨，康卜村的老郭山的儿子和孙子二人。白连长很高兴，因老郭山是财神，于是他让一个士兵专门看管老郭山的儿子。到了夜间，由于疏忽，老郭山的儿子跑了。白连长大发雷霆，臭骂了一顿士兵后，余怒未消，最后决定枪决了几个人，同时还把抓回来的其他人“陪桩”。这下可吓死了高大财，就连老郭山也不敢去看看他的孙子。于是他就托人带了许多大烟去敬供白连长，可托的人却把大烟送到了别的

地方。白连长未看到老郭山的踪影，也没收到给他的大烟，就把他的八岁的孙子立即撇碎了。

抗战八年，郭长青的军队明走暗来，白天住到沙兵崔村后照壁崖、狼窝沟，夜间去村里欺压农民。以后郭长青干脆坐镇黄河南岸全部吞掉抢来的财物。郭手下有个黑干将家住山格架，名叫刘旺宏，一次刘母领着外甥女去三间房走亲家。去了该村一个叫吕掌盖的家里。刘母看见吕的妹妹人样挺好，便向吕的妹妹要了一张照片，当即拿上这张照片渡过黄河献给郭长青，并说若郭有意的话，她可以提亲。两人一拍即合，郭长青表示十分欢喜。于是刘旺宏母亲再次回到三间房，找到吕掌盖的妹妹吕尚迎，提出这门亲事，可吕尚迎说啥也不同意。刘母又渡过黄河与郭长青如此这般说了一番。郭长青又恨又气，便于一九四〇冬率部四五百人，亲自来到三间房村，把吕尚迎抢走了，并强迫成了亲。郭长青年已四十八、九岁，而吕尚迎当时才十七、八岁。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陷入穷途末路。沿山区住了很多国民党军队，他们不是去组织力量消灭日本鬼子，而是欺压残害百姓。当时沿山区一带农村都种大烟，第一茬是日本人要大烟税，第二茬是鄂友山的军队住到美岱召村要大烟税，第三茬便是郭长青的黑干将刘旺宏也要大烟税。三茬大烟税，迫得农民交不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来抵烟税。而老百姓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

陈 顺 口述

李维章 整理

绥远省乡村指导员的培训和解散

白星桥 口述

董文华 整理

我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参加绥远省乡村指导员训练所简称第一期“乡训所”的学员。当时，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兼任所长，我的哥哥白镜潭任副所长，高伯玉任主任（高伯玉、莫斯科大学毕业生，他是阔人石华源的女婿他的思想近乎共产党）。乡训所的教导主任叫李大召。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谋，给第一期学员代军事课。

这一期学员共一百五十人，分十三个组（也叫班、小队），每三个小队有一个指导员，他们是傅作义部下的军官（排长），每一个班内有一个小指导员、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听指导员的指挥，我们学员服从组长、副组长的领导，我是在选的第一组组长。

在训练期间，我们每天六点钟起床，转新旧城跑一圈，一人背着一支枪，一颗手榴弹，一板子子弹。晚上，我们又把枪交回指导员手里。训练所的地点在新城的一家营房内。打靶时，指导员只允许我们学员打三枪。

“乡训所”学员的徽章是一个桃形小章。外表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形态，正中有笔、锄、枪三种图形，表示乡村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抓“三杆子”（笔杆子、锄杆子、枪杆子），笔

杆子抓学校，锄杆子抓生产，枪杆子抓军事。至于我们的培训任务，除上述“三杆子”外，还有“五干精神”（苦干、实干、硬干、快干、穷干）。

“乡训所”的课程除军事训练外，还有政治、文化、自卫，学习时间安排，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至六点。所有课堂中军事讲话多。经济文化课的讲师是北京科学文化学术四大阔人中的梁漱溟的学生（姓名忘记了）。自卫课的内容，是仿照全中国三个自治县的经验，河北定县是自治县的典型，“乡训所”从定县请来一部分讲师，其他两自治县典型没有来人。梁漱溟的学生给我们讲过梁漱溟著的《中国民族最后觉悟》一书，此书约二三寸厚，它是中国的一本巨著，解放前非常盛行，我们在受训期间，除了学员其他人是很难搞到手的。我们的讲义师有赵子威（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生，也是有名的留学生），还有孙福元、张韩清讲师。讲师专门给学员授课，上级首长常来乡训所讲话。傅作义所长经常到所讲话，财政厅厅长冯玺、民政厅长（姓名记不清了），还有某厅的赵镜师，也常来讲话。赵镜师的官职高于其他人。据说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与蒋介石参加过竞选。讲课地点在新城西街的一个厅子房内。

第一期学员总共训练了六个月。毕业时发给毕业证书。我是高小毕业，具有初中文化程度，比起高中程度的学员来，只是学了一知半解，因听课的能力与高中生悬殊较大。我受训时穿过上级发下来的一套制服，每月津贴费十元，全部用在生活上。

我被分配到丰镇县龙胜庄工作。此庄是一个小镇，镇上面设有区。我到任后，主要是辅佐镇长王万营工作。我的职称是

乡导员。

我分管龙胜镇的工作，有三方面：管军事工作，只能在平时指挥一下“保商团”。出门期间能带一两个“护兵”。当“保商团”执行任务时，团内的几十个士兵由班长管理，在维护治安时，我有权调动“保商团”的人，通过下条子，命令他们到城门上站岗。总的来说，我是辅佐地位，只有调配权，没有管属权。

龙胜镇政府和区政府相隔不远，办事人员来镇查访问事，不需要镇政府招待，自区政府改为新政府，区长改为自治指导员后，所有去镇里办事的人统统由自治指导员接待。

管文化教育，只是代理镇立小学校的名誉校长，我曾为学校担任过教员，每月领过八元钱的津贴。

管生产建设，也同管其他一样，只是处于发号施令，催一催，喊一喊，虽说是没有实权，但谁也不敢低估我。

在丰镇县工作期间，关于我们乡村指导员系统，县政府设有一名专职干事，这个县的刘干事是乡村指导员的头目，在指导员中出现了问题后，刘干事先向县长汇报，然后行使他的职权，直接处理乡村指导员出现的问题。

我在丰镇县过了两个大年，那是在民国二十四、五年两年。民国二十六年，我调回萨拉齐县四区美岱召大乡，仍任乡导员。美岱召大乡没有龙胜庄大，但实际工作却比龙胜庄复杂。美岱召大乡的党政财文都得管理，因距离原来四区（当时的自治政府）较远。往来办事人员都得接头，所以这个乡的财政支出比较大。就在我到任美岱召大乡的当年。大乡的帐簿进行了改革（实际上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期乡训所结业后就开始改革）。过去记帐先生记的是流水老帐。从民国二十六年起

司帐记的是新式帐簿，过去记帐无单据，新式帐簿凭单据。簿记法好处多，收有收，支有支，单据就是原始凭证。我在大乡任乡指导员，直接与乡长刘温、副乡长王经雨、赵生财共事。司帐每记一笔帐，不但要通知乡长，而且要通知我。所以单据和帐簿的手续，严格防止过去公开贪污的现象。至于暗地贪污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大乡里的新式帐簿全是由县政府发的，封面盖有县政府的印章。不能随便更换。

大乡里的乡兵共有十几个，排长叫康存米，他送我一支大枪，一支手枪。我有权管属他们，虽然担任着自卫队的名誉队长，但当时社会治安较稳定，没有战争也很少有急事，不必要经常带领自卫队到处巡逻。

我又是美岱召村民校的名誉校长。这个民校规模不大，我也没有去代课，干预的事情也不多。

受大乡管理的村子有的没派村指导员，因此，我与各村村长来往甚少。四区自治指导员李梅与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李梅有权指派村指导员，村指导员有权辅佐村长抓村子里的“三杆子”（笔杆、枪杆、锄杆）。

我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到秋天约七个月的时间，美岱召大乡应事人对我很尊重，专门把大地户董来套的一处院子腾出来让我的家属居住。那年秋天，日本鬼子侵占了绥远一带，萨县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害怕日本鬼子，也看不惯当时的世道。大乡里的应事人也看出我的心事，劝我把家眷搬回萨拉齐，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把女人和孩子们接回萨县县城居住。

美岱召大乡的副乡长王经雨看到我手下有十几个跑乡的兵丁，其中有管大咀、亢保玉。王经雨一心想把我这支武装力量拉出去，上大青山打游击。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那么大的胆

量，没有上山。不久，我的乡兵把枪支都交到区里，我成了“光杆司令”。在我的乡兵没有解散之前，美岱召村的都格勒达的大少爷劝我归属蒙古族的“福厘局”以此保卫自身安全。当时我也没有按大少爷的想法去办，我在美岱召村过了中秋节后，便隐居在萨县城里，我才知道王经雨归了张老猫的日本自卫团，在自卫团当文书。王经雨一没有利用上我的乡兵，二没有利用上老猫自卫团，不久，王经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打日本鬼子。

日寇向西进犯把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追到萨拉齐县一带，和我一同干乡村指导员工作的好友，通知我跟上后期分训所负责人孟文重离开萨县，退居到西面的安全地方。重新组织队伍。当时我不愿意离开本乡田地，与其他乡村指导员一样都隐居了。国民党的萨县县政府以及区政府改为日伪县政府和警察署后，我和萨县的老百姓一样当了亡国奴，老乡们说：我们这一类“五道爷”神像在沦陷区被日本鬼子都“打倒”了。

日寇在萨拉齐的暴行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分兵向平绥西线进犯，察哈尔、绥远、大同相继失守，萨拉齐也在劫难逃。一九三七年十月（民国廿六年九月十三日）这天清晨，日本侵略军大举向萨拉齐县城进攻。天空中机声轧轧，大地上炮声隆隆，机枪声步枪声交织在一起，向萨县城扑来，好像想一口吞噬萨拉齐县城的样子。当时国民党萨县的地方团队早已逃之夭夭了。只有少数留守的东北挺军马占山部，进行

了一番抵抗，因众寡悬殊，随即撤退。日寇的骑兵、汽车兵凶神般地占领了萨县城。尽管当时由萨县商会杨青兰等动员城内老百姓家家悬挂日本国旗和组织人欢迎皇军，而敌人则以烧、杀、宰、割等高压手段来征服中国人。一进城后，便在东门里玉皇庙戏台附近的水坑旁边，屠杀了三十多个中国人，其状惨不忍睹。

沦陷后的萨拉齐，在日寇恐怖政策的笼罩下，山河变色，大地沉吟，人心恐慌不可终日。善良的老百姓成了日本鬼子铁蹄下的亡国奴，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日本侵略军一方面施行其用武力征服手段，另一方面又采取伪善政策。什么“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等欺骗论调，妄图使中国人民屈服它的刺刀下。敌人奸淫虏掠焚杀宰割等残暴行为，在萨拉齐县人民心目中留下了血泪斑斑的罪恶史，罄竹难书。总而言之，一句话，“亡国奴不如丧家狗”。凡是在日寇统治地区居住过的人们，不会忘记它的暴行。现在我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分述于次，供后代人知晓。

汉奸、特务相继露面

话需从头说起，记得在一九三五年秋天（民国二十四年），萨拉齐县城内大北街路西（后迁至大西街现新华书店靠西）新开一个商店叫“大生源”，经营文具、纸张和小孩衣服，钟表等商品。特别是在每年春秋两季各学校开学初，大减价销售商品七天。因此，学生都争购优惠货物，生意显得十分繁荣。原来这个商店的经理姓金，东北人，善于逢迎各方人士，态度谦虚和蔼，人们都感觉到此人是一个善良的买卖人。

过了不久，这家商店在萨拉齐县城内大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书写“仁丹”高标（字体一般大，均为白色），十分醒目；同时又在一些小巷口墙壁书写“老鸱眼药”商标（均为黄色）。当时人们并不为奇，因为这个商店也经销这类药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萨拉齐县城后的不几天，县商会（维持会）组织城内老百姓手拿日本国旗去火车站欢迎第一任萨县的日本顾问佐百宏时，这个“大生源”的掌柜也参与。此后就是这个“大生源”的金掌柜经常出入日伪萨拉齐县公署。不久换上警服，成了警察署长。足登马靴、身配战刀，满口日本语言，什么“八格牙路”，你的、我的，大大的！等情况，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日寇的忠实走狗。以后才明白：“大生源”原来在萨拉齐县城内本街两侧写上的“仁丹”商标表示“通道”。写着“老鸱眼药”字样表示“此巷不通”是为日本侵略军预先设制的“路标”。

日伪在萨县的军事部署和特务组织

日寇侵占萨县城后，首先用武力镇压手段迫使人民在它的统治下服服贴贴地当顺民，做他们的奴隶。当时日本军萨县城防司令片通和齐山司令坐镇萨拉齐。司令部分别驻在后炭市街路北任和卿院内（现在党校）和路南的几个大院内。然后将大东街学校作为营房，又把三道巷的几个院落霸占，形成一个互为防御的碉堡群，把日伪军李守信的骑兵第八、九师分别驻扎在县城附近的村子里往来巡逻。把日伪同盟军何连顺的部队驻扎在吴坝村和二十四顷地乡，又另还驻有日伪军小分队。日伪萨县政府警察科下设五个警察署。第一署设在县城内，第二署设

在二十四顷地，第三署设在沟门（后迁在鄂尔格逊村），第四署设在苏卜盖村，第五署设在美岱召乡。各署以下设有警察分驻所。各署有署长由警尉补担任。分驻所长由巡官担任，每署警察署有警尉补、巡官各二至三人，每署有警长和警士一百二十人左右。警务科的职能超越县政府行政长官之上。县警务科的日本人指导官西尾权力很大，点头应声，说了就算。另外还把招降的土匪郭万旦部一百多人编为“讨伐队”，为其效劳。

当时日军齐山司令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中国人民又组织了一个特务班，设在萨拉齐街公所（萨拉齐镇的行政机构）。收罗了一批青年人参加。所谓的青年有为，而且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实质上都是些认贼作父，甘为敌人效劳的走狗，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的汉奸。

此外还有日本宪兵队更是残暴。当时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宪兵队，真是不寒而栗。它设在萨县城内大西街（现在旗医院）。人们怕宪兵队的残暴行为，上街时不愿从那里走，往往是绕道而行。宪兵队下设一个特务队，有小队长崔根兴、崔喜庆、吴锡田等。崔根兴是崔江的儿子（恶霸地主）。崔江为了拉弄日伪汉奸周喜发（东北人）又和周结拜为异姓弟兄。萨拉齐沦陷后周喜发与宪兵队有秘密关系，特务队成立时，将其义子崔根茂安插在宪兵队当特务小队长。崔根茂依靠日寇的势力，为虎作伥，欺压人民，作恶多端。周喜发又在萨拉齐开了个“协和旅馆”，借宪兵队的靠山进行特务联系。因此，当时在萨县的所有翻译、警官、特务、都得巴结周喜发。周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又与曹全年（系大生源的商人当了警察署特务头目）关系密切。曹负责侦察何家圈一带八路军的情报有功，升了警察第四署署长。这伙民族败类，依靠日寇势力，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

日寇投降前后被国民党鄂友山部在东门外的耶稣堂和沟门乡枪毙，结束了他们的罪恶生涯。

日寇在萨拉齐暴行累累

自萨拉齐沦陷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罪行，真是笔难罄达。

那时萨拉齐县城有五个城门，除西北门被堵塞外，只有东西南北四个门通行，每个城门都有日本兵和伪军把守。在城门楼上设有瞭望哨，城门关闭无固定时间，特别在春、夏季节卡得很严，每日早晨，不论城内外人流进时聚集的很多，等到日上三杆后，敌人才开城门。出入的人首先要向守卫的日本人和日伪军脱帽行九十度鞠躬礼。然后被逐一搜查携带的物品和检查“良民证”。不论你多少东西总得先在递呈“良民证”内夹上纸币表示奉送。然后再将你所带物品留一部分，否则就可能招来灾难。如向敌人行礼时不脱帽或敌人没有看见，就认为你有反蒙抗日的行为，很可能引起大祸临头。罚跪、叫洋狗咬，已是很平常的事了。如果送到宪兵队审查就很难生还。如明沙淖村的王海生做小本生意，因为不满意敌人的强拿物品，竟送到宪兵队先叫洋狗咬，然后严刑拷打，活活致死。类似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凡在萨拉齐城内居住的青年妇女，轻意不敢出门上街，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去，必须藏头掩面，如果被日本人或警察、伪军看见稍有姿色的女人，就会招来灾祸。尤其是日伪李守信的骑兵，经常出入城附近的村庄骚扰，强奸妇女，抢掠财物。老百姓忍气吞声，受敌人的凌辱。纳太村的刘格父子，因

日本兵强奸其家中的女人义愤填膺，于是缴了敌兵的枪支后，并击毙鬼子兵，参加抗日游击队。像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

日伪军警、特务、汉奸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给老百姓发“良民证”。所谓的“良民证”是敌人控制占领区人民的一种毒辣手段，也就是监视人民自由的恶毒办法。且不说领取时手续的复杂。敌人首先将所有居民统一编了号，然后再照像（每人一个号）贴在“良民证”上随身携带，即便是你一天出入城门走二十次，敌人也不厌其烦地检查二十次。有时还要突击抽查，如果丢失“良民证”便会招致杀身之祸。“良民证”又是敌人强拉民夫做苦工的执照。日寇在统治期间，全县人民不论城里城外一律都得去做苦工。所谓“苦力工”，分“大工”和“小工”。“大工”一次数月或半年，“小工”，每天要来。还有什么“勤劳奉士”等工。总之，各种苦工全由老百姓负担。再加上要工人员的盘剥和军、警、宪、特人员的勒索，老百姓实在无可奈何，也不敢反抗。日本侵略者害怕八路军的游击队袭击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抗。如惊弓之鸟，敌人除在萨县伪县公署门侧建筑一特大炮台，直径十米，高十五米，分三层，矗立在的萨拉齐县公署门侧，监视全城人民外，又把城周围附近的小村庄都并入大村，又把成林的树全部砍伐。修公路，修飞机场，都是由征要的“苦力工”去做。特别是沿大青山麓一带的村庄，如李家火盘、三里房子、纳太等村全部拆除变成一片废墟。

一九三八年腊月末，萨拉齐县人民忙忙碌碌准备过大年，可日本宪兵队却更加监视中国人的行动。在这几天，他们把被送到宪兵队监禁的人，进行更残酷审问，除毒打外，灌凉水、灌煤油成了他们绝技。把被灌的人面向上，两手分开捆在板凳

上，头却下垂，口鼻迎上。敌人一手提着一壶凉水，一手将壶咀对准受刑者咀，往肚里灌（水中掺煤油、或辣椒面）。直到肚腹胀大，然后再给消水。另一个敌人站在受刑者的肚皮上用脚使劲地踩，直到受刑的人口、鼻七窍喷射大量水、血来，这样反复几次。据说用这样残酷手段，致死的人难以计其数。日寇除采用上述惨无人道的毒辣手段外，又假惺惺地施行什么“亲善”政策，进行奴化教育。当日寇一进萨拉齐县城后，将学校都变为兵营，学校停办，学生失学。大东街小学迁在旗杆巷一个小院子里，勉强开学。其它的四区小学全部停办，只留下回民小学一所。后来又设立了一所女子小学。所授课程，以日语为主，其他课均为副课。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灌输无条件服从的意旨。所有教师多数是日伪军、警、宪、特头目的阔太太。根本没有真才实学，只知道吃喝玩乐。有才学的中国人教师，都隐藏在家中不能任教。据了解，那时全县城仅有学生三百余名（日伪时期的县志统计数字），农村的小学更是有名无实，根本没有校舍。老百姓谁还有心意送子女入学呢？在学校里，每天早除升日本的太阳旗外，还要做向东方遥拜，表示对大日本天皇陛下崇敬之意。另外他们还编写一些歌曲让学生唱，假惺惺地讲什么“亲善”“友好”“爱国”等……。当时唱的一支歌是《萨拉齐县歌》歌词如下：

“黄河美兮阴山长，民生渠贯在中央。

土地称肥沃，人民熙熙十七万，王道乐土观，道义早发扬”等……。

从日寇的“聚乐部”看侵略者的本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为了腐蚀和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于成纪七三三（1938年）在萨拉齐县城内成立了“聚乐部”，设在萨拉齐县城内的东楼子店院（后迁到太平街东口路南）。

“聚乐部”白天晚上都唱大戏，观众可以不花钱看戏。这是敌人以此作为钓饵。“聚乐部”内设很多赌博场。种类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与其说是“聚乐部”勿宁说成“聚赌场”。

“聚乐部”门前摊贩林立，卖各种食品的很多。人群熙熙攘攘，看起来像个自由自在的极乐世界，实际上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害人坑。爱赌博的人自然会上钩，赌棍们高声吆喝：“一个钱压十宝，十个骡子驮不了”。因此，有一些人就陷入这个罪恶深渊中。不知有多少人输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人输得铤而走险，无家可归；不知有多少人输得难见亲人，自杀身亡。“聚乐部”内设置着赌博种类如“宝摊”，它有高低级之分。所谓高级宝，在压宝时以投放赌注（钱数）之大小而定，最多的不限，最少的起码是五元。低级宝无此限制。此外还有“推牌九”、“赶十眼”、骰宝小摊、翻红黑板等等。去“聚乐部”耍钱的人，如蝇附腥，直至输得净光，才垂头丧气离开赌场，但他们还是回味和惋惜未曾压某“独红”而失败。

所谓的“聚乐部”是敌人杀人不用刀的场所，也是毒害中国人的无底洞。去“聚乐部”除一般老百姓被诱骗外，当时的日伪警察、特务、翻译也常到赌场进行敲诈勒索。这些人去“聚乐部”耍赌时，只能赢不能输，若要输了便大发雷霆。这时

承包宝摊的人，则出面帮腔说话将赢的钱如数奉还，再加上一些表示“敬仪”。否则，就节外生枝，故意寻找麻烦，不得已只好敬鬼神而远之。所谓“聚乐部”是“王道乐土”的美名，实际是残害中国人的陷阱。八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因输了钱而死于非命。如西老丈营村的张三，因出售了大烟后有钱去“聚乐部”压宝，结果将钱如数输光，一年辛苦，付之一旦，一气之下，竟服毒自杀。这仅仅是举一个例子罢了。

侵略军陷入穷途末日而敌人 更加疯狂地杀害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中国已陷入泥潭，深感穷途末日，无力自拔，因此对中国人民进行更疯狂地屠杀。在萨拉齐地区被杀害无辜老百姓骇人听闻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八路军在萨拉齐县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一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而敌人日夜惶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怕八路军。当时有个叫巴老九的，原先在萨县“聚乐部”做杂工，后来被解雇。巴老九很气愤，为了生活，重操旧业，做担挑生意。正值春季黄河解冻时，巴老九挑一担开河鲤鱼进城去卖。他卖完鱼后，同行的人问他，“今天挣多少钱”？巴老九随便伸出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八”说：“爷们今天挣这个”。意思挣八元钱。正巧当时被日伪警务科的指导官看见，他虽然不懂中国话，但知道巴老九所比划的是“八”。他便认为这是“八路军”的秘密标记，疑他是“八路军”。真是胆大妄为，八路军竟敢在白天混进城内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便衣、特务统统的是饭桶。于是紧盯

着巴老九质问：“你的什么”？巴老九回答说：“我的巴老九”。指导官一听是“巴老九”。“巴老九”与“八路军”的发音差不多。于是将巴老九带回警务科，严刑拷问、毒打，结果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

由于巴老九的惨死，吓的人们再不敢用手比“八”的数目。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是何等的害怕八路军啊！

二、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沿大青山的抗日游击不仅在黑夜出入城附近各村庄，白天也乘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而日寇则是望风披靡，豕脱狼奔，内心空虚，惊慌万状。再因敌人派出去的汉奸、特务，让我抗日游击队捉获，罪大恶极的处死。同时京包铁路经常给炸坏，敌人犹如困兽，形成瓮中之鳖。而日本鬼子在萨拉齐的宪兵队更是狗急跳墙，仍作垂死挣扎。宪兵队长阿久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除将原在日伪警察第二署警士史高拴等因其与游击队有通嫌罪名被捕后放在“留置场”外（宪兵队的监狱），还有几名小商贩共十四名都给定了一个“越狱”罪名。于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连夜在宪兵队院内挖了一个大坑，将这些无辜的中国人全部活埋。后来萨拉齐县光复，被杀害者的家属挖坑认领死尸时，所有死者身首分离，断肢缺腿，惨不忍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萨拉齐的暴行由此可见一斑了。

日寇侵占萨拉齐县达八年之久，其间敌人使尽惨绝人寰的暴行：奸淫虏掠，焚杀宰割，无所不用其极。我所记述的，只是挂一漏万，深愿后代人对日寇的暴行铭刻在心里，不可忘怀。

刘绍仁 供稿

李维章 整理

抗日时期在毛岱乡散传单的回憶

宋 玉

日寇侵华，山河破碎，血腥遍野，奸淫烧杀。满目凄凉。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在各地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像利剑一般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号召人民坚决抗日，反对投降。鼓舞民族斗志；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游击队，进行抗税抗粮抗劳工的斗争和收集敌情等活动。

毛岱地处大青山麓和黄河北岸之间，是萨托往来必经之路，因而成为日寇的重要据点。设有警察署、自卫团部，以及日伪乡公所等机构。碉楼林立，岗哨森严，军警遍地，特务横行，汉奸侦缉层层设卡，搜查甚严。

我们毛岱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做好掩护工作，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在村里开了两座豆腐房，分设在东西门的附近，宛如两只炯炯的眼睛盯着敌人。豆腐房经常接触群众，对发生的情况都能及时的掌握。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进行对敌斗争。

我抗日游击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攻据点夺炮楼，英勇机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敌人也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所谓“强化治安”，“集团部落”。拆民房，烧村庄，小村并大村，强迫把人民集中在一起，以便控制在他们的刺刀之下。日寇为了震慑人民，大肆宣扬其“武士道精神”，什么“武运长久，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使中国人民不敢

反抗，服服贴贴地任其蹂躏宰割。日寇除在军事上鼓吹其武力的强大外，还采取了其反革命的两手，软硬兼施，刺刀加笑脸，即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什么“中日亲善，东亚同盟，中日同文同种更要同心，携起手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其王道乐土”等，伪善论调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

我抗日游击队，除在各个交通要道和据点给敌人狠狠地打击外，并配合军事活动，开展了政治攻势，对汉奸进行了分化瓦解工作。

1940年春，上级党组织让任进才同志送来七八种传单，约有五百多份。为了很好地完成任务，支委会做了周密的计划，决定由我和张恩官执行任务。白天不能行动，在晴朗的夜间也不方便。加上夜间伪警察和自卫队，经常三五成群，借查户口为名，出来偷鸡摸狗抢东西，欺压人民。我们又怕遇上这些家伙。如果传单散发在偏僻人少的地方，发挥不了它应有作用。可巧在第二天的下午，天气突变，刮起了大西风，我们抓住这有利的时机，决定晚上行动。首先把传单按种类份数搭配好，又写了十多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狗汉奸卖国贼”的标语等。到夜深人静时，我们带着传单，凭着地理环境熟悉，用敏捷的步伐，很快地到了大街，边走边散，一撒手的传单被风吹的纷纷乱飘。由于这天晚上风大，日伪警察、自卫队都不敢出来，很早就把大门上锁关闭，龟缩在大院和炮楼里边。有的打麻将耍赌，有的躺在炕上吸大烟过瘾，有的哼着淫词小调消遣渡夜。我们走近了警察署的墙脚下，观察了四周的情况，听了里边的动静，只有哨兵躲在炮楼里边，有节奏的喊“口令，谁？干甚的！”瞎诈唬。房顶，围墙上什么都没有。我们俩纵身上了警察署西隔壁屋顶，将传单往高处一扔，像箭一

般的被风吹到警察署和自卫团的院内和房顶上。

传单是十六开和三十二开纸两种，油印的，字迹工整清晰，看起来很清楚。有的上边还印着英雄的抗日游击队，举着大刀砍鬼子头的图像。七八种传单，有告全国同胞书，有骂卖国求荣的汉奸汪精卫，有警告日伪军政人员书，有痛斥鬼子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和鼓舞民族斗志的抗日救亡歌曲等。传单的体裁有诗歌、小调、散文等形式。还采用了民间流行的“叹十声”，“叫大娘”等，旧调新词。其中还有刘启焕同志编写的一首骂汉奸汪精卫的小调：“骂一声汪精卫圪泡杂种，中国人害中国昧了良心。日本人他本是中国的仇敌，他害苦咱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圪泡杂种““““““““。民族的败类，把鬼子当成了你亲生的父亲。卖国求荣，千古罪人，帮助敌人亡国灭种。圪泡杂种““““““““。”

在第二天的早晨，大风已住，有一个警察，一出门见院内到处有纸张，他接连拣了几张，都是杀鬼子，骂汉奸的材料。情不自禁地“哎呀”传单，这一喊，把家里边睡的警察都给惊醒了。伪警察署长赵秉谦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着急地问什么事？那个警察将传单递给了他，拿起来一看，脸面煞白，提着手枪上了炮楼，晚上值勤的警察都还睡着呢，他气急败坏地大骂：“脑袋也掉了，还睡你妈的屁”！值勤的警察被惊醒了，见署长惊慌的神态，都莫明其妙。赵骂完后，余悸未平，到了炮楼顶上，将全村窥察了一阵，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才安下心来。他又去追问值勤的警察，传单怎进来的，值勤的警察都异口同声地说：“晚上那么大的风，我们就怕游击队摸进来，在站岗时很注意，根本就没有见过散传单的”。经过再三的追问没有结果。自卫团长裴德也跑来。向伪署长报告发现传单的

事。话音未落，伪乡长杨挠也来报告“大街上有传单，警察署外边还有标语。”

他们除给二十四顷地警备队汇报外，将所有的警察、自卫队全部出动，要严加搜查，不叫群众看，怕“赤化感染”。他们一上街，贼头贼脑，瞪着狗眼，东张西望地进行搜寻，但他们在时间上已经晚了，大部份的传单，早被群众拣走了。好奇的想看看传单上写着什么，一听说警察出来搜查，都暗暗地收藏起来了。有一个叫白双才的农民，没有收好传单遭到毒打。有一个拣粪的农民王锁柱，拣看了传单，不停的喊“游击队的传单”，有几个人走来围看，正在这时，两个警察闯上来，一个抢传单，一个举起枪托照头就给了一下。有的拣到传单，走门串户交谈传单的事和对抗日形势的看法。人民北望大青山，盼着游击队来，发泄对鬼子汉奸的愤恨。尽管警察和自卫队再三的强迫群众交出来，否则以通游击队的罪名严加处理，但群众拣到传单，如获至宝，把警察的恫吓威胁当成耳边风。

日本鬼子在二十四顷地的驻军，警备队长铃木听到散传单的情况后，大为恼火，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驻萨拉齐的日军山岐部队。敌人为了显赫日本帝国主义“武运长久”的威风，给游击队个厉害，来震慑人民。在散发传单的第三天清晨，由铃木带着三百多鬼子，二十来辆汽车，杀气腾腾而来。一进村，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大有一口吞掉之势。东西城门各有两辆汽车堵着，街头巷口交通要道都有日本鬼子把守。另有几队鬼子兵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对一些可疑的人，剥掉衣服进行检查、盘问和毒打，有的还被刺刀扎伤。另有五六个鬼子兵搜到我们的豆腐房时，我们推磨的，烧火点豆腐的都非常镇静，

若无其事，照常的干活儿，鬼子在外边哇啦了几句，“砰”的一声把门踢开，随着就捅进两支上刺刀的枪，鬼子蛮横凶狠的举动，是在吓唬人。接着又进来几个鬼子兵，狰狞的面孔。瞪着我们，上下打量。用刺刀挑开炕上的铺盖进行检查。为首的一个问“什么的干活”？我们说“做豆腐的”。随手指着豆腐渣让鬼子看。又一个鬼子哇啦了几句，我们也不懂得是说什么话，让把“良民证”拿出来，鬼子再没有纠缠就走了。一个鬼子兵临走时，把缸里的豆腐插了几刺刀。任进才同志气愤的说：“鬼子原来是欺软怕硬，不刺豆腐磨刺豆腐呢”！

随着日伪警察和自卫队，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驱赶在一起，汽车停在西侧，戒备森严，汽车上架着机枪，对准群众。铃木和翻译站在正面一辆汽车上。铃木装着笑脸哇啦了几句，翻译说：“你们都是皇军的顺民，要听皇军的话，谁是游击队，谁通游击队，通通的说出来，是大大 的好人，大大的有赏”不一会儿。铃木突然怒气冲冲，恶狠狠地又哇啦起来，声调提的特别高并且抽出洋刀比划了个架势，又横竖比划了几下，翻译又说：“如果隐瞒包庇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把你们全村都烧光、人通通的杀掉”。顿时气氛十分紧张，人们都低着头，不理睬。翻译再三催促叫人们说，但没有一个人吭声。把个铃木气的脸色发青，暴跳如雷，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返回萨拉齐。

日本鬼子走后，伪警察署等机构，认为毛岱村子大，住户分散，城墙低不牢固，又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路，往来的行人也多，感到这里很不安全，不久，便搬迁到任三尧村。这个村有天主教堂，住着一个外国神甫。教堂有武装人员二十多个，枪支齐全。又有两座小而坚固的东西城，中间夹着高大的教

堂，全村人民都是天主教徒。在1942年春，日本鬼子进驻毛岱村后，伪警察署和伪行政机构又迁回来。

传单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毛岱村这个死水池，不仅震慑了日本鬼子和汉奸，而且激起全乡每个热爱祖国人民的善良心绪，使这里的抗日救国的生气苏醒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由于长期处在暗无天日和水深火热之中，见到共产党地下组织散的传单后，好似见到太阳的光芒无限喜悦。人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以欣奋地心情谈论着，靠近警察署住的农民高来官说：“那天晚上，我出去小便，当时风已经不大了，看见从北城墙串进几个人影来，由这个房上到那个屋顶如走平地。一定是散传单的人。”又有的说：“游击队里边真有能人，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还有的说：“散传单是游击警告日伪军政人员，不叫他们为非作歹欺压人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把散传单的事成了热门话题，你言我语议论纷纷。在谈论中怀着对日本鬼子、汉奸无比仇恨。

这次传单的出现使在日伪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呼吸到新鲜的政治空气，从而也了解到全国抗日的大好形势。它给人民带来了希望，老百姓也不像过去那样悲观失望了，认为日寇侵略中国必然要失败。坚信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抗 战 时 期

国民党萨县游击县政府始末

程景华

1938年间，傅作义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政府主席，当时住在河套陕坝后，唯恐害怕八路军把沦陷区的人民组织起来，于是分别委派了沦陷区各县的游击县长刘盈泰为萨县游击县长（因没有固定的县政府地址），而刘盈泰不敢进入敌占区工作。只好在黄河南岸的张义成窑子、海留素和新城，以及东西大社一带属国民党的统治区内活动。刘盈泰就在这一带鬼混。当时管辖范围分散，推行工作很困难，刘盈泰弃职不干了。谁也没有勇气担任这个苦差事。于是傅作义又委任董寿（又名福先萨县人）接任了萨县的游击县长。董接任后，对县政作了一些改进，首先把县政府固定在黄河南岸的新民堡，并设秘书、科长各一人，办事员三人，同时还成立了县保安队。又在黄河南岸各渡口设卡征税，来维持现状。当时县政府连遭敌机的不断轰炸，又没有防空设备，房屋被炸毁，于是，将县政府迁移到南沙梁外的二蛮壕。然后把沿河以南划为第二区，委李雨田任区长（李是国民党“统”字号的人），不久董寿辞职，由李雨田兼代县长职务。后来又派王培仁（王也是国民党“统”字号的人）任县长。那时每年夏秋间，驻在萨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每天用汽车拉着大炮到黄河沿岸，疯狂地对河南

村庄进行袭击。面对日寇的暴行，东西大社、三分子的民众，无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一天，当日寇又开上汽车到河岸用炮轰，被三分子村的民团胡来才，从对岸柳木丛中瞄准，一枪把汽车上拿望远镜的日寇指挥官击毙。敌人大哗，调转汽车跑回萨拉齐县城，再没敢出动。

每当冬季黄河冻结以后，日军配合伪军、警察部队向黄河南岸地区进犯。施行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河南沿岸附近的老百姓。从此以后张义成窑子至新城、东西大社遭到敌人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而无辜老弱妇孺也难幸免。不少村庄夷为平地。如：六分子、百泥井、南红桥等村、仅有的十几户人家也被日寇烧杀成无人村。

1945年初，国民党战地委员会成立后，命令游击县长必须到敌占区工作。这时王培仁调桃力民办事处，傅作义又委任于维陞接任萨县游击县长。于接任后，率其秘书米运昌、财务科长皇甫珍、民政科长许昌、总务科长李雨田及各科室人员，由河南迁至河北来，到大青山（二架山）依靠鄂友三部队开展游击活动。曾派人与公积板车站全副武装的铁路警察杨世茂等人配合打死一名车站的日本人后，又拉到大青山上编为萨县政府的自卫队。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于维陞率领其萨县政府的人员进驻萨拉齐县城，坐了半年多不太平的官。后由新任县长高云山接任了。

（本文根据李雨田生前忆述整理）

水涧沟门水利制度今昔

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村（原名苏赛沟门）是塞外数上的好地方。这里绿树成荫，五谷丰登，盛产瓜果，曾被远乡近邻称之为“塞外桃园”。水涧沟门村能享有这样盛名的主要原因，是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除了村后三面环山，地居大青山之阳，气候早春晚冻外，尤其有常流不息的水涧沟水浇灌之故。

提起水涧沟这股清泉，在管理使用权方面，解放后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改变了长久不合理的现象。

解放前，水涧沟门的沟水如同土地所有权一样为私人占有，就是水主可以把“水股”自由地买卖。这里有地同时也有水的人家是少数，百分之九十的“水股”都掌握在地主和富农的手里，广大农民是没有“水股”的。

所谓“水股”，就是将全沟水划分为股。当地人民把全沟水叫做“全河”，一半叫做“半河”，四分之一叫做“二厘半”，二厘半为“一股”。水主为了便于管理，在水涧沟口石渠前分成四个水口放水，每个口流水以二厘半计量，两个口子流水计为“半河”。

四个渠口放水流向不同，分别浇灌着三湾、两城、一盘的全部田禾。东口是老后渠，浇灌后湾村的大部分土地；二口是中渠，浇灌大、小城和北只图村的土地；三口是小南渠，浇灌火盘村的农田；西口是西渠，浇灌西湾和萨拉齐的部分土地。这是大体划分，庙湾的土地渠渠都能浇上。

农业用水时间是固定的。每年从“小满”节这天起，到“白露”节前三天止，为全年轮灌农田期间。这一百零二天轮成六转，每转十七天（内有一天‘官水’时间）就这样周而复始，轮流浇灌。昼夜用水不同，分上午、下午、晚间“三段”，每段四股水，一昼夜十二股即一个“全河”水，一转共计二百零四股。划分三段用水时间，也有一个土洋结合的交接办法。早晨以七圣庙东房墙上小窗为镜，向外看见明光去接为上午水，中午十二点钟接为下午水，傍晚大庙打钟去接为晚夜水。每轮水的第一天为“官水”，上午灌储水“圪洞”解决各湾人民的生活用水（当时东、西、后“三湾”均无水井，每湾都有二至三个储水“圪洞”）下午供和尚卖水，其余十六天的水股全被少数“水主”垄断，无水的广大农民要想浇田，必须花钱向“水主”买水，否则要早坏或早死庄稼而造成减产或无收的损失。农民浇地，如果一户用不了一股水时，可以几家合伙买下分用。他们为做到互不吃亏，在一个小木匣内点燃香炷，然后以香炷号的多寡分摊水费。因水的昼夜关系，又有大活水、小活水和死水之分，水的价值也就有所不同。一般是上午价高、下午低些、晚水最贱。若遇夏季天高无雨的年头，农民更吃不住，想浇一点田，务必花大价钱才能买到水。所以，当地农民普遍有买水难的慨叹。如郭计祥说：“这水呀，天越早、价越大，越难买，真是锹头上铲上现大洋也买不上水啊！”

每年的“小满”节以前和“白露”节前三天以后的沟水叫“春秋混水”。这时农田用水始于淡季，水就不值钱了，水主弃了权，由村公所雇用四个渠头照管，农民可以上轮下挨无价浇水了。

还有所谓“乱水”，就是在山洪暴发“戳了坝”时，洪水顺壑而奔，水主失去控制能力，任何人都可饱浇河水了。凡是较大的洪水，多半流于威俊、吴坝等下游村庄浇灌。为了争浇洪水，常常引起争吵或打架斗殴，甚至有过打伤或打死人的时候。由于受渠道的限制，较大的洪水往往下游村庄田禾被冲淹成灾。

坝被冲坏后，要及时修复。其做法是：负责社务的会首立即上庙“筛锣”（敲锣）通知水主们去沟口打坝。水主为了早得水益，套上车马，拉上柴草和其它所需物资到沟口尽力堵截冲毁部位。但是，由于坝是土、石、柴草筑成，质量低劣，经不起猛洪的冲涮，补修水坝成了年复一年的常事，扭转这种状况才仅有四十多年。

1945年日寇投降后，原绥远省照例立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由晋绥察分署驻绥办事处第二工作队的具体资助下，施工建筑水洞沟口“过水坝”工程。资助工程经费是面粉，一辆马车拉一天石头付给5斤，一个人劳动一天付给2斤。就这低廉的报酬也不够工程支付，致使中途停工。当地人民为解决工程差额经费，选派西湾村阎马，东湾村李会，后弯村李宝等人赴绥远省“救济总署”请求，又经第二工作队长李俊先生（号子英）多方奔波才又增拨面粉一万斤，“过水坝”工程总才得于落成。所谓“过水坝”，是保持渠内足够的用水量后，多余的水全部从坝顶上流去而得名。建成的新坝扎实坚固，洪水不易冲动。因此，即保证了农田灌溉用水，又解除了经常修坝的苦恼，水主得大利。

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洪流，私人占有沟水使用权的制度也被废除了。沟水的使用，由农会掌管，不久又由各湾行

政村选派代表议定了轮流办法。这时农民浇地用水基本上不花水费。后来成立了“水利委员会”管理，也不过收些修渠、办公等费用。一九五八年由原萨县县政府主持修起了水涧沟水库，整修了拦洪坝，又成立了“水库管理所”，水涧沟口又安装起放水和退水闸。现在，不仅大大减少了山洪泛滥成灾的程度，而且水库储存了淤余洪水，又为旱时所用。灌溉面积扩大了，同时还解决了部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为了扩大水源，原沟门公社各大队还打了不少水井，用地下水弥补了天旱沟水不足的问题。现下沟门各村虽然土地数量不多（尤其是庙湾和后湾）但由于扩大了水源，合理利用清洪水灌溉，基本上做到了农业是稳产高产的。

郭汉·王之业供稿

王怀瓏整理

民生渠的变迁

土 夫

土默川地处黄河北岸，滚滚滔滔的黄河水昼夜不息地从她的身边流过，但海海漫漫、平平展展的土默川的历史却是“十年九旱”，“一年不旱，河水就泛滥”！世世代代生活在土默川的人民在年年月月地“望河兴叹”！旱天，眼巴巴地看着

黄河水白白地流过，却浇不上经过辛勤开垦而干旱着的肥田沃土；涝天，眼巴巴地看着黄河水冲堤决岸，泛滥成灾……他们祖祖辈辈渴望能修一条纵贯土默川的大干渠，引用那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浇灌他们世代辛勤经营的平展展、肥油油的土地，以彻底扭转那不是“十年九旱”就是“河水泛滥”的厄运！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萨拉齐地方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延请后套的水利专家王同春（又名瞎进财），勘测了一条从磴口黄河水岸筑口设闸，东行到拉素海的一百四十五里长的干渠，然后沿五十里长的黑河故道注入黄河。此渠经过土默川西、中部的包头市郊区、土右旗、土左旗、托克托县等四个旗（县区），全长一百九十五里，起名“民生渠”。但当时工程需款数额巨大，地方无力开挖，几年搁置未动。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十六年（公元1927年），土默川连续干旱减产；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土默川又点雨未落，夏秋庄稼颗粒无收，加之匪患、兵燹与疾病流行，土默川人民穷困潦倒、鬻妻卖子、死亡无数。这时，地方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招徕灾民开挖民生渠，得到当时绥远省政府的批准与华洋义赈会的合作，均资合办，组成工程总监处，招集七千多灾民，于九月十八日动工，正式开始了民生渠的修建工作。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土默川春夏滴雨未落，插楼不入，荒旱更加严重，四处饥民纷纷向萨拉齐涌来。华洋义赈会与绥远省政府订立合同，重组工程处，由美国人艾德敷任处长，美国人塔德任总工程师，仍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扩大民工数额，抓紧工程进度。就在这年夏天，二十三岁的美国记者斯诺莅临萨拉齐考察，及时采访并报道了萨拉齐一带遭受灾害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种种惨象和开挖民生渠的情况，

加之其它方面的宣传，使萨拉齐和民生渠一时名扬中外。这年六月订立《萨托民生渠合同》，内容有开凿民生渠的目的意义、资金来源、各方承担责任以及如何管理使用等共十项。

据《萨拉齐县志》记载，在开挖民生渠的过程中，“因办理未善，（工程处）与工人间发生齟齬，工人时有逃散者。”1930年风调雨顺，土默川获得大丰收。1931年春，因民工人员不敷，当局又增派四千名士兵参加。六月中、下旬干渠主体工程七道支渠以及渠口闸门告成，前后用款八十余万元。当月二十二日举行放水典礼，国内外的不少名人、新闻记者，纷纷来祝贺和采访。但一开闸门，因渠位高而水位低，黄河水流不到渠里来，弄得塔德等人十分尴尬。接着便采运大青山的石头，分别在黄河对岸和靠近渠口下游处筑坝。但干石头倒进河里，水涨前移，结果也无济于事。1932年成立民生渠水利公会，九月十六日公布了该会章程，内容有“总则”、“理事会”、“执行部”、“会计”、“水租”、“附则”等六章二十一条。

1932年解冰期和1943年、1944年，黄河三次猛涨，河水涌进民生渠，冲毁了不少建筑物，淤澄了渠道；而从大青山涌来的洪水又被民生渠堤坝阻挡，萨拉齐一带淹成泽国，庄稼被冲，庐舍荡然无存，涝灾甚重，当地人民苦不堪言，遂将民生渠讥为“害民渠”、“民死渠”！

日本侵略者侵占萨拉齐后，也曾想修复民生渠，并收集有关资料，编辑出版了《民生渠的全貌》一书，还动手在上游筑了一些工程，后来也半途而废。

解放后，萨拉齐县人民政府，为了化水害为水利，于1956年带领人民群众于八月三十日动工，开始了复活民生渠的工

作。经过两个月零二十一天的努力，一鼓作气地完成了干渠清淤、开深干渠上游的直角开口、新开九道支渠、修复五个建筑物、新建十五个闸桥等工程，并专门成立了民生渠管理处，当年就浇地十多万亩，使“害民渠”开始变成“民生渠”。1958年又开凿了近六十公里长的“跃进渠”，在大城西附近与民生渠交汇成“人”字形；同时扩宽、加长原民生渠上游十八公里长的一段为总干渠；还在大城西附近构筑宏伟壮丽的枢纽工程。其后又陆续疏浚、配套，国家投资修建了干渠、支渠桥十四座，进水闸三十八座，节制闸三十七座，斗口七十七座。1966年国家在磴口黄河北岸兴建了扬水站，后经1974年扩建，1978年改建，现由临河式泵站和进水闸式泵站两部分组成，分别安装28吋立式轴流泵14台，56吋立式轴流泵6台，装机容量4820瓩，提水流量 $61\text{m}^3/\text{S}$ ，国家总投资590万元。临河式泵站设计黄河洪水流量 $5090\text{m}^3/\text{S}$ ，进水闸式泵站设计黄河洪水流量 $5600\text{m}^3/\text{S}$ ，设计净扬程4.03米。承担着包头市郊区、土右旗、土左旗、托克托县四个旗（县区）、三十个乡级单位，107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其中民生渠可灌溉47万亩，跃进渠可灌溉31万亩，拉素海二级扬水站可灌溉29万亩）。使土默川西、中部的大部分土地得到灌溉，旱象威胁大大减轻，民生渠真正变成了土默川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动脉，实现了土默川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再也不用望河兴叹了！就连1929年修浚民生渠的总工程师塔德，1980年7月携妻带子回访民生渠时，并对解放后在大城西附近的民生渠枢纽工程旁摄影留念，修浚民生渠所取得的成就也赞叹不已。

萨县种植鸦片及其恶果

鸦片在萨拉齐通称“洋烟”，也称“大烟”或“大烟土”。据老人传说在清咸丰年间就开始了种植鸦片。

鸦片是罂粟科植物，果实为罂状浆果，绿色，在成熟的浆果上用大烟刀划割一痕，随着刀痕即有白色乳状物渗出，颗颗白珠排列在刀痕上。另一人左手中指带一白铁桶，口径约四厘米，高十厘米许。桶口有一半月形小缺口。右手食指拾取渗出物，刮入桶口。这样所收的“洋烟奶浆置于日光下曝晒一日许，便可用手搓捏，制成块状称为”“板子”呈暗棕色，这便是鸦片。

鸦片的吸食时，首先要有一套烟具，如烟灯、烟枪、洋烟钎、斗挖子等。烟具也有高低之分，高级的玉斗、玉枪价值数百元或数十元。低级的灯瓜、纸罩。一盏烟灯可同时围躺一至四人。据说洋烟能治疗各种病症，振奋精神，因此便诱人上瘾。烟鬼们躺在洋烟灯下，大话连篇，精神大作一时。他们把洋烟认为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益寿延年的滋补珍品。可是吸食时间一长，脸色便带灰霾，终于成瘾。鸦片烟毒既有诱惑力，又有感染力，能使全家成瘾。子女有病喷点洋烟，喝点烟灰或吃些洋烟炒米就会痊愈；妻子反对丈夫吸洋烟，最终自己也做了洋烟鬼。凡上瘾的人，精神萎靡，呵欠连发，涕泪长流，痛苦不堪。成瘾者只要能抽几口过过瘾，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妻啼饥，子号寒，卖儿卖女也愿干。所以人们常

说：“灯瓜、纸罩、炕上躺得死耗”（老鼠）鸦片烟毒之深，烟毒之剧有甚于猛虎。

随着烟民的增长，烟馆到处开设。开烟馆也不需大本钱，铺面也简单，只要有一售货窗口即成。烟馆成交的现金少，实物多。因凡来买烟的人，一般是迫于烟瘾的破产户，非偷即摸。而开烟馆的人在萨拉齐是不少的，可靠卖烟起家的几呼没有。只有卖烟不抽烟的才能赚钱，可是天长日久，也被感染上瘾，仍然要倒霉。

每年烟季（阴历五月到六月底），各行各业的人奔走在阡陌小道上，大部分人是割洋烟的。也有踢拳卖艺的，出现在烟地里，他们无非是打闹些烟土。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穷半年，富半年，单等六月割洋烟”。由此可见割一季洋烟就能富足。在此季节凡有瘾的人就可以大抽特抽，被染成瘾的，一旦烟市结束瘾得死去活来，无法为生。在那绚丽多彩的罌花季节，年复一年不知有多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又不知有多少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萨县大烟为西口外名产。因此有一些人为外地烟贩收购大烟的烟馆叫“土店”，当时有候子亮的“土店”，吕明的“云记土店”等，由此大烟又流入内地，毒害范围遍及各地。

日寇统治时期的“土药组合”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入萨拉齐后，表面上口口声声喊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王道乐土”，而实质上更猖狂地剥削人民毒害人民。他们抬高烟价格，刺激人们种大烟。当时每亩水地约收一百多两鸦片板子。

每两“板子”可卖三、四元（银币），每元钱可买白面二十多斤。当时在萨拉齐吃白面比较困难（因种小麦产量低，每亩正常情况下只能收150斤左右，如遇上“黄痘”，就一无所收）。所以人们有水地愿种大烟，而且千方百计地改善水利条件（将秤杆井改为较先进的水车井）。随着大烟种植面积的扩大，生产提高以及品种增多。从花色可分猪血红、火焰红和大白花，从生长期又分为小花烟、二白花、大花烟等……。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侵略者不失时机地统购大烟，将萨拉齐县的土店进行合并成立专门机构，叫“土药组合”。这个机构设有经理、协理，下设会计股、业务股、保管股等，有一名日本顾问监督。这一机构中的领导层都是善于逢迎日寇、汉奸、特务的原土店老板，除使用他们的狡猾手段和市侩作风外再加之他们手中的权势更是巧取豪夺。如，萨县“土药组合”的经理宁天贵，副经理吕祝平，协理吕文、白印根等。助纣为虐，盘剥人民大发其财。“土药组合”设在萨拉齐县城内光复巷南口路北“永合店”院内。

业务股，办理收购大烟事宜，负责鉴定大烟质量。以往凭经验肉眼来鉴定，后改为取样品用勺炒去水分，这样所取的样品便落入业务股成员手中，并被他们分脏，中饱私囊。

萨县的“土药组合”在各乡又设有“出丈所”。“出丈所”设主任一人，成员定额为四至七人。当大烟快开花时（阴历四月间），伪县公署要派丈烟大员下乡，丈量烟亩，核实产量。下乡丈烟这是个有油水的差事。谁担任了丈烟员，出门有武装保护，在下乡时期有人招待，前呼后拥，有权能给村社里应事和有钱的户少丈些烟亩（实际减少烟亩数），从中自然会发了财。而没钱的人想少丈烟地亩，根本没有希望。到头来

吃亏的仍然是贫苦农民。

“土药组合”在收购大烟时，光鉴定的样品就成为他们的额外收入。美其名为“永昌”。此外还用大戥子、和回皮扣皮、压等压价等手段来肥己。农民常说：“种烟的千千万，受穷的就够多一半”。

烟市是农民最忙的季节。“土药组合”为搜刮人民，在萨县城的四门（城门）设有收购组、岗卡，凡带有大烟土的人，强行收购。发现有可疑迹象的人全要搜查。以此来满足日寇的欲望。烟市一结束，马上派武装人员下乡催逼收烟，搅得到处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即便是地方上应事的难逃其剥削。

1941年（民国卅年），萨拉齐牛骥社甲长张许，在丈量烟亩时，给日伪警察署署长崔瀛家的烟地给予特殊照顾。但是，当烟市结束后，张许忽然接到崔署长有请的命令。张许等一行人到达第一署（原萨县文化馆），只见楼下水缸里泡着桦木棒，当时人们听得一阵皮靴声，见崔署长出来，便问张许：

“烟亩丈完没有？张许说：“丈完了”。“什么完了！妈的屁来人哪！”当时两名警察应声而出，随着崔署长的示意，将张许按倒在地，崔署长亲手拿出瓮中的木棒，痛打张许。随行的人跪在地上哀哀求情，而张许还是被打得死去活来。崔署长打罢后还恶狠狠地说：“今天暂时饶你！让你尝尝我署长的厉害！到烟市了，他妈的，也没抽到一口好烟！你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最后直等到牛骥社的人送去了大烟，才算了事。

“土药组合”中的经理和手下的办事人，生活奢侈挥金如土。而对日本人则极尽奴颜婢膝之事。对特务、汉奸又请客又送礼。对老百姓千方百计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整天泡在“土药组合”打麻架，混暗娼，干尽了坏事。如吕某已年

过半百，刮掉胡子，重坐花轿娶小老婆。再看这些土客的家庭的富丽堂皇，真是一言难尽，老百姓形容说：“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床，烟灯六七座，八九十枝枪”（烟枪）。他们染毒之深，染毒之众可想而知。又如身为协理的杨某，因吸大烟深重，最后落得一贫如洗，卖妻卖子，无家可归。

日本侵略者就凭借大烟毒品对萨拉齐的百姓毒害至深，真是罄竹难书。

日寇对萨拉齐地方上的知识分子，凡不为“大东亚圣战”效劳，只要发现所谓“形迹可疑”都给以“反蒙抗日”的罪名逮捕杀害。因此，凡未遭毒手的知识界人士则终日藏头掩面，最后竟隐居烟灯之下，成了名符其实的“瘾士”，如王恒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时在萨拉齐境内居住的人不论生活如何，吸食大烟的比比皆是，就连佛门弟子、和尚、道士、也陶醉在大烟灯下，大有人在。

日寇统治下的萨拉齐受烟毒之深、之广，由此见一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觉得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则更加猖狂镇压中国人民，他们与亲日派、汉奸走狗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巧取豪夺。是年萨拉齐的“土药组合”将储积的大烟全部运往张家口。由“土药组合”的顾问和吕祝平等亲自送去，事后得悉，所运大烟根本未到张家口，完全由吕祝平勾结日本浪人携货潜逃了。

后来，萨县人将抽大烟发展为“呵料面”，烟土商又转变为制造料面和贩料面商。“料面”之毒更甚于大烟，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45年（民国卅四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萨

拉齐光复了，虽然萨拉齐地区不种植鸦片烟，但烟毒之害尚未根除，而“料面”之毒，更加嚣张。国民党政府虽明令禁烟，但官场中吸毒者大有其人。最后中毒而死者，难计其数。

一九四九年萨拉齐解放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严禁种植鸦片和肃清烟毒政策的指引下，大部分吸毒者，均能自觉地禁吸鸦片和抽料面，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彻底清除了烟毒。萨拉齐县受鸦片的毒害一去不复返了。

刘绍仁 供稿
李维章 整理

对昔日货币的浅谈

李巨才

货币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商业方面联系更大。我一生从事商业工作，五十多年来经过几次社会的变更，货币种类也随之变化与波动，只就我记忆的一些情况作粗浅的介绍。

简单的说，货币就是代表钱。因在各个时期的货币不同，比值当然有异。就我亲身经历来说起吧。我是一九三一年来萨县从商，住的商号名德昌店，是清朝时期开业的。翻阅旧帐簿看，只看到记帐货币是白银，单位是两。辅币一种是“制钱”，单位是文，每八百文值合一两白银。在二十年代末废两改元，用

包含一定白银重量的银圆为货币单位(一元)，这时社会上虽然也有制钱流通，但极其次要了，只有铜元较多。一个大铜元为二十文，一个小铜元为十文。四千文(简称四吊)换一个银元。三十年代初，白银的流通也进尾声了。因为铜元使用也不方便，人们携带很多困难大，尤其是大额交易拒收，只能作零星交易使用。因此，市场上大量货币以钞票为主。当时钞票有：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种通称“法币”。在萨县流通的还有山西省银行、绥远平市官钱局、西北屯垦办事处等各出的一种钞票，此外还有当地商号出的“凭帖”(只能在当地使用)。上述钞票在社会正常时，比值和银元相同。但在社会动荡不安定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了它的比值，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山西钞票，因为蒋阎战争，阎锡山失败了，从一九三零年将所有的山西票宣布以二十元旧票换一元新票(票面仍是山西省银行)，同时绥远省的平市官钱局票也相应以二元五角换一元新票。这样一来，把整个山西和绥远的金融几乎搞垮，老百姓吃了大亏，有苦无处诉。有个别人赌气烧掉山西票不去兑换的也有。因此，给人们留下一个票子不可靠的后遗症。

那时萨县市场上流通的是银元、法币、山西新票和绥远新票，比值基本相同。有一个时期，商人外出携带现款时，嫌银元体重显眼，很愿意带法币。这样一直延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萨拉齐县时，因日寇占领后使用的是日本老头票和伪蒙疆银行票。起初市场上暗地里还周转法币，但为时不久也停止了。

记得当时，我学习生意的德昌店认为法币不会贬值，于是把四千法币装入铁桶埋在墙内储存起来。当时市场上白市布每

四七元二角，这部分钱可买五百五十匹。但到了日寇投降后，取出来使用时，只买了两盒纸烟。如果不是亲历其事谁能相信呢。

随着法币和省票的废止。伪蒙疆银行券成为当时商品交换价值的主要货币了。这时，日伪大量掠夺物资，无限量发行钞票，因此，纸币逐年贬值，物价波动很大，直到后来每年物资价格上涨几倍。到一九四三年春天，买一匹白市布就需要蒙疆票二百五十元，赶到一九四五年，一匹白市布高达四万元蒙疆券，几乎成为废纸一张。日寇投降后不久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来萨县讲话时宣布：伪蒙疆票全部作废，人民受害不浅。

国民党光复萨拉齐县后，继续使用法币、关金券，当时一元关金券可顶二十元法币。但是贬值之快，每况愈下。到一九四六年春天，一个银元可换一千元法币，买一匹白市布用九万元。一九四七年，伪中央发行金元券，规定的比值是：一元银元券顶三百元法币，两元换一元银币。当时稳定的时间很短又出现了波动。因国民党中央财政部内部暴露了内幕，说什么金元无保证，仍是骗局。因此，市场上的物价一下子暴涨，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伪财政部长徐相园被撤职处分，也未能在人民中挽回它失去的信誉。市场上买卖交易时不以金元券为商品价值尺度，而是以银币或粮食作交换标准。金元贬值之快一蹶不振，一日多变。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作废时有人以一万元买一块银元，以后又使用银元了。

一九四九年绥远解放后，旧人民币在市场上基本稳定，但面额较大。当时以元为单位，而实际成了以万元为单位了。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就是几十万。所以，记帐和结帐都感到累赘。对此，人民政府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

以新币兑换旧币。旧币一万元换新币一元，逐步回笼了旧币。兑换了人民币数额不同，但使用价值相等，做到了国家和个人均不吃亏。四十年来，物价只作过合理调整，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笔者介绍这些情况，仅供青年同志们认识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寇侵占时期，人民群众在货币方面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吃亏的是广大劳动人民。

萨拉齐的饮食行业

在清乾隆初年（1736—1795），萨拉齐已是人烟辐辏、工（主要是手工业）农牧业相当发达、商贾云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业兴旺。陆上有贯通东（绥远、张家口、京、津等地）西（包头、巴盟、甘、宁、新疆等地）上下两条土路通道，水上有毛岱渡口，堪称水旱码头的塞外重镇。就连驰名中外的草原钢城的包头市，当时仅是萨拉齐厅属下的一个小村落，直至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才设立萨拉齐厅治下的包头镇，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包头才正式从萨拉齐县析出。在这样一个繁荣的厅治所在地，饮食行业的兴盛是可以想象的。当然，最早的饮食行业为谁所创、店为何名，创于何时已难稽考，仅据老者回忆，较早的清茶馆有：四和元、德隆元、隆三元等，饭馆有惠锦元等；干货铺有三和元等；点心（糕点）铺有三星成等。

它们之间，虽然同属饮食行业，但又有各自的生产 and 经营特点。它们的分工是：

一、清茶馆

萨拉齐的清茶馆，不同于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和京剧现代戏《沙家浜》阿庆嫂和京津等地开设的专卖茶水的茶馆，实际上是具有北方共同特点的早食馆。凡进清茶馆的顾客，既喝清茶，更主要的是为吃而来。到茶馆的顾客中，既有达官显贵，各路客商，也有邀亲会友的普通百姓，更有一些既讨厌又不愿意的一帮茶痞，俗称“坐地虎儿”。

清茶馆，有汉回之分，外观主要区别在幌子上。清茶馆的幌子——4—8块长约尺余，宽约数寸的油漆木板，上面分别写有：“包子稍美”、“大小八件”、“中外茶点”、“各种饼干”等字样。在每块木板下，都坠有数条飘摆的市布条，汉为红色，回为兰色。回馆还另需于门前悬挂一块油漆较大木牌，牌上画有蒸气飞腾，气体上方有月牙的一个回族专用的“汤瓶壶”，有的写汉文和阿拉伯文体的“清真回回”或仅以汉文写的“清真回回”字样，以示外来回族同胞可放心进餐。这种幌子和民族标志牌，每天在开始营业前挂出，收市（下班）后摘回，行话叫下幌子，日日如此。

业务过程：

全号人员，从经理到徒工、按分工职责，每天各司其职，头天下午和晚上加工制作，为次早营业作充分而完善的准备。

每天在日出前，作坊师傅们就动手拌馅勾兑蒸包子用的面等，徒工们协助各该师傅，如跑堂的、烧水沏茶（服务员下同）清扫营业场地地面，揩抹桌凳（均为长条凳），清除炉灶，搬运各种干货等，一切妥当，即下门板、挂幌子，开始营业。主要经营品种，蒸食有：稍美（一称“烧卖”、“烧

美”、“烧麦”，下同）、包子；干货有：刀切、破酥、澄沙、酥馍、锅盔、半月儿、大小提江、翻毛、敦子饼、大小月饼、饼干、鸡蛋贝子、各式大小麻叶、长寿糕、芙蓉糕、潮纸糕，夏天还有绿豆糕以及特制的、现烙现卖的糖、咸、素、肉油旋等十几个品种。

无论新老顾客登门，站在门里的一位专事接待的经理、副经理或相似的负责者，很有礼貌地向新老来客一一寒暄几句客气话后，随向堂里高喊：“照客”（意即照料进去的顾客）！跑堂的堂信儿（服务员）接喊：“里边请”（意即请进来吧）！随笑脸迎领顾客到他服务的桌边让顾客坐下（这样的服务员有数人，每人分管数桌），边揩抹桌面边问：您共几位？（因有时相约亲友到清茶馆共进早餐，请客的主人先来恭候者，故有此问而不失礼貌）顾客答数后，服务员随把相应数的竹筷（服务员脚下腰间围带一个大布兜，兜内装有近百至数十双竹筷）放在顾客面前。并立即向储放茶具处高喊：×座×位！负责送茶具的服务员或徒工，按喊数送来，茶具分扣碗和磁卤壶两种。往往是一人者多送扣碗——一种小于饭碗尖底大口、口上有能嵌进此碗扣盖、碗和盖底部都有一凸出圈，碗圈为保持放碗平稳，盖圈为取或盖时便于用指抵住的青、花细瓷器；二人以上送卤壶（分大中小）、送茶具者随征询顾客：您带没带茶叶（因为有些常来喝茶和茶痞们常常自己带茶来，亦故有此问）？顾客如答未带，服务员即介绍说，这里备有小包茶（这是全店服务人员集资买茶转卖的一种既辅助微薄收入又方便顾客的方式，是茶馆资本家有让利于工人的做法），有砖茶、有小叶、有大方（红、绿、花茶之类），您喝哪种，按顾客意愿送来，当面拆包倒进扣碗或壶中。此时，专作沏茶的服务员提一

把颈长、嘴细圆形铜壶、高高提起，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更不许把茶叶冲出茶具外（尤其是扣碗），也不许撒滴在桌面上，尤其不能撒滴在围坐的顾客的衣服上。这一点，是清茶馆沏茶服务员的绝技，不练三五年实功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

在每张饭桌上，都有特定的几种刀切等干货和一两个醋壶。待沏茶后，四处照料的服务员即来问：您吃稍美还是吃包子？还要点什么干货？是喝喝再吃，还是现在就吃？服务员根据顾客需要，他即向灶坊高喊：“唉！稍美挑几个（意即蒸几笼）、包子挑几个。喊后，如果顾客骤增，服务员根据经验会补充喊到：前后两个，再挑三个，以满足顾客的需要。因为灶房不能随意多蒸。吃稍美最讲究现蒸现下笼即吃，那真是美不可言。那些久吃稍美的顾客是不吃回笼再蒸的稍美的。万一蒸多了，服务员只能把这种稍美送给身有急事马上要走的顾客和乡下来的顾客，再就是用食油在火釜上煎黄了给那些花钱不多（吃的少）、霸着坐儿不走，从开门到下班喝茶没完没了，专爱挑刺儿、惹恼了他们会闹事的茶痞们吃。

服务员给顾客端送稍美，也堪称绝技；在他的胳膊先垫一条抹桌布（俗叫“代手”），在这条胳膊上从手腕起往上摆，一次可摆放四五十盘盛有稍美的小盘子（每盘盛的个数各家都有自己的规定，有四个、五个的不等），以轻快的步伐、优美的身段，按照顾客就坐的先后次序或事先向服务员打招呼吃了马上要走的顾客面前问：您留几个（盘）？按顾客意愿如数放下。对一次要留很多，影响别人进食时，服务员也不能使他不满意，只能说您先留几个吃着，马上就来，再端来时马上给他如数留下。

来这种茶馆吃早餐的顾客是川流不息的，高峰时间是八至

九点，那真是挨肩擦背地拥出挤进的。

每位顾客吃罢将走时，就喊服务员来算帐，服务员应声而来，首先要客气地问：“您吃好啦，还要点什么”？就边推着盘子，边高声说您吃了什么多少，共计是多少钱，有时还要重复一遍，这种口读心算的方法叫“牙捣蒜”。顾客起身后，服务员还要说，慢些走，明天早点来，随向收款处（叫柜房）高喊×元×角×分到柜！收款处高回如数一声×元×角×分，立即把数码打在算盘（放好几个），这时，负责盯到柜交款的负责人，表面上向来交款的客气，实际上是监视他是否真的交了款，照收款后马上把算盘上的数码抹去。这种先吃后算帐，算帐后顾客主动到收款处如数交款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交款，有两种方式”一为交现款，一为递折子计帐。什么叫“折子”？是一种用特制细质厚纸顺序折叠为拉开很长、合住扁厚、外有色纸或布做硬壳，壳外中间竖贴一指宽长的红纸条，上面写着本号事先与客户（很有信誉的商号个人）约定的记帐凭证，由被赊方供给客方使用。折芯可随时插入或抽出硬壳外套的。吃后多少钱先由收款处记在上面到一定时间（那时讲“标期”每季为一标）结算一次交款。当时记帐的数码不用阿拉伯字码，也不用一二三四或壹贰叁肆数码，而是用一种行业专用叫作苏州码的符号，日期也另有写法。

当时摆体面偿小费的社会风气，特别是一些有地位，有钱有势者，都很讲究此法，以示阔绰和大方，特别愿在人前显示。顾客们往往把交款应回找的零头作为小费偿给服务人员，收款处遇到此，即向堂内高喊这位先生（或掌柜）偿××角分，堂内的服务人员齐声回喊：“谢”！这种叫小费的偿钱，收款处

另投一小柜，当天下班后或数日开一次，此款除资本家外，凡被雇用者都可分到一份适当的份额，以弥补茶馆付给他们较低微的工资的不足。

也许会问：每张饭桌（有时两三张拼为一张）围坐一、二十名顾客，那位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服务员怎么知道的？会不会发生某人吃后把空盘子推在他人处懒帐呢？万中之一会有的，但几乎不可能。一是当时的人比较老实，不会做出这种因钱不多而丢人的事，更主要的，是茶馆内部事先有一套周密而妥当，不使外人识破监视方法：盛稍卖和包子的盘子有区别；放干货、粗瓷盘子放什么，细瓷盘子放什么，木质盘子放什么，完整盘子放什么，带裂纹盘子放什么，每个盘子放什么，都有内部约定。顾客倒茶时，难免要往自己面前桌面上滴水点等，服务员乘空隙为顾客用抹布揩去，并把顾客面前零乱的吃剩盘子整理起来，以便为分次留食稍美或包子等，服务员这些迅速的动作，顾客不但不反对，反而会感到满意，认为是服务员对自己的尊重或认定这位服务员真勤快，在此感觉下，除赏小费外，会顺手赏给烟吸。实际呢？是精明的服务员借这些自然动作，把顾客吃过的空盘子不偏不倚的堆放在这位顾客的面前，而且心中已初步算出这位吃了什么多少，共收多少钱，所以结帐时特别快而准。您看这种监视方法高明不？

有没有不算帐、不交款溜走的呢？极个别的也会有，但一般不易发生，因为较大的茶馆的掌柜子（经理）都绝不吃闲饭，在业务繁忙的当儿，有的要帮助先生（这里专指收款员）收款或记帐，有的则站在一个能监视各方面的位置上，一边和进出的新老顾客不断地打着招呼，一边却不动声色地紧盯着已喊到柜而那位顾客到柜了没有，到柜交款了没有。万一真有想

溜走的人，会被这位用行话通知门口的迎客者客气地请回来的。老服务员说：对“把子座儿”（指成群的数人一齐进来的称谓）的顾客，服务员就要死记其中一个特征最显著者的口音、相貌、身高、衣着等，以防万一溜走，可依其特征追索其人。

还有，一同来吃喝者数人，其中有人先吃先走，服务员和盯梢人怎么办？服务员发现有此动向即来问：这位是另算还是一齐算？留坐者如管一齐算吧。服务员就向盯梢处喊：×位先走后付，这些先走的人就不会受阻拦了。对已经喊过“到柜”的顾客因他事或朋友新来攀谈而未及时到柜交款的顾客，既不能去催先去交款，又怕这位溜掉，服务员和盯梢人只能不动声色地监视着，待这位动身到柜时，服务员再补喊：×元×角×分“已”到柜（用暗语通知，已喊过那位可去交款了）。还有的顾客除了吃，还要带走一些稍卖，包子或干货等，须向服务员打个招呼，服务员抽暇找来大小适当的净白纸为顾客包上。在喊款数后要一句“手里有”（暗语说，他手里拿的也结算了，不是偷的）等等。

此外，凡来就餐的顾客进门，无论新老，即使在业务繁忙的高峰时间，服务员也得千方百计地为新来顾客匀出一个座位来（因为通用长条板凳，故可匀挤），绝对不让顾客站等座位的，如果因此或倒开水不勤而气走顾客，这些服务员将会受到马上被开除出号的危险。

这个行业尽管严重地存有“衣（以）貌取人”、看顾客身份、地位服务的欺人之处，但为了资本家的通盘利益，也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小费，一般还是对什么人也能周到服务的，基本

都做到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的。

总之，资本主义尽管不同于社会主义，它有许多缺点和较之严重的剥削行为，但它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方法上和技巧上，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周密的安排和管理，能使上下左右紧密地配合，业务再忙，顾客再多而内部不乱，众多的顾客后交款不漏收，内部严格监视、约束而不显露于外，热情周到有礼貌的服务体现了“顾客至上”的寓意，亦争取了更多的顾客，注重各种食品的质量，保持了企业的信誉而使业务兴隆，这即谓“和气生财”之道吧！

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过程

清茶馆所售的稍卖、包子的馅，无论汉回一律使用牛羊肉，那时绝不使用猪肉。而且习用现宰鲜肉为主。凡作馅的肉，不许带进筋膜，倘不慎带进去，遇有挑刺儿顾客，有的高声责问，有的放在桌上以此示众。遇此等事，资本家立即向顾客道歉，严责过失人员，不许坏他的声誉，严保质量以争顾客。为此，在每家清茶馆里，都有一名技术较精的工人，专门负责剔除肉内的筋膜。这种工艺叫“打烙肉”（这些筋膜在每天的伙食中金号人员共吃了，所剔出的筋膜叫“打辣子”）。这名工人对牛羊肉每个部位都很熟悉，剔除时必须按肉的纹路循纹去膜，绝不许乱开刀。刀具都是专用的。剔后，既去筋膜，又不能破坏整体肉态。内行人的各部位都能叫出它的专门名称，并且都知道什么部位的肉怎么吃最好，如宜包馅的、宜炒的、宜炖的等等。

凡估计当天卖不完的剩肉，负责打烙肉的工人就必须把此剩破成（削切）薄片，亮豁（透风、防臭）在专备的亮肉架

（木椽）上面，上面再苫防蝇窗纱，如果苍蝇很多，还要专让一个徒工用马尾绳不时抽拂驱赶，以防苍蝇落上肉注蛆。晚上，把所有剩肉移放地窖内或以麻绳系肉悬于半水井中取凉保质，因为当时当地“冰箱”闻所未闻。

切肉馅的规格要求是，必须切成蝇头大方块，不须连刀（那时也没有绞肉机问世，故必刀切，据说刀切肉比绞肉机加工的肉味佳而好吃，果真否，不详）。

馅用肉的要求是，不能过肥，也不能过瘦。过肥，油化后显的肉少，食之也过腻；过瘦，顾客不满意，则肉显得干瘪不润而味不佳，必须肥瘦适度。因而，对肉商送来的肉，都要认真验收精选，绝不收人情肉。万一都不合意，就自宰槽牛或占羊（育肥，较大的茶饭馆均自己育一部分牛羊，以备货竭之需），以确保稍美、包子的肉馅质量。

稍美之所以“美”，关键在肉馅之美，皮子的味道。当时的精美，那真是香飘数里，味袭路人，使人闻之馋涎欲滴。当时拌肉馅的作料，仅有花椒、干姜、葫麻油、食盐。自日寇入侵后才逐渐使用酱油，根本不用味精。那么，当时仅此几味作料，为什么味道那么浓呢？现在又那么乏味呢？几位此地颇有名望的饕（作）稍美的老师傅泄密似地说：是多方面恰当配合，恰到好处所致：第一，馅必用鲜牛羊肉，牛羊肉本身就味灵；第二，泡制作料是关键，而关键的关键是掌握准火候。如花椒的焙烤。花椒有麻度浓淡之分，对麻性大者，焙时要火稍大而不焦，焦则失味而苦，欠火则麻嘴，要掌握到味既浓而味正；干姜以河南省清华片姜为正品，当然有鲜姜更好。他地干姜亦须掌握火候；葫麻油，要用经过火缸的纯正葫麻油；第三，向肉馅中投放作料的先后次序和绞拌方法同样是关键，这

非“天方夜谭”，就是当时，同样的肉和作料，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会拌出不同的味道来，不信你试试，是一诀难求啊！

或许说，馅内多放胡油和大葱以及作料味道必好。行家说这也未必。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失去规范比例，会相反。就是葱的绿叶大了，也会影响咀嚼和味道。

还有一个馅内放焖子（即用淀粉以开水制成凝体，用时拌入肉馅内，起粘合肉葱作用）多少的问题，放多了，会把肉馅成硬块状，不可口；放少了会散馅。

最后，是稍美皮子的要求。做皮子用面，最早是用当地陆陈行加工的头三箩上等面，后来就外地来的袋袋“洋面”（面粉）。每斤面可下60个剂子，用特制的鼓形擀杖旋擀、轧制出花边，擀时广置淀粉，以防皮与皮互粘。皮沿皱折薄似纸，底心稍厚，以防蒸熟脱底，成皮直径10公分左右。

刚出笼的稍美，形似含苞待放的荷花，口边不许有过多的淀粉残迹，皮色如莹玉光洁。能透射出馅状，提放数次而底不能漏馅，馅大皮薄，用筷子夹起垂悬似胆囊，放于食碟中，又象饼如芥，入口馨香，晨适口福，晚留余味。

包子的皮面，是半起面，勾兑碱水后，衬面粉，用长形小面杖擀制，皮较厚形似“元宝”，中有挤回翘翘状。

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是，当时既没有电，更没有吹风机，蒸制食物，全靠人力拉风箱。饮食行业拉风箱，不同于居民。由于长时间不能停顿地拉，可能出于一种间歇休息的特种功用，故这种拉风箱的声调，富有十分优美的音乐节奏。有时有许多好奇者围观欣赏，其推拉大身段运态，使人赞叹不已。

凡清茶馆，占地必须宽敞，大炉（又叫吊炉）、小炉（烙干货）、蒸、灶房、油锅等必须都有。因为除卖稍美、包子

外，大量的前述各种干货都需自己生产。其中刀切更为主要，而刀切的技术性特强，一般人是做不了的。现在土右旗做刀切技术最好的一位老师傅是回族退休老工人马良，可惜近年已辞世。汉族贾某尚健在。包头市1984年上半年恢复上市的刀切，就是马良的师弟邵满红特地于这年春来萨拉齐拜求师兄马良面授做刀切技术诀窍，并恳求画了切刀切专用刀具样子，回去后照制成功上市的。马良师傅生前曾说：这种美观好吃的双勾云头特制食品、面、油配料（里外层各有差异）不妥，或卷法不对，或刀具和切法不得要领，都是刀不好（整）做不成的。它是每张茶桌上不可缺少的茶点，而且也是当时馈赠亲友的佳品，有许多山西人回籍省亲时，必携此食而归。

营业时间，十二点前已客稀而摘幌子下班，营业结束。

班后工作

下班后，从店堂到灶房、从店堂的每张餐桌到作坊的面案、用具，都要彻底清扫和用碱水清洗一遍，讲罢卫生才能吃中午饭。饭后稍事休息，管烧、倒水（沏茶）的服务员要帮炉房工人和面待发酵而用；跑堂的服务员要立即帮灶房擀稍卖皮子；徒工们拨葱、焙、捣次日用调料（大型的铁卜、铁锤都是特铸的），通力合作，都在为明天的营业作一切必要而充分的准备。至于肉馅，有的是当晚切、有时是次日早晨切，但总不耽误营业为限。炉坊赶制次早所需的各种干货和蒸制品。在夏天所卖的绿豆糕，出笼后，要在地窖中放置一夜才能卖，因其间要数次用开水浸白布拧半干蒙换，以保其既潮润又利口酥甜。

萨拉齐万盛和清茶馆的锅盔是全县著名的。这家清茶馆创

建于民国初年，创始人叫马温，回族。锅盔，是当地的传统干货，数十家干货铺都在做卖，但都因惜成本而下料不足，且制作技术不得要领，故一直平平。马温为创自己特有的拳头产品，占据市场，不惜花高工资，从包头请来一位做锅盔有专长的外地的胡师傅，按其提要的糖、油配料标准，制作的锅盔外形美观、色、香、味俱佳，可口，一上市，深受当界顾客交口称赞，一举出了名，业务大增，占据了全县的主导地位。马良即是胡在萨的得意门徒。故万盛和的锅盔久负盛名，永销不衰，一直延续到日本侵略军向中国人民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因经理马温企图趁机发财，倾全店油、糖、面赶制干货，数倍价广收蒙疆币，蒙疆银行不予兑换万盛和清茶馆从此倒闭。

工人的雇用期和行规

饮食行业雇用和解雇工人，按其行规一般以三大节日为期，即阴历正月十五至五月端午节为一期，五月端午节至八月十五为一期，八月十五至正月十五为一期。其中堂馆儿（即跑堂服务员）和蒸稍美包子的拉风箱工人至正月初五。

在这三大节日，资本家要为工人们摆席酬谢。如果继续留用全体工人，就一起喝酒言欢；如果在席间资本家突然站起身，向那位工人师傅举杯敬酒，就意味着他将被辞退。资本家向这位举酒杯说：“你来本号辛苦啦，但因买卖不好，你可另寻高门吧！对有过失的徒工，是每年的二月二和八月十五为辞退期，所以徒工们最怕这两个节日的到来。

生活待遇

资本家对全号所有人员一起供饭和住宿，是为便于管理和

统一行动。每月工资，是烘炉（制作干货者）、蒸锅、面案、跑堂（服务员）的“领作者”（约相当于现在的班组长），其他一般工人的工资微薄；只能盼从每天顾客赏赐的小费中得到一些弥补。这些人当中，一部人有妻子儿女，但有不少人是光棍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尽管收入微薄，都有不同的恶习，一为嫖妓，一为吸食大烟。所以，这些人虽年复一年地辛勤劳动，却甚少积蓄和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甚至弄到连件象样的衣着，象样的铺盖都没有，随身衣服白天穿，晚上盖，头枕砖头过长夜，难享人间夫妻、父子的天伦之乐，终生可怜地过着独身生活。待到年迈体衰或疾病缠身时，被逐出门，生活无着，流落街头，成为篷头垢面的乞丐，最后因病饿死于街头。那些勤快的工人虽然成了家，但维持生计亦很艰难。

徒工在学徒期，一般在头年是供饭没工资，全年仅给两匹土布、一斤棉花作冬夏衣换穿。次年略给工资，三年后出徒，给最低工资，徒工学艺是最艰苦的。除了日常忙业务，还得侍候资本家本人及其家属。为了学到技艺，更要十分殷勤地服侍投拜的本师和其他师傅们。即使偶然分到一些小费，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孝敬师傅作烟茶钱。提水壶、倒便壶不必说，有时还要受师傅们的打骂。可见在当时学点技艺是多么不容易呀！

业余时间的文艺生活

旧时的萨拉齐镇内，既无正式的剧场影院等娱乐场所，更没有电影等现代娱乐项目。初春到深秋，虽然全县城乡有固定的庙会和唱戏活动，但他们是无暇光顾的。由于当地居民多为晋陕后裔，都对晋剧（当时叫“山西梆子”，晋剧一名是解放后才正式定名的）有所偏爱，故镇内各行各业、蒙、汉、回等

各民族中的晋剧爱好者（俗称“票友”或“片友”），在工余的下午，自带所长的晋剧鼓板乐器，齐集某个茶馆堂内，拉开桌凳、沏上浓茶，生、净、丑、旦等各个角色的扮演者应有尽有，但都不化妆，围坐在一起，自拉自打自己清唱。每出戏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唱下来。这种清唱活动叫“打坐腔”。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是佼佼者，有的人经此途径走上正式戏班，成为走南闯北的名晋剧演员。

资本家对这种“打坐腔”活动，一般不反对，有时因“打坐腔”反倒增加了他卖干货的很好业务。因而，凡在他的茶馆“打坐腔”就让徒工给这些业余清唱演员沏茶招待。唱罢，如果生意大增，资本家一高兴，还要赏以酒饭。在当时无公益活动的环境里，此种活动，每天要有一大帮人拥入堂内外围观和听戏，实际上是有益于社会一种良好的宣传教育形式，起码由于清唱吸引，减少了一部人的胡嫖浪荡和偷摸活动。这种自我娱乐的活动方式，一直延续到日寇入侵止。

萨拉齐镇内“打坐腔”，仅限于晋剧剧目。至于“二人台”（此名是解放后根据戏剧人物正式命名的）解放前一直叫“打玩艺儿的”或“小班”，以区别于晋剧（大班），当时的“山西梆子”和“大秧歌”叫戏班，领班的负责人叫班主。

当时的“打玩艺儿的”，演员仅两人，均为男性扮演，扮演者俗叫“滚边儿的”，扮女者俗叫“抹粉的”。乐器亦很简单，仅洋琴（打琴）、四胡、枚（笛子）、梆子、四块瓦儿（四块竹片）而已。男角一人多变，场地不拘，最适于边远村落人烟稀少之地演出。尽管当地不少群众喜闻乐见，亦有一定群众基础，终因它不及晋剧体面、排场而难登大雅之堂。“二人台”绝没有“打坐腔”之举之说。因为它绝没有象现在的地

位。

附：四和元清茶馆

据传，四和元开创于晚清，财东是现吴坝村的温、杨两家，营业场地在今萨拉齐中心岛东头。四和元前，从清末至民国间，有数间低矮的土平房，叫“堆子房”，据传说是清时驿站驿卒到厅县交接公文之处，类现在的收发室。民国十四年（1925年）国民军冯玉祥部的一位旅长孙良诚驻防萨拉齐，当时的七家大粮店因与军界交往中欺哄军队，孙良诚怒罚七家粮店投资，拆“堆子房”，由商会主办，用料拆除了县衙粮仓，其砖瓦木石移盖萨拉齐图书馆（1985年与四和元一并拆除，改建统建楼）。选这个地方开清茶馆颇有见地。首先它是镇内最中心之地，其次是面东百余米有一眼水质优良，取之不竭的古井（因周围众多的居民共饮此井水、故俗叫“官井”），是难得的两个条件。另传，最初开设的四和元是平房，旧时包头著名的四美元清茶馆的建筑规模就是仿四和元模式兴建的。后来出于忌讳，四和元把前堂拆除，改建为二楼。底层南部作收款和销售干货处，北侧及楼上设座作招待顾客进餐的场地。楼面东西向，前后均为玻璃隔扇，隔扇外均有阳台式廊檐。廊前有柱式旋就木制栏杆，主栏顶端雕刻着目视远方，栩栩如生的木猴。据说这是寓意猴能攀登高峰，寓示着业务兴隆，日日向上之意。顾客临玻璃隔扇而坐，边进餐边远眺，极目东大街之概貌无遗。该茶馆在民国初年的经理人员是大同人张大虎、张二海、孙玺、高尚文等人。日寇侵萨后，大约于1938或1939年，日伪警察署第一署设于县图书馆，因嫌其址狭小、强令四和元迁往北馆子址（即现在旗税务局印刷厂院），原址被警

察一署占据，直至日寇投降后，才又迁回原址营业。

二、饭馆

饭馆也有汉回之分，也区别于幌子的造形和颜色。饭馆门左右各悬一个直径尺余的圆形罗圈，罗圈用布围裹，自圈起，布被撕条状下垂，约近二市尺左右。罗圈意示炒菜金灶（炉）支撑京勺的铸铁圈，下悬布条意似面条，综意是此饭馆所卖食物，上至炒菜、下到面条都有。亦汉为红色，回为兰色，其余均类清茶馆。较大饭馆门两侧还悬挂黑底金字条联：“南北大菜”、“包办酒席”，常贴对联是“闻香须下马”、“知味可停车”等。

营业时间，上午开业略晚于清茶馆，下两三点，甚至晚七八点以后。

饭馆所需原料，要比清茶馆复杂的多，回馆专用牛羊肉，汉馆牛羊猪肉全用。炒菜水锅炉，亦以专用炉灶以壶炊烧，类清茶馆。

较大饭馆除通间大庭广设桌凳供顾客就餐外，尚辟“雅座”供不同顾客就餐施用。顾客光临后，其接待方法多同清茶馆。所不同者，除送、沏茶外，服务员首先问：几位吃点什么，介绍本店所卖菜谱，一般有两种方法：一般顾客只作口头介绍，一口气可背读几十种炒、溜、煎、炸、蒸的菜名任点，问到主食，包子（也有卖稍美者）花卷、馅饼、鸳鸯饼、葱花饼、脂油饼、家常饼、一窝丝、清油饼、糖饼等以及切面、面片、回勺面、余汤面、拉面、削面、剥面、炸酱清汤、打卤等面食和大米饭；汤类上至燕窝、鱼翅、下至不收钱奉送的高汤（白开水倒点酱油、撒点葱花、滴几点食油），“雅座”客多

送上菜谱册任选，并问是否喝酒。当时虽有瓶装酒，但为数甚少，一般饭馆不备，现喝现从附近的陆陈行（油酒米面综合加工销售的行业）打来的老白干酒。

饭馆的餐桌上不摆茶点，仅放醋、酱油壶各一个。顾客点菜后，服务员随即取来小吃碟、筷子、喝酒的带酒杯，“雅座”和上讲究的还放洁白的揩碟筷方块纸。紧接着，跟一位和几个餐桌上的多位顾客所点各菜，服务员向灶房高喊：“唉，×寸的过油肉×个，……。灶房炒妥后，以炒勺敲击京勺，服务员应声而往，分别把菜送到顾客面前，喝酒的，服务员或徒工把代热的酒亦送来。如果点菜较多，依次送来。请注意，服务员两手端菜也是一绝，你看他两手同时可端六七个满盛有汤带汁的热菜而点滴不撒，更不能撒滴在顾客的身上。在顾客进餐过程中，服务员不时还来征询还添点什么，味口咸淡怎么样，等等。顾客酒足菜好之后，让上主食，如果是馅饼等各种饼类，灶房烙妥后，以饼敲击饼鏊叫服务员，随即上汤。当时的大米饭，不似今天的人人有份的，那是稀食啊？

顾客酒饱饭足之后，喊服务员来算帐。服务员应声而来，服务员客气地说：您（们）吃好啦，再不添点什么啦？一一报名结算，然后撤去剩菜饭汤和碟筷酒具等，用抹布揩净桌面，送上热毛巾、漱口水，牙签棍儿等，有的再沏壶热茶。顾客进餐中，有时当面偿服务员纸烟或酒。顾客起身，服务员送，并向帐房高喊：“×元×角×分到柜”！收款和顾客偿小费、喊谢同清茶馆。如果顾客当面交服务员代交时，服务员则喊×元×角×分带下，把剩余找回交顾客，有顾客当面偿小费的，服务员当面谢。

较大饭馆，也常为达官显贵，富有的地主、资本家和官场

招待举办喜庆宴会，聚餐等活动。

还为一些点明饭菜、指定时间，把饭菜送到家里的。送饭菜的用具是一个椭圆形有提手和盖的提盒，饭菜少者提盒一底一盖，饭菜多时，加一至二节不等。有时一次送去有时分次送去。一般送饭菜到家者，偿小费较优。

三、莜、荞面饸饹馆

莜、荞面是当时当地一般人家的主要食品。它的顾客，主要是本城或过往此地的收入微薄者以及进城办事的乡村农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莜、荞麦是当地粮食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武川、固阳广种莜、荞麦的集散地。莜、荞面又价廉、实惠、深受生活水平低下者欢迎，故萨拉齐镇这类饭馆曾有多家。它的商业标志——幌子，是由上下两节宽圆形罗圈串连在一起，罗圈上涂颜色，以白兰两色画上波浪水纹，寓意锅水鼎沸之状。

莜面，有山川之分，尽管同样加工精细，但由于水土地脉关系，山莜麦色白精道，熟食利口清香，川莜面则色暗不精，适口不爽。因而莜面馆多以山莜面蒸卖。成品有压饸饹、推窝窝、搓鱼鱼（农家尚可垫葱花擀开卷囤囤、搓煮鱼子、搓划肚鱼、捏海蚌蚌、擀条条、包山药馅大蒸饺、拌山药丸丸等多种吃法）。调食莜面，有多种吃法，冷调、春季菜少，多为腌菜盐加腌玉头丝、山药丝，滴点油、放点葱末；夏季因蔬菜逐步上市，先后有水萝卜、黄瓜丝、烧、煮、腌茄子和鲜芋头丝炆上花椒油葱花、再加上小葱、韭菜、大蒜泥及油炸辣椒面，吃后再喝上一碗蒸面水（当地人旧有“原汤化原食”的流行说法），再吃上几片蒸山药片，鼻尖汗珠出，浑身大汗冒，那才

真舒坦呢！热吃有猪牛羊肉熬汤汤、烩菜调，余着吃等等。

荞面饸饹，干荞面用特制石灰水和起，稍软，填入饸饹床眼内压入开水锅中煮熟，浇上肉臊子，分大小碗，加醋热吃味美可口，经济实惠，深得城乡下层人士欢迎。在农、市民家庭中，还有丸圪团、擀条条等多种吃法。

在稍大的饸饹馆中，也有兼卖稍美、包子，甚至还有简单炒菜。这种饸饹馆又叫“烧胡馆”。营此业者，多为资金不裕，店堂简陋，设备简单，顾客坐蹲进食随便，老顾客较多，业务较为活跃。

以上无论清茶馆、饭馆、饸饹馆所供顾客的开水都不另收费；在当时禁论国事的境况下，所有店堂的墙壁上，都贴有：“衣帽自照”、“免谈国事”的警告标语。

四、干货铺

萨拉齐的各种干货，当时都较有名气。凡较大的干货铺都能保证油糖投放比例，确保成品质量，严守信誉，以畅其业务。经营方式批零兼营，前店后厂，中小户，特别是家庭户，为了赚钱，投料多取巧，技术较差，成品在观感和口味上均不及较大者。此种产品除自销外，多供乡间小贩贩卖，销价稍低于大户。清末民初，全县干货铺常达五十多家。

干货铺的主要产品有：

大炉（吊炉）货：各种月饼、大小提江、半月儿、鸡蛋贝子等；小炉货：白砣、干滴儿、糖、咸、素锅盔、糖咸素油旋、五香贝子、糖、咸、素三角儿、擦酥贝子等；油炸货：油饼、糖素麻花、酥麻花、大头麻叶、板麻叶、跑浆麻叶、灌到

麻叶、蜜麻叶、油折子、糖枣儿等；蒸锅货：现蒸馍、干酥馍（蒸熟后放在高边铁筛内，悬于炉火上烤焙甜酥而不焦，俗称一捏酥），深受老人、儿童喜好。具备制作上述条件而产品齐全者，多为较大干货铺，小本生意的家庭户，只能生产其中的几种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尽管当时全县总人数比现在少，茶、饭馆和干货铺却不算少，其产销路除本镇日常销售外，每年从初春到深秋末，全县有众多的定期庙会唱戏，销售干货数量可观；二是后来种、割大烟上市时，人员骤增，也加大了消费量；三是农民进城卖粮、拉秋菜、拉炭，下不起饭馆，为省钱省时，买个干货充充饥而已。

那时，顾客随时可以买到食物，即使半夜想吃，只要敲门即可买到，经营者不但不嫌太晚和起居麻烦，反而认为是“财神上门。”

较早出名的干货匠有：任茂、弓大嘴、李大、二怀龙等，近代的有张才元等。

做干货技术既平常又不容易，人与人之间用同样的原材料做出的干货，从形状到口头，差异很大。如有弟兄俩李某，都是干货匠，兄弟俩一块面做同样干货，弟弟做的色、香、味外表美观、干净，食之爽口，哥哥正规学艺多年，产品与弟弟完全相反，其关键在“手法”上。

五、糕点业

较早的糕点业三星成，开业于民国十一、二年（1923—1924年），那时的糕点叫“京点心”。产品全由手工捏制的酥皮货，品种不太多。后来相继开业的有宏庆斋、德顺斋、复盛厚、复义

厚等，产品品种较前有所增加。再后来清茶馆也生产销售“京点心”了。

当时乃至解放前销售“京点心”时，十分讲究包扎，用里小外大两层细白纸（同现在办公纸或色令纸）包成倒斗形纸包，上覆录色令纸和梅红纸、用木刻板印门票各一张，单细麻绳十字捆扎，留有提环。每包分一斤（16两）和十二两包。后来又发展为极薄木板特制点心盒，盒外圈裱糊印花色纸，盒的大小，类现在市场通用的长方形纸盒。此盒捆扎时亦上门票，以作广告宣传。

萨拉齐制作糕点的高手，要数回族退休老工人白召旦。他幼时学徒于包头（即现在东河区）瓦窑沟的本地班庆春和点心铺，学当地式糕点技术。后来，又到本市北京班同升元点心铺，学做京式点心。经入两处学艺技艺大进、眼界开扩，互取各家之长，以娴熟的技术，可制出许多品式的糕点。诸如：小刀切、破酥、烧饼、太师、白桃，钢卢、饼干、供饼。以上产品出售时，用纸包就，每包5个，每市斤20个，十件饼（16两秤，每个重5钱）、长寿糕、乌龙糕、薄脆酥、蛋黄酥、青梅酥、核桃酥、巴裂饼、大八件（每斤8个）、小八件（每斤16个）、罗汉饼、三鲜饼、立桃、卧桃、蜜柿子、莲花酥、菊花酥、千层酥、罗丝猴儿，白阳饼等。油锅货做成江米条、糖枣儿、桃花、小麻叶、芙蓉糕、三奇麻（蘸芝麻和青红丝）、喇嘛糕。夏天做绿豆糕，以及各式糖果制品。

那时，象样的点心铺，都要在销售门市部设玻璃看盒（即陈列橱柜），盒内陈列的样品有：破肚石榴（破肚处必须有颗粒较多、籽粒欲跌的石榴籽）、全佛手、柿子（必须带有柿叶和短枝）、鸭梨、立桃、卧桃等。这些陈列品都要着上近似真

品的颜色，酷似真品才是制作糕点老师傅的真技术。陈列品长期放置不能变形。目的是供群众参观，作广告宣传、招来顾客。萨拉齐虽有这样一位制作糕点的高手，可惜他现已年迈，在解放后独家生产经营，粮、糖、油严格限量，加之阶级斗争观念的主导，食品大众化，取消食品模式的资产阶级形体，桃酥成了独主市场的标准糕点。群众对萨拉齐副食品加工厂产品的顺口溜曾有：“酱油不成醋不酸，桃酥硬的象半头砖”的说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领导班子下决心扭转，曾由京津聘请高师引进技术和设备，目前可产三四十个糕点品种，占据了萨拉齐销售市场（前些年包头糕点大量涌入土右旗城乡）。这位生不逢时的老技工没有发挥他的技术才干，后继无人，白某一旦无常，这些技艺将眼巴巴地看着失传，实在为糕点行业惋惜！

此外，每逢元宵佳节到来之际，无论糕点业和茶、饭馆，都要加班赶制元宵应市；中秋节来临，又都在节前赶制粗细月饼、翻毛、提江、月光饼等节货供顾客选购，有的也代顾客加工烙制。

除上述正规行业外，市场上还有地方风味的油炸糕、水晶包子、火烧、馅饼、粉汤、豆腐脑、茶汤、咸肉碗砣等小食品摊列布街头或沿街巷流动叫卖，甚至延到深夜十点左右。

总之，在1937年以前，当地饮食行业是比较繁荣的。日寇侵萨后，虽有因大量种植鸦片烟这一毒害人民的虚假繁荣，但因面、肉均被日寇管制配给和实行组合制对面肉的控制，加之市面不时被日本宪兵、特务、警察抓人作劳工，抓车畜应官差，各行各业的人无奈上街，都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致使饮食行业业务清淡，倒闭者日增。尤其日本特务、警察闯

入白吃、白拿和寻找机会讹诈勒索，稍不满足，随时可遭毒打，甚至借故把人抓起来，扣上通共（共产党）、通匪罪名，送进特务机关，有死无生。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即在：青山剧场北口（现新风理发馆址）那时是一个山西祁县人（当地风趣称这个县的人叫“忽读亥”）开设的干货铺，由于口音而遭到警察的毒打。一个警察去白吃他炸的麻叶，老祁县惹不起，讨好地操祁县口音说：吃吧，麻捏（叶）鬼（灌）刀（到）哩。日伪警察理解为：“这麻叶叫鬼（警察本人）抓握了”的骂人话，因此，出手就打老祁县；又一次，日伪警察去白吃麻花儿，刚赶上出油锅，麻花儿还未硬，老祁县也讨好地说，“等等（祁县发音）、哄（风）吹吹硬哩。”日伪警察理解为骂他吃“红锤锤硬啦。因而也出手便打老祁县，成了老年至今的真实话题。充分说明日伪统治下社会人们的艰难处境。

据传，当时贩干货下乡出售的小贩，有的被扣上通共产党的罪名，被活埋在日本特务机关院内（即今土右旗医院病房址）。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后，日益压榨人民的反动政策不得人心，抓兵、逼粮（不种地的工商业也交粮）逼得人走投无路（回族李惠、马良、白召旦合开的义生厚干货铺就是因为屡次出壮丁款，最后交不起倒闭的）；包头春和钰药店在萨拉齐开设的分号春和钰，就是交不起所摊派负担的粮食撤回包头的。特务、警察的横行无忌，搅乱人们的正常生活，法币、美金、金元券的相继贬值，使物价飞涨，一日多变，把人民折腾的叫苦不迭。前一小时可买一斤面粉的钱，后一小时连一盒火柴也买不了；各项无名的摊派捐款多如牛毛，不住的飞到农工商头上，军队的频繁调动驻扎，人吃马喂任意糟塌，许

多商家经不起奇重负担而纷纷倒闭，即使勉强维持的四、五家到解放前夕，也已奄奄一息了。

解放后，工商等各行各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植下，获得新生，饮食行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回族李惠恢复了四和元清茶馆。其他人也重新开设了茶、饭馆，县供销合作社（在观百货三门市东侧）开设了合作食堂，也叫工人食堂（这就是当时萨县饮食行业称食堂之始），公私营饮食行业迅速发展。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中，私营饮食行业逐步走上公私合营和合作道路，以后又由公私合营过渡到地方国营企业，私方人员和职工、工人过渡成国营企业的职员，职工和工人。最后把饮食、服务两个总店合并成为旗的饮食服务公司，把过去分散的饮食行业，由公司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当时，萨拉齐城内的饮食业仅有一、二、三“三个”食堂，形成了独家经营的格局，干部、职工和服务人员抱住铁饭碗，吃大锅饭。

六十年代初，由于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加之其它原因所致，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物资短缺的困难。此时此刻，全国人民忠于党的指引，以“低标准，瓜菜代”的低度生活渡着日日夜夜。这种缺粮少菜的状况，饮食行业自然就受到了严重影响。食堂制作饭菜的主料和辅料国家都压缩了供应数量，实行核定标准供给。从此各食堂所卖饭菜数量减少、品种单调、质量下降。以往的各种炒菜和细粮制作的蒸、煮、炸佳品被大烩菜、粗粮制品代替了许多。每日营业时间不长，卖完为止。这时好的方面是物价一直稳定，没有随意涨价的现象。鉴于人多缺食的情况，每日所售饭菜供不应求。每逢午、晚高峰时用餐，顾客常常前涌后挤排队

买饭牌、收饭票、等坐位，甚至有时顾客之间为坐一个凳子发生争吵，秩序不够文明。大锅饭吃得人们不够勤快，服务质量明显下降。顾客来食堂就餐，不用说服务人员去热情热待，就是去打招呼的人也少见，甚至顾客问话也无人回答，实在是冷冷清清。饭菜做好后，服务人员不给顾客端送，让顾客自取自食。

饮食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在“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得到多少改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逐步落实，几十年禁锢的沉闷局面终于被打破，代之以新鲜、活跃、繁荣的景况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就饮食行业而言，国营的、集体的、个体的，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遍及全旗城乡，仅萨拉齐镇内外目前已达70余家。较有派头的大饭馆有万家首、新风（均设有雅座），1988年又新增了萨拉齐宾馆；昔日四和元清茶馆的风味稍美也于1987年元月在中心岛新址恢复，88年又恢复了四和元店名。各大小饭馆，均以良好的服务态度、美味可口的饭菜质量招来顾客，增加业务。其中，万家首于1987年首创，从北京高工资聘来烤鸭和炒菜师傅，从北京进货（生鸭）开创了萨拉齐地区的第一家北京烤鸭和天津狗不理风味小笼包子，使京津风味食品在萨拉齐镇内落户；新风和萨拉齐宾馆亦相继增添了烤鸭业务。

在近年公费大吃大喝风的盛行和蔓延下，每桌百元以上，二百元左右的饭菜，进口美国希尔顿高级香烟，茅台、西凤、汾酒和易拉罐等高级饮料，名啤酒充斥席间，几家高级饭馆的楼上楼下坐无空席，从午到晚，各型汽车在各家门前都停放几辆到十几辆，自行车之多更不用说。到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精神贯彻后，公费吃喝风有所收敛，这些较大的饭馆的业务量显然有所下降。

值得引起防疫、检疫部门共同注意的一个严重危害顾客身体健康的事实是，据群众反映：有的个体小饭馆，为了贪图肉价便宜和高额利润，竟然以低价买进米心猪肉作馅蒸售，须经经常加强监督检查和严肃处理。

此外，计量和物价部门，应切实加强对于饮食行业的产品重量的监督检查，群众反映分量不足，包括粮食系统的油条在内。

最后，旧时的茶、饭馆的营业场所，绝对不准乞丐登门，以保环境卫生和顾客心理，而今，各大小饭馆，要饭者常常站在进餐者左右，甚至伸手当面要，或把顾客吃剩的饭菜盘碟端起既吃又添，服务员也不加制止，这实在有碍观瞻和有违国家制定的《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张静安

土右旗的铺沙西瓜

土右旗所产的西瓜，远近颇有名气，堪称当地一大特产。相传这里种植西瓜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始于何代何年已难考究。就清末民初而言，土右旗当时只按古老种法的“明地西瓜”这个单一品种。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萨拉齐市场上提早上市了一种——“铺沙西瓜”，至今已达六十四年。

一、由来

土右旗创种“铺沙西瓜”的人叫赵八小是萨拉齐东门外小东营子村（现变电站处）人（其后人已迁居镇内）。赵出生满月后丧母，便雇奶于包头郊区古城湾村张姓人家。赵八小在19岁那年（民国十四年）才回到萨拉齐生父身边。当时，他们家租种着萨拉齐镇内关帝庙的部分庙地（即现在旗气象站址，是当时关帝庙和尚的生活来源之一），他就在这块地里试种了二亩“铺沙西瓜，”一举获得成功，得益较大，轰动了萨拉齐的市场。在他试种之初，邻居见他往地里拉沙，认为赵是邪魔作怪瞎胡闹，及至成功，又竞相学种。关帝庙的和尚把种“铺沙西瓜”的益处告诉给小袄兑村的刘大成后，刘也进行仿种。开始，结出西瓜的个头不大，善于总结经验刘大成就采取了用黑矾发酵人粪尿随水奶瓜的办法，结果西瓜的个头增大，产量增加，从原来的一颗西瓜三、五斤增加到十来斤。后来，沟门庙湾的孙秀也仿种，获益匪浅。这一种西瓜新农艺逐渐传到附近的火盘、三里房子等村，于是这些地方也普遍种起来。这期间，赵八小又回到奶父处，26岁那年才携妻回到萨拉齐，直到1962年去世。他的一生以种“铺沙西瓜”为业。包头郊区古城湾村很早就种“铺沙西瓜”，是赵八小把这一农艺传回了土右旗的。

“铺沙西瓜”虽好，效益亦佳，但在旧中国，由于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这项农艺始终没有较大的发展，只能保留种法而已。

全国解放后，农民分得了土地，“铺沙西瓜”才获得新生，真正得到发展。特别是小袄兑村，充分发挥其自然条件的

优势，大种“铺沙西瓜”。这里所产的“铺沙西瓜”不仅满足当地市场，而且远销集宁、察右前旗等地。旧社会统治下的西老藏营村，农民生活一直很苦。土改后，农民三海子、三圪旦首先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试种“铺沙西瓜”获得成功。从此，全村农民普遍种植，由于种“铺沙西瓜”这条收益可观的门路，使村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公社化以后，由于不采取因地制宜，而过分地强调“以粮为纲”，小沃兑等村的“铺沙西瓜”逐年减少种植面积，乃至停种。而西老藏营村则独树一帜，一直坚持广种，遂以种植面积最大（每年约三百亩以上），产量出多（约四百多万斤）而闻名全旗。

还需提及的是沟门的哈只盖村的旱地西瓜。这里，地处大青山南麓，向阳窝风，气温高，土壤全系沙质，故渗水好，湿度小，自然条件好于现铺沙地。西瓜成熟后，一经触刀，趁缝自裂，瓤色鲜红，瓤口沙脆香甜，凉爽适口，含糖量很高。据瓜商介绍，该村所产西瓜如果因堆放挤压过高，底层有被压扁者，只要不裂，另放他处，经宿自起复原。这确是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可惜该村后来再不种西瓜了。

“铺沙西瓜”因地理、气温、土壤、水源、粪肥等自然条件及种植、管理措施的不同，它具有瓤口色鲜（红或柿黄）、沙脆、清香、甜度高、凉爽适口的特点，加之它下种早、上市早，是继夏杏、李子等果类之后，先期登市的瓜类，堪称夏季止渴消暑的一鲜，因而很受顾客的欢迎。

二、措施

种植“铺沙西瓜”的关键措施是铺沙，铺沙的作用是为提高地温，白天，沙粒可充分吸收太阳的热量，晚上，可慢慢

地散发出去，这样，即使在当地寒冷的春天，也可使土壤保持适当的温度，以利瓜苗的发育生长。故凡准备种植“铺沙西瓜”者，必于冬季或初春，提前把沙子拉进地里堆放，待抢种罢小麦后，立即着手整治土地：平地、刮畦、浇水。待地表稍干后就铺沙，沙层不宜太厚，约一横指即可。沙粒稍大为好，但不能超过枣儿大。第二步就是打瓜窝，原先每亩打900—1000个，后来有打1200—1500个的。第三步下种。下种时间宜在谷雨至立夏之间。下种前，西瓜籽须搓去皮膜，簸尽杂质秕粒，水浸发芽。发芽有两种方法：一是开水炸法，即把处理干净的西瓜籽放进盆内，在早晨倒入适量的开水，并立即倾一碗叫“救命水”的冷水，用瓢、勺拂扬以散热，直至水温。在此水中需浸泡6—7小时，然后将水倒掉，用布蒙盖，放置热锅台上，次早即可出芽，当日就能下种；二是以温水直接浸泡7—8小时，倒去水，用布蒙盆数日，待发出芽嘴而种。下种时，最好能选择晴朗温和的天气，天气不好会影响西瓜的生长和质量。其具体种法是，从大盆中取少量已发芽籽种放入碗内，再向碗内倒入少量的水，以保持籽种的湿润，随种随取，每窝下种2—3粒。籽种放进瓜窝后，立即以土掩埋，籽上覆土约二横指厚即可。过深地温低而发荫，过浅难保湿度，都会影响生长，易于造成缺苗现象。谷雨前后下种的，半月可出苗，立夏前后下种的，七八天可出土，但以早种为好。第四步是防冻保苗，“铺沙西瓜”幼苗出土时，气候尚处春风不息之际，为了防冻和防止风沙打苗，须采取保护措施，事先须预先捏妥许多红胶泥圆壳，每到天晚时，在每个瓜窝上覆扣一个，待次早日头高时再揭起，天天如此，直至霜冻结束而止。解放后，由于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集体化以后，多以

购买残次瓷饭碗覆盖瓜苗，进入八十年代，更有以塑料薄膜覆盖的，它远比红胶泥壳、残次瓷碗覆盖更为优越，一则省工、省时，不需每天揭盖，再则保墒保温，并能起到防风作用。至于“铺沙西瓜”的定苗、压瓜条、留瓜等管理措施，和“明地西瓜”基本相同。

另外，据赵八小的儿子赵华介绍，赵八小还有几条种西瓜的特殊经验：要种的西瓜籽先用赤糖拌沤10—15天，泡种时再抖去糖，这是为增西瓜的甜度；上粪时，最好选择鸡粪，这种肥既能促使西瓜的生长又能辅增甜度，圈肥，厕所肥均可上。追化肥虽能结成大瓜，但瓢口、沙度都不会好，头铲（类锄）追肥时，粪肥要稀，待西瓜长到小碗大时，可追第二次肥，粪稍稠于第一次。到瓜瓢“红眼圈”时，再追第三次肥。如能这样做，结出的西瓜又好看，又好吃；下雨后如遇暴晴，气温突然升高，瓜叶上的水气大量被蒸发，这就容易“火扑”瓜蔓，必于当晚或次早用清水轻轻地浇一次水，目的是为瓜苗蔓“拉火”；阳历六月中旬的早上多起雾，雾气也容易引起“火扑”，也需要采取同样的方法拉火保苗；再就是选择“茬口”。谷茬和西瓜最好，山药茬、高粱茬种的西瓜瓜瓢丝大，种过西瓜的地，换茬七、八年后才宜再种西瓜，如果间隔时间短，西瓜一定长不好、瓢口也不好吃；西瓜地还要多锄，多锄了瓜瓢沙脆，少锄了瓜瓢发硬。以上是赵八小一生种西瓜的经验积累。

三、品种

土右旗种西瓜，北起大青山、南临黄河畔，绝大多数地区都能种，晚于“铺沙西瓜”下种和晚上市的西瓜，当地称为

“明地瓜”即区别于“铺沙西瓜”出苗前以泥壳或裂碗扣盖而名之。七十年代初，包头市外贸局曾把土右旗列入“顶心白瓜籽”（即打籽西瓜）基地予以扶植，但在“以粮为纲”的主导思想支配下，打籽西瓜根本列入不了当地正常的种植计划，各社队只能在边沿地角和碱废沙滩里应付种植，加之缺水少肥，产量不高，收入甚微，故不几年遂罢。此后，又有人引进“山东大西瓜”，最大者一颗可达四十多斤，终因其个大、皮厚、瓢空、口感酸、价高，不受顾客欢迎亦被淘汰，稍后又引进个小、皮薄瓢沙、味甜的“二十天红”西瓜；八十年代旗良种场引进“泰国西瓜”，近年又引进“红优二号”，“台湾西瓜”等许多品种，较广泛的用地膜种植，连黄河灌区的党三尧、小召子等乡村也让西瓜同原“铺沙西瓜”上市抢先了。大城西乡尹蛇营子村近年广种西瓜和种“顶心白”打籽瓜而发了财，有的因此进入万元户行列。

四、产销状况

解放前，土右旗的西瓜都是瓜农自产自销。销法有两种：一种是瓜农自己担瓜进城或设摊出售，或沿街叫卖，或为相与（即老顾主）送瓜上门。这种卖法虽然拙、麻烦、费事，但能卖得较高价钱，于瓜农有利；另一种是在瓜地里一次或分次卖给瓜商，此种卖法，瓜农收入稍逊。当时的西瓜产量虽然有限，但除当地销售外，瓜商亦运销于包头，呼市、集宁等地和附近旗县，最远销于张家口。

解放后，农业走上集体化道路后，土右旗的西瓜种植有了大规模发展的机会，一个时期，这里的西瓜大量地向呼包二市，集宁、察后前、后旗运销。当时外运包装不足，小商张长

命等人自购五百余条麻袋向外出租，每天每条麻袋收费五分钱，供瓜商和小袄兑大队等租赁使用。

六十年代，城镇瓜菜逐渐由当地副食品公司设门点统一经营。为了衔接瓜菜的生产与经营，每年在冬春和瓜菜上市前，包头市和旗的商业局、副食品公司与瓜、果、菜队召开会议，落实各项计划，并专门抽派数名联络员督促检查播种生长情况，由市二级站与旗公司、旗公司再与社队分别签订产销合同。西瓜一俟上市，旗公司即抽调多人在火车站附近临时设立一至两个收购点，收购社队以牛马胶车送来的西瓜，由有经验的收瓜技术员苏来有等人验质定价。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把传统的买卖瓜菜，看个儿估价的交易方式改为过秤计价办法。旗公司所收的西瓜，除按合同供应包头市场外，其余的分别调运呼市、集宁及乌盟的其他旗县，还曾远销天津，沈阳等大城市。

多年的实际经验证明：国营公司经营西瓜，就土右旗而言，有利有弊。利者，可广泛组织全旗货源并以正常价格销售，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弊者，通过商业部门的几道环节，瓜农通过供销社的分销店，供销社，旗公司，市二级站，再到城市零售门市部与顾客见面，层层加费用，层层报损耗，既加大了顾客的经济支出，又给国家带来许多经济损失，所以国家因经营西瓜而连年亏损，亏损额由国家负担。八十年代初，各业务部门根据其上级指示，逐步减少经营环节，组织产销见面，从而减少了国家经营上的损失，相对地增加了生产者的收入，顾客也能更满意地挑选西瓜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其优势，给种植西瓜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近年，每逢瓜市，当地的，外地的各种汽车满载西瓜，奔向市场，奔向机关团体、奔向四面八方。土右旗的西瓜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前途无量！也许有一天，土右旗的西瓜打进大都市，打向国际市场！

张静安

土右旗有一条重要古道

刘文信

原萨拉齐县（现土右旗）北依大青山，气候温和，南临黄河，为农牧业灌溉提供了优越的水源条件。从古代起这块肥沃土地上，森林茂密，水草丰富，是人类休养生息的理想地方。在土右旗沿山地带发现的几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说明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在这里居住过。据记载：战国以前，有林胡、楼烦等北方少数民族在此居住，从事猎牧。战国时期，赵国势力达到阴山一带，赵武灵王扩大疆域，北破林胡。为了加强对这一带的统治，依此来对付占据关中一带强大的秦国，改穿胡服，学习骑射。并在阴山以南建立云中郡（托克托县古城乡），九原县（包头西郊）。并从河套平原的西端沿阴山南边的山顶上修了一道长城，经山西直到河北宣化。土右旗正是在这长城必经之地。现土右旗水涧沟口，包头北郊大庙，土左旗毕克齐，呼和浩特市乌素图沟都有赵长城遗址。赵武灵王曾几次来云中、九原视察，并从河北、山西等地移民戍边。土右旗

地处大青山南麓与黄河北滨之间，又在云中郡与九原城中间，是赵国的军事、政治中心，邯郸来边疆的通道，也是修城、行军、戍边徭役必经之路。

古代黄河从萨拉齐城南几公里的地方流过。现在土右旗黄灌区的大部分地方原来都在黄河南岸。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才改道为现状。当时的这条通道非常狭窄，最窄处只有二、三公里（包头东郊沙尔沁一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方匈奴族崛起，严重威胁秦北部边疆的安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渡黄河，在阴山南北与匈奴大战，将匈奴逐走，又在这一带修筑44座县城。并将赵九原县扩建为九原郡，重立云中郡统辖这些县城。当时土右旗归云中郡管辖。同时在阴山以北修造长城，西起临洮（甘肃岷县），东至辽东。将原战国时代北方各国长城连在一起，这就是名闻中外的万里长城（现固阳县境内尚有多处遗址）。九原以西的河套地区是秦始皇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最多的地区之一。

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十余年，大军戍边就必须有超过这个数字的人服徭役，为他们运送粮草。据有关专家估计，驻军、徭役再加上修长城、修直道、屯垦等，到西北一带的人役在百万以上。这众多军旅人役是从那里来的呢？据《文献通考》记载：当时在秦都咸阳还有修阿房宫、骊山陵的徭役各70万，南戍五岑50万，当时全国人口只有二千万，关中及中原一带的青壮年，全部投入咸阳及五岑之徭役。而投入北方及西北的徭役则都来自燕、赵、齐、鲁一带（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据《史记》记载：驻守北河的30万大军，及为大军运送粮草的农民，要从山东沿海的东莱、琅琊动身，运往北河（河套一带）

一石粮食，路上本身消费约30石，他们必须自备一路的口粮，因此沿路死者相望难计其数。

据隋《冀图经》记载：自周、秦、汉、魏以来，出塞的道路唯有三条。东路是出右北平，经辽西至东胡卢龙塞（东北一带），为左贤王之地。西路是出陇西，经河西走廊至伊吾塞（现新疆境内）为右贤王所理之所。“中道北出太原、经雁门（山西代县）、马邑（朔县）、云中、出五原塞（包头昆都仑沟口），直至龙城（蒙古境内）。即单于十月大会祭天地之所也”。可见中道是至匈奴腹地的最近之路，也是战争的斡旋之地，土右旗正处在这条道路的云中与九原之间。秦统一后的十几年间，有百万余徭役往返通过此路，由此可见当时此路的重要性。

与土右旗这条古道相通的有关几条古道，分述如下：秦直道：秦始皇驱逐匈奴后的第二年，为加强对北方的统治，保障北部边疆的安全，下令修筑了一条从秦都咸阳，经朝那（宁夏固原）肤施（陕北榆林）、过鄂尔多斯至九原（包头）的一条国道，全长一千八百里。现伊克昭盟境内有多处遗址。

石门障：现包头市北大青山与乌拉山的分界线——昆都仑沟。这条沟道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与内地民族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历代北方战争的行军路线必经之地。

白道：现呼和浩特市北翻越大青山至武川县的蜈蚣坝。是从北魏至唐、辽、金时代比较繁忙的一条通道。

土右旗境内大青山有三个沟口。即：马留沟、水涧沟、美岱沟，都能穿越大青山直抵大漠以北，这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讲，是畅行无阻的，所以说，在古代，这些沟口要塞，都是战略桥头堡，兵家必争之交通要冲。现土右旗水涧沟

口的战国长城的烽火台遗址仍在（当地俗称点将台）。由此可以说明，通过这几条谷口，对研究土右旗古代的历史事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死后的灵车曾经过土右旗，“史记”有这样的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河北邢台东旧平乡县）。遂从井经抵九原。会暑，上辚车，臭，乃诏从管，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当时绕道远行的目的，是由于丞相李斯及赵高、胡亥（秦二世）与公子扶苏（始皇长子）及大将蒙恬之间争权夺利所致。这条路线是从井经（太行山南端之古今通道之上）经山西到云中、九原，再由直道南下至咸阳。土右旗正是这条道路必经之地。

汉初，疲于兵革，力不能征匈奴。及至匈奴全盛时期，阴山以南受到了严重掠夺。云中、九原、定襄（和林格尔县）尤甚。这对汉王朝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汉武帝时强大的汉王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人为帅，前后九次发兵，有几次是在阴山前和河套地区与匈奴大战。之后，汉宣帝、王莽新朝到东汉初年，曾与匈奴在阴山前麓多次交战。所以说，在这些时期，土右旗境内的这条道路十分重要。我国秦、汉、唐几代王朝都建都长安，从中原至龙城中道是最近的一条。秦始皇修筑的直道，从云阳（直道起点陕西淳化县）北行，经陕北、伊克昭盟到包头。这条道路，人烟稀少，且有沙漠阻塞极感不便。因此历代均取道山西太原北行，经土右旗境至包头昆都仑沟古通道去漠北。汉唐时期，这条古道又叫繹阳道。在石门障沟口东，有汉代古城固阳城遗址（包头东郊古城湾古城，亦说麻池古城）。唐朝又称此路为“参天可汉道”（北方少数民族通过此路，去长安参见唐代天子）。

从三国至两晋时期，中原战争频繁，无暇北顾。西晋初期，塞外遭受特大水灾，30多万匈奴和其它少数民族通过五原（包头）、云中（托县古城）入塞降晋。这个时期，原在大兴安岭一带居住的鲜卑族崛起，势力扩张到土默川，建立政权，即历史上的北魏。初期（公元386年）建都盛乐（今和林县土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后又迁都洛阳。北魏视土默川为其发祥地，极为重视。据记载：自从道武帝（398年）定都平城至孝文帝（495年）迁都洛阳的97年期间，北魏历代皇帝，北巡阴山达30多次，亲征柔然达17次之多。北魏为了防止逐渐强大的柔然族南侵，在阴山以北，在原秦、汉长城的险要处，设镇镇守，其中有六个最为有名，沃野镇（乌拉特前旗山后）、怀朔镇（固阳县白灵淖乡）是最西边的两个镇。北魏的政治军事中心——先后三迁都城。去阴山以北两镇，必经土右旗境内再经昆都仑沟方可到达漠北，公元523年，北方六镇军民起义，怀朔镇是起义的中心，主要战场是在怀朔及五原地区进行的。由此可见，北魏时期的土默川是一个异常繁荣和至关重要的地区。

南北朝后期至隋，阴山南北被新兴的突厥所占据，阴山南麓的大草原，当时有“敕勒川”民歌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句，是最好的放牧地区。

五代以后，中国处于大分裂状态，后晋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兴起，建国号为辽，土默川在辽统制之下。北宋时期，土右旗地区，一直在辽、金的统治之下。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帝国，被蒙古各部尊为成吉思汗。统一后，曾几次出兵对金和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及至征服中亚。大青山的各条沟道都是当时南征与西伐

的行军要道。

元朝极盛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新疆、阿拉善旗，包头经土右旗去到北京觐见元朝皇帝。

明代初期，土默川比较荒凉，因没有一个固定民族在此长久居住。到了嘉靖时代，蒙古族的杰出首领——阿拉坦汗率领土默特部落，由宁夏经河套地区驻牧丰州滩（土默川），后与其貌美精悍的爱妾——三娘子的共同治理之下，使这块土地空前繁荣，并在土右旗境内大青山南麓建立福化城（美岱召）为政治中心。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又和明朝修好，结束了多年的不安定局面。开辟集市贸易与文化交流，使这一带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各民族团结的一个典范，至今为各族人民所赞颂。

清朝康熙27年（1688年，新疆准葛尔部首领葛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攻击喀尔喀部（蒙古境内），翌年进犯内蒙。清朝多次出兵，从康熙29年至乾隆22年（1690—1757年）才将叛乱平息。康熙曾三次带兵亲征，多次驻蹕土默特川。其行军路线是由北京起程，过宣化、经大同进入土默川。再由包头西行。有一次，战争胜利后，从宁夏坐船顺黄河至托县，然后由陆路回到北京。

清朝康、乾时期，山西、河北等地大批移民来到土默川，使这块肥沃土地进一步得到开发，形成了土默川平原民族杂居团结的局面。逐步繁荣起来。

从我国古代起，到清朝末，几千年来，由于历代王朝的修城建郡，移民戍边，以及频繁战争的缘故，行军运粮，外事往来，集市贸易，文化交流等各种因素，都与土默特右旗有密切的关系，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浅谈二人台的形成与发展

张 毅

二人台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培育起来的地方戏曲剧种。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主要流行于土默川一带（包括呼市、包头、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同时传播到陕西、山西、河北等省。现在，呼市、包头、乌盟、巴盟、伊盟都有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职业二人台剧团。呼市土左旗、托县、郊区、包头市郊区、土右旗、固阳县，乌盟各旗、伊盟各旗，巴盟各旗均有二人台剧团（部分称乌兰牧骑、民族歌舞与二人台并存）。除此而外，内蒙西部区各乡镇农村、业余二人台剧团更是比比皆是。另外，山西省忻州市（专区），大同市，山西河曲、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康保等县都有二人台职业剧团，虽然数量不多，但活动范围较广泛，影响较深、深受群众欢迎。今天的二人台，已经是剧目繁多，行当齐全、传统戏、现代戏，大、中、小型戏都能演出，扎根人民、为广大群众欢迎与爱戴独成一家的戏曲剧种。当然，这束艺术之花也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栽培，长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追溯二人台的源流与形成，至今仍然众说不一。主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记载，难以考证。但是，就现有的史料查证和二人台老艺人的回忆（有些是几代老艺人的口传），对二人台的源流与形成，大体是清楚与可信的。谨就我之管见，略叙一、二。

二人台这一艺术剧种是蒙汉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劳动生息的艺术产物。所谈源流与形成与内地汉民大量流入，并一同开发内蒙古密切相关。远在新旧石器时期，阴山之下，便有人类繁衍繁息、捕猎农牧。例如：呼市东郊的“大窖文化”（中央文物管理局已鉴定命名）和呼市南郊托县仰韶文化、黄河流域海生不浪文化。这个时期，人类已进入氏族群体的定居生活。战国时期。阴山下（今呼市阴山段大青山）设置“云中郡”，此时，内地汉人住管此地，并有大量汉民移入，从事农耕畜牧。《虞氏记》：“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民见群鹤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戏乎！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城是也”（引自《资治通鉴》）。之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亦在云中郡（今呼市南托县古城遗址）颇有影响。由于建制的确立，蒙、汉人民（匈奴、林胡、楼烦等与内地汉人）已有往来，促进了生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此时已是“安乐无事，不见履军杀掠之忧”（《战国策·赵》）。秦始皇统一中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自榆中（今准格尔旗）阴山以南，设三十四县移民（汉人）充实、北假（今临河五原一带）、九原（今包头郊区）及云中（今呼市南）。那时，以呼、托、包三地构成的云中川（今土默川）乃是相当富庶之地，其城市之密集、人口之稠密，经济之繁荣，比之古代中原地区已不相上下。汉代驰名中外的明妃王嫱（王昭君）更是匈、汉人民团结建设的历史佳话。她对于胡汉平息战乱、友好团结、和睦相处发展生产，促进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每个历史朝代，都有成批汉人移入（或迁入）土默川，为发展生产、文化而共同劳动、创造，谱写了新的历

史籍草。

土默川是二人台生衍之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曾称为敕勒川、白道川、丰州滩。辽、金两朝。这里分属丰、胜、云内、粤边诸洲。元代自为丰州，明代则为北元。当时歌词中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等描绘这块好地方的词句。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及漠南地区，他的孙子阿拉坦汗成为土默特部的领主率部驻牧丰州滩，由游牧转为定居，并实行“养聚生息，招来汉民”政策。除发展畜牧业外，很重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明嘉靖时（1522年—1566年）内地汉民为逃避赋税、或经营商业、农业、手工业，大量流入，仅丰州一地（今呼和浩特）就居住着汉人数万，大都“居屋佃作、称为‘板申’（房屋）”（《明史》），明隆庆四年，阿拉坦汗受封为顺义王，明万历九年，阿拉坦汗死，其妻（三娘子）受封为忠顺夫人，由美岱召城迁于丰州滩，“别筑城居，朝廷赐名“归化城”，因此土默川逐渐形成半农半牧经济。据《清圣祖实录》记载：“清康熙时（1661年—1722年）数十万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的汉人携家带口，到口外蒙古地区垦荒”。之后，八旗官兵的驻防和外来人口的迁入，不仅商业益趋繁荣，内地的手工业工人也接踵而来。一七三九年，位于土默特中心的归化、绥远二城，已出现“小部梨园日出国，千家闹市入丰年”的繁华景象。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设土默特别旗，专管蒙民事务。土默特别旗包括河套以东及阴山以南大部地区，下辖七县。及至清末，包头和托克托成为商贾辐辏的水旱码头，其它各县也成为蒙汉杂居的城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土默川一带蒙汉人民

历经风雨、结成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在语言习俗方面，“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不易识别也”。土默川发达的半农半牧经济，“蒙汉相融”的民族关系，是形成二人台的肥沃土壤。她的形成，如同土默川蒙汉人民和睦相处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二人台艺术剧种的形成，分四个阶段。即蒙汉民歌（兼有蒙汉语混唱的“蒙古曲”）丝弦坐唱（即打坐腔）、打小班儿（打地摊、打玩艺儿）舞台演戏（成立职业剧团）。

土默川民歌，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用蒙语演唱的蒙古族民歌，如“森吉德玛”、“四公主”“三百六十只黄羊”，（二）用汉语演唱的山陕民歌及河北、山东民歌、小曲。移入（或迁入）土默川的汉人，大都以山西雁北、山西河曲、陕西府谷为多。河北，山东等地也有部分汉人迁入。演唱民歌主要有“走西口”、“拜大年”、“五哥放羊”、“打金钱”、“挂红灯”、“送情郎”等；（三）蒙汉语混唱的民歌、如“阿拉奔花”、“海莲花”、“喇嘛苏”等。由于蒙汉杂居的环境特点以及商旅往来，三种类型民歌相互渗透，形成了汉歌蒙唱、蒙歌汉唱和同时用两种民族语言演唱的独特艺术风格。人民称为“蒙古曲儿”或“风搅雪”。蒙汉劳动人民就是这样，在劳动之余，茶余饭后，围坐一块，唱起各自会唱的民歌，久而久之，融为一体，以此来抒发感情，“喜、怒、忧、愁、悲、恐、惊”均唱在其中。

丝弦坐唱，就是众人围坐一块，各操乐器、自拉自唱，或一些人奏乐器，一些人演唱。这种形式在家中、街头、红白酒宴均可举行。形式灵活自然，便于蒙汉民间艺人的艺术交流。在共同演唱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不断提高演奏演唱

技巧，从而互相吸取营养、丰富了民歌和表现力。清光绪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土默特民歌逐渐由随意演唱发展为丝弦坐唱。这种形式较之过去丰富，具有一定表演因素，但还是同曲反复演唱，没有人物扮相与故事情节，还不具备戏剧性。

清光绪末年，清政府再次放地，又有大批移民迁入。此时，土默川民间“社火”十分繁荣，内地戏班如晋剧、道情、秧歌不断流入，于是，从事丝弦坐唱的二人台民间艺人吸取了各种艺技的长处，也开始化妆，着戏服演唱。

打小班儿演戏。在代妆着戏服演唱的基础上，又学习借鉴了晋剧，道情、秧歌等艺术剧种简单的表演手法，开始了打地滩表演唱。艺人均为半职业娱乐，只在每年正月闹红火、庙会社火活动，或农闲时节进行。人物一丑一旦（俗称“滚边”与“抹粉”）。乐器只有枚（笛子）、扬琴、四胡，加击乐（四块瓦）、梆子。曲目主要是易于表演（载歌载舞）的小曲、小调，如“打金钱”、“打樱桃”、“拜大年”、“庆寿”及蒙古曲“阿拉奔花”、“海莲花”等。表演形式简单、一丑一旦、道具只有手绢、扇子等。这就是二人台戏曲的最初形式，就这样，二人台诞生了。随之后，清末民国初，土默川的城镇经济进一步发展，乡村人口增多，蒙汉人民聚居区，经济、文化均得到迅速繁荣，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二人台艺人迫于生计，组成小班，在逢年过节，农闲季节，开始在临近村社演唱，后来到外地的村镇、街头、巷口或赶庙会、串码头、赶大烟市、走商行等等。这种流动演出，没有舞台，也不售票，演出结束后，观众给点什么要点什么。有给钱的、给粮的、给物的、请吃饭的。这纯属“打地滩”演出活动，也称“打

玩艺儿”。是一种卖艺、乞讨生涯，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生活也十分艰苦凄惨。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有：“走西口”、“打樱桃”、“打连城”、“打金钱”、“挂红灯”、“牧牛”、“尼姑思凡”、“祝英台下山”、“卖菜”等，大部分是反映爱情生活比较健康的小戏。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小戏，如“妓女告状”、“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姑娘抽大烟”等。还有为迎合地主、军阀，商务老板低级庸俗的口味，编唱下流的曲目，如“听房”、“吃醋”、“扇子计”、“二姑娘得病”、“要女婿”、“叫大娘”、“十八摸”、“公公骚媳妇”、“小叔子挎嫂嫂”等。艺人们也是生活艰难，迫于无奈。这阶段，从事二人台演唱的艺人自由搭班、半职业演出，逐渐走向职业化演出，常年走村串户，城镇乡村以演唱为生。也有相当一大部分二人台小班儿仍然是农忙务农，农闲或逢年过节从事二人台演唱活动，直到解放初期。

随着演出的职业化，二人台在曲目、唱腔、表演诸方面均有创新和发展。成为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的小戏（即“摸帽戏”）；也有一些民歌由原来不固定歌词（称“烂席片”）发展成为有人物身份的小演唱，还有根据当地生活，编写创作的新剧目，如“打后套”、“水刮西包头”等。除此而外，还改编移植了一部分别的剧种的剧目。如“三国题”、“下山”、“张生戏莺莺”、“水漫金山寺”、“苏三叹十声”等。从事二人台演唱的艺人有蒙族，也有汉族。据老艺人追忆，一代代口传，和年长者回想，最早从事二人台小班儿演唱的是柴双羊（蒙古族、土默特云姓，即老双羊，祖籍萨拉齐县孤雁圪里更村，后迁居协盛永村，被老艺人奉为二人台的“开山祖师”）、

锁锁旦、狗狗旦、万人迷、阿力亚、秦亮等。解放初期较有名望的二人台艺人有计子玉、樊六，斑玉莲、秦五毛眼、刘银成、刘全、高金桂、充文彬、田全贵等。有名气的演奏人员主要有张换宾(吹塌天)、周治家(拉塌地)、赵四(神枚)等。在解放前夕，二人台虽然已经向戏曲发展。但还只是戏曲的雏形。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文艺政策光辉照耀下，二人台艺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得到飞速发展。首先是多年从事二人台演出活动的民间艺人，再不受歧视和凌侮了。政治地位平等，经济上有了保证。原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同志做了题为“二人台翻身”的报告，号召从事二人台艺术工作的同志们团结起来，为二人台彻底翻身而共同努力。随后，从一九五一年起，举办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共十一期，业余二人台学习会七期，这对于培养、提高二人台艺术人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先后共培训二人台艺术骨干近千名。之后，这些同志回到各自的岗位，后来都成为专业、业余剧团的骨干、名演员或组织领导者。通过这次学习会，创作编写了反映现实生活与斗争的小戏，如“谁是你的侄子”、“长工与地主”等，配合当时政治形势做宣传，起到了良好效果，这些小戏还由绥远省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三年，内蒙成立了“戏曲审定委员会”，以席子杰同志为首的戏审工作干部和群众艺校的二人台艺人及编创干部密切合作，搜集、整理、改编审定了一大批二人台传统剧目。如“走西口”、“探病”、“打金钱”等，并由出版社出版《二人台剧本选集》。同年，成立第一个省级二人台专业剧团——绥远省前进实验剧团。一九五七年，交呼和浩特市政名为呼市民间歌剧一团，呼市原有的两

个二人台剧团及集宁歌剧团合并为呼市民间歌剧二团。一团的主要演员是绥远省民艺会骨干、二人台会演的获奖者刘银威、刘全、顾晓青、乔玉莲等。二团的主要演员是班玉莲、郝秀珍、亢文彬、常润兰、王素珍等。与此同时，包头市也成立二人台专业剧团，主要演员有计子玉、樊六、高金栓、樊二仓等。随后不久，巴盟、集宁、伊盟都成立了二人台职业剧团，各旗县不几年也先后成立了二人台剧团，如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萨拉齐县（今土右旗）平地泉、东胜、临河、陕坝……二人台剧团，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加上乡村的业余剧团，就更难数清了。在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山西省大同市、河北省张家口市及山西忻县、河曲等地都相继成立二人台职业剧团。并多次派人来内蒙学习二人台技艺。呼市、包头支援大同、张家口二人台艺术骨干十多人。

一九五二年，绥远省举办“民间文艺会演”，会演结束后，选拔优秀节目，参加“全国首届民间艺术观摩演出”，这是二人台开天辟地头一回进北京演出，参加演出的有刘银威、刘全的“打金钱”，刘银威、高金栓的“走西口”。演出后，轰动了北京城，真可谓赞不绝口。一九五八年呼市民间歌剧团再次进京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得到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周总理、贺龙等首长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乌兰夫、杨植霖、苏谦益等内蒙领导与全体团员同游颐和园下湖划船并设宴招待。五十年代初，我区派出二人台小组，由姚士英同志带队，参加了华北分团文艺工作团，赴朝鲜进行数月的慰问志愿军演出。主要演职员有刘银威、刘全、高金栓、白万宝、张换宾、周治家等。刘全、张换宾等还进青海、西藏慰问平叛部队。除此之外，中央歌剧院、民族学院、天津歌舞剧院、上海

音乐学院等艺术单位还派人学习或请二人台专家讲授技艺。一九五九年，刘银威、班玉莲合演的“走西口”，韩世五、乔玉莲合演的“卖碗”都拍成了电影，还有不少二人台传统唱段和牌子曲灌了唱片。那时的二人台剧团真是红极一时，香飘塞外。

回顾起来，那时的二人台剧团已是上百人的大剧团，能够演出大、中、小型戏、古装、近代现代大小戏。演员已是各种行当齐全，乐队在三大件的基础上发展成庞大的民族管弦乐队。编创力量雄厚、舞台艺术、音响、灯光等力量也十分可观。经常上演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剧目其中有：改编整理剧目有“走西口”、“打金钱”、“打樱桃”、“探病”、“打秋千”等。创作剧目有“卖碗”、“闹元宵”、“借冠子”、“方四姐”、“娄小利”、“邻居”、“青山前哨”、“三棵树下”、“一把镰刀”等。移植剧目有“茶瓶计”、“天仙配”、“芙蓉花仙”、“白莲花”、“梅玉配”、“五姑娘”、“巧双配”、“刘三姐”、“洪湖赤卫队”、“南方来信”、“红色娘子军”等。为二人台艺术事业作出显著贡献的主要演员有，刘银威、班玉莲、樊六、计子玉、刘全、亢文彬、高金栓、顾晓青、郝秀珍、乔玉莲、韩世五、王素珍、常润兰、任粉珍、常燕、祁风英、张占全等，从事二人台剧目整理和改编及创作工作有贡献的同志有：苗文奇、席子杰，霍世昌、吕烈、李野、都钧一、董舒、姚昆、张文秀、陈宁、郭有典、南守忠、于瑞卿等。在二人台音乐搜集、整理、研究、改革、创作上作出贡献的主要有：王世一、吕烈、杨少臣、李雨田、澎书智、张善、赵金虎、王彦彪、张春溪、陈敬年、姚昆、赵鹏等。在二人台表演、舞蹈方面作出贡献者有：刘银

威、刘全、色楞道尔基、杜荣芳、李小梅、杜翠仙等。在导演上做出贡献的有：姚士英、白文奇、军肇昌、袁述、亢文彬等。在唱腔音乐上有所研究的有高金栓、韩荣等同志。长期做二人台组织领导工作有所贡献的有：姚士英、白文奇、吕烈、云程、田金贵、潘志宏、姜华等同志。

“文革”中，二人台艺术遭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二人台解除禁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地回春，二人台艺术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又新添了一批优秀创作剧目和年轻艺术新秀（略）。二人台艺术重新在舞台上活跃起来。

今后，广大从事二人台艺术工作的同志们，在党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为进一步发展繁荣二人台艺术共同奋斗吧。

旧话新叙萨县的人材

李维章

话须从一九四五年“双十”节说起。当时是傅作义将军荣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后（原系国民党第八战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特电令该部驻榆林办事处中将处长马秉仁（字彝轩）为“高级参议。”代表傅作义个人向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作礼节性的拜访和联络。马秉仁受命，在“双十”节后不久，开招待会并宴请有关方面人士。

招待会设在榆林县城内贾盘石中巷十六号“河北同乡会”大厅内。应邀到会的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上将)，“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中将)，“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少将)，“国民党陆军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通(少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特派员马鹤天，“国民党榆林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傅云，“国民党榆绥区党务办事处主任徐玉柱”，“绥远省土默特特别旗总管”荣祥(耀辰“塞外文豪”)，以及“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绥远省托县人)等二十多人。笔者当时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榆林办事处少校处员兼‘阵中日报’的特约记者”，有机会列席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庄严、隆重(这里不作介绍)。宾主谈论中心话题是：日寇侵华已陷穹途末日，中国抗战最后必胜指日可待。席间酒过三巡，菜上六味，宾主兴致高昂、欢声笑语。其时，邓宝珊将军话题转向荣祥、杨令德二位说：“耀辰、令德兄，同是绥远当今名士，一是“塞外文豪”，一是“名记者”，贵地想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山川郁秀、英材荟萃，也是我十二战区之重镇。有请二位介绍贵地山川、名胜，为收复故土建立功勋，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其时荣祥躬身答道：敝乡是绥远土默特平原，古称“敕勒川”。《北朝民歌》中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土默川北依巍巍大青山南麓，滔滔黄河北滨。土地肥沃，物阜民强。虽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耳(土默平原乃前套之地)，教育发展较早，人材倍出。敝人才疏学浅，承蒙邓总过讲，焉敢称作名士耶！此刻，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插话：“绥远地区虽说边陲，然教育开拓较早，为塞外之魁。东有丰凉(丰镇、凉城)，西有萨、托(萨县、托

县)人材济济,为人们所景仰,耀展兄,勿过谦逊,应直言明教,以开茅塞。”这时,荣祥沉思片刻,作答:“大青山高峰首推沙尔沁山峰,高耸入云,登峰眺望,海阔天空。长城内外黄河两岸,尽入目中,美岱山峦重叠、秀丽,景色宜人,尤以九峰山悬崖峭壁,雄伟壮观;大青山之红坝圈,地形险峻,有一人防守万夫难敌之坚固,目前均为我抗日游击健儿之根据地,英雄聚集,土默平原有哈素海,浩瀚汪洋,树木丛生,盛产鱼鳖,向有云川郁秀之称。敝人不揣冒昧,仅作三言,籍以概括”。于是荣祥便说道:

“大青山崔嵬而嵯峨。黄河水澎湃而灌禾。土默人磅礴而英多。”语音未落,博得满座热烈掌声与赞誉。

此时,杨令德起立拱手道:“敝乡,土默平原,浩瀚平坦,平绥铁路横贯东西。民族团结,亲如手足。唯锦绣河山沦为敌手,百姓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深望傅公宜生,养精蓄锐,整军河套,收复失地,解民倒悬,余之愿也”。敝人亦以三言奉献,敬乞察哂。杨令德随口道:“吾地坦且平,吾水淡且清,吾人廉且明”。又说所言不诗不文,信口开河,聊博一粲。顿时全场致以热烈掌声。共赞“塞外文豪”和“名记者”之才华出众与文学渊博,名不虚构,传为美谈。

回忆四十五年前的一次筵席对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难以忘怀。解放后,四十年来,笔者在萨拉齐执教三十载,与这里的山、水、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可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值得欣慰。

三十多年来,常想起那次席间对话,也和萨拉齐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材的成绩,曾进行过对照,深感名符其实。确实萨拉齐(今土右旗)是塞外文化古镇,名不虚传。于是我

翻阅过《萨拉齐县志》，并亲自访问过当地老前辈，将萨拉齐教育事业的根源进行了汇总，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括日伪统治时期），萨拉齐县共培育出受过大学教育和出国留学学者约百人以上。由此可见萨拉齐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成就是显著的。尽管这些老一代人有的谢世作古，有的远离故土侨居海外，还有的在国内和家乡，安度晚年，值得庆幸。笔者将这一资料会集在一起，作一简单的介绍，供诸后代参阅，不无益处。

谨将萨拉齐县从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受过大学以上教育和出国留学者的姓名、原住地、毕业学校、列于后表。如有不准确或遗漏者希来函更正或补充，十分欢迎。

（本文笔者除从《萨拉齐县志》收集外，并亲自访问了老一辈：周俊明、索绍常、刘秉义、周逸山等同志，提供了不少情况，特此表示感谢）。

附：萨拉齐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大学毕业生、留学生姓名、学历统计表。

姓名	别号	籍贯	毕业学校
祁志厚	定远	第四区苏波罗盖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尹世增	如川	第四区苏波罗盖村	美国欧亚大学
候瑞	子兔	第五区双龙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李献瑞		第三区土合气村	日本经纬大学
聂剑	成之	第三区黑麻板中村	北京高等警官学校
赵子让	水亭	第四区习力气村	山西大学法科
刘昆	玉珊	第五区大岱村	山西大学冶金科
马定国	可一	第三区沙尔沁	山西大学商科
张国宝	仁甫	第五区保同河村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张登魁	元文	第五区喇嘛营村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经天禄	革陈	第四区麦达召村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白映星	镜潭	县城内	国立北京大学
陈志仁	之的	第五区忽拉格气村	国立北京大学
任秉钧	和卿	第四区毛岱村	山西大学法科
陈国英	俊卿	第五区哈素村	中央大学政治系
王泉	永清	县城内	山西大学法科
田圃	立房	第五区公布村	北京农大学校。
李秉芳	子馨	第五区大岱村	河北大学
殷石麟		第五区大岱村	北京法大。
李浚	仲琛	第四区黑沙图村	北京法大
祁登奎		第四区苏波罗盖村	清华大学
刘志魁	子元	第五区保同河村	山西农村学堂
李俊	子英	第三区沟门村	清华大学

续表 1

姓 名	别号	籍 贯	毕 业 学 校
丁文藻	甫章	第三区沟门村	国立交通大学
鄂济民		县 城 内	济南、齐鲁大学
亢 仁	寿亭	第一区章盖营村	北京大学法学院
丁淑容		第五区黑沙图村	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陈国珍		第五区黑沙图村	北京中国大学
杜德城	子邻	县 城 内	北京中国大学
高存仁	乐山	县 城 内	北京中国大学
于维欧	铭西	第五区大岱村	辅仁大学
张为义		第五区	北京中国大学
王 恒	月如	县 城 内	北京师范大学
刘世明		第四区苏波罗盖村	北京师范大学
刘世藩	盛五	第四区苏波罗盖村	北京师范大学
陈明达		第五区大岱村	北京师范大学
多淑英		县 城 内	北京师范大学
胡效媛	玉卿	第三区土合气村	山西商业专门学校
刘 锋	振声	第五区保同河村	北京医学院
张 崇	宗山	第五区、三座茅菴村	北京警高等学院
张槃礼	静安	第五区五申桥村	北京警高等学院
祁登华	百荣	第四区苏波罗盖村	北京警高等学院
白 钺	黄佑	县 城 内	北京警高等学院
候斌成	宪章	第四区茆茆梁村	山西警务学堂
王 裕	庆余	第五区北西河堰村	山西警务学堂

续表 2

姓名	别号	籍贯	毕业学校
杜宗宇	晋臣	萨镇	山西大学
李如善	子祥	萨镇	北京美术学院
秦志富	桂庭	萨镇	山西大学
武其高		萨镇	华北大学
李锦全		五区大岱	北京师大
杨俊		萨镇	留学日本
张亮	绍明	萨镇	中国政治大学
董寿	福先	萨镇	南京政治大学
梁玉		善岱乡	西北联大
祁登文		苏卜罗盖	辅仁大学, 后留美
郝万元	全辅	善岱乡	北京师大
高云	子欣	沟门乡	黄浦军校高训班
荣祥	耀辰	美岱召乡	北京法政大学毕业
鄂恩普	(女)	萨拉齐镇	美国芝加哥大学
张登鳌	占魁	鄂尔格逊乡	山西党政学院
王上麟		萨拉齐镇	南京政治大学
张耀云	飞生	廿四顷地乡	上海复旦大学
郝永忠		党三尧乡保旦窑村	留学日本
李淋		毛岱乡黑沙图	陕西武功农学院
刘岱		萨县大岱乡	西北农学院经济系
郝绍文		萨县缸房营	西北农业大学
许昌		萨拉齐镇	西北农业专科学校

续表 3

姓名	别号	籍贯	毕业学校
田震		萨拉齐镇	西北农学院专科
董然涛		萨拉齐镇	西北农学院专科
祁登科		萨拉齐镇	西北农学院专科
陈国盛		第五区哈素乡	西北农学院专科
曹万化		萨拉齐镇	南京政治大学法律系
曲瀛真		(不 详)	西北农学院专科
张勇		萨拉齐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焦士道		廿四乡	北京师范大学
刘秉汉		大岱乡	北京师范大学
石峤英		吴坝乡朱尔圪岱	北京中国大学
李德茂		苏波罗盖乡	北京中国大学
张毅		萨拉齐镇	北洋天津大学
孙竹青		萨拉齐镇	不 详
张伯屏		萨拉齐镇	北京中国大学
高存礼		萨拉齐镇	北京地质学校
康兆丰		美岱召乡	北京师大
董世书		美岱召乡	兰州大学
石生华		萨拉齐镇	陕西武功农学院
李吉武		萨拉齐镇	兰州西北师范学院
田福		沟门乡威俊	日本横滨华侨大学
张同璧		双龙镇	北京中国大学
刘世和	美斋	萨拉齐镇	北京清华大学
白祯		萨拉齐镇	北京警官学校
刘廷彦	子士	萨拉齐	北京大学

略谈萨拉齐庙宇古迹

葛子英供稿王怀瑞整理

萨拉齐原叫翊翮，在此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的劳动者历时约三百年，建县将近二百年，修筑城墙不足一百二十年。就此，萨拉齐在塞外也算是比较古老的城镇之一。随着文化、教育、经济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在城内先后建起关帝、城隍、玉皇、观音、财神、吕祖、奶奶等庙宇。这些寺庙的历史较为悠久，而且殿宇古特，工艺精湛，足以够上本地的名胜古迹。但是，这些有着奇华异采、古风古色的建筑物，却在解放后为破除迷信而遭到了损坏，搬掉神像拆倒庙，竟把前人千辛万苦创建的古文物一扫而光，地盘改建，旧材改作其它用，再也无法作为远乡近邻爱好者的游览观赏了，甚为可惜。

撰志者总是想将原有已亡的东西搜集成章，载入史册。如秦时之阿房宫早已失存，然西汉太史公司马迁不惜余力，到处搜集资料将阿房宫形象撰写成秦朝宫室。笔者愿将萨拉齐的古迹，以关帝庙为主及其他六庙情形略述于后，一方面弘扬前人创造的工艺美术，又为后代追思古迹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 帝 庙

关帝庙位于县城中心偏东南方向，是清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始建，三十八年竣工。庙宇规模较大，布局合理，

工艺精湛，可称城里七庙之首。在大约二千四百平方米的平地上（含西院）筑起正殿九间，东西配庭各五间，院内过亭在中，亭前两侧各有房室三间（前配庭），月宫门过道通向两边的小院，巍峨山门面朝南开，整个寺庙构成了长方形状。建筑基础均系石头垫基，兰砖砌墙、木柱顶立、通瓦盖顶，样式大方美观，雕刻、绘画工艺细腻，确是一座雄伟的庙宇。因而曾受到外来商旅的赞赏。他们说：“像这样的庙宇不但塞外未曾见过，就连关南（山西）也几乎少见”。的确，行人看见山门牌楼外景即会产生雄壮美丽的观感。

从山门入庙。登上七层台阶是十二米宽的山门丹墀。台上筑起纯木山门牌楼，楼斗勾连，斗拱叠起，砖瓦盖顶，是中高旁低凸字形状。山门前后砖包围墙，壁刻花纹，外加木棚保护围栏。山门顶端悬挂一块高一米的立式木牌，上书“关圣帝君庙”五个金字。下槛两侧一对小石狮门墩顶立门扇。平台上，一对绿色石制雄狮蹲坐两旁；台下直竖两根木质铜顶旗杆（嘉庆年间所制）。东西旁门以砖代木，磨砖筑成。旁门两厢是钟、鼓二楼。底围墙迎面各有一个字池，池中一书“朝钟”一书“暮鼓”四个大字（约四十公分）是两楼的对称建筑。从底楼登小木梯上到顶层，西楼挂钟，东楼吊鼓。一进山门两侧塑有二骑，一为黄色、一为赤兔色，身高一米七、八，马目用真毛嵌眉，颈带红缨串铃，鞍辔齐全，马势三脚站立，一脚开弓姿势，各塑一童执药，二骑显得威武英烈、栩栩如生。

从后山门七层台阶下米，沿引道前行二十米许到了中院三间正方形过亭。亭南北两边磨面兰砖砌墙，十二根明柱顶在檐下，椽檩相勾，出进门面屏扉为墙，筑成了出厦式亭台。明柱底坐是圆形石头，石上仿照钉头钻刻两圈，造成了鼓的形

状。这种建筑，从表面看工艺不足为奇，但稳如泰山，建庙迄今已有二百一十多年，未曾发现过任何斜错位现象，想石工必有留的诀窍。明柱四面旋口牙板都是玲珑剔透的刀刻花纹，旋顶替木中间块块皆是木雕，刻着各种不同的奇华异采。如，过亭后门楹柱旋口牙板上刻着的“喜鹊登梅、老鼠闹葡萄”两幅动物画，形像逼真，维妙维肖，真乃木雕工艺超群。亭顶四面出厦挑角，下垂合金钟铃（约30—40公分高，直径20公分）。钟铃造型美观，镂彫花纹，悬吊起来微风吹不动，若摆动起来便是四、五级风力，钟铃声音清脆悦耳。亭门顶端悬有木匾，上书“大义参天”四个字，苍劲有力。亭内墙壁粉绘，四围墙下立着石碑。碑芯是楷书文字，碑座、上楣、边缘刻制各种花纹，顶芯标题多为篆书，字迹端正有力。

从过亭后门出来沿引道再向前走二十米左右到了正殿台前，步上七层台阶便是雄伟的抱厦和九间正殿。其中正中三间为正，六间平分两侧为偏，同正殿连成一体的抱厦是配套建筑。九间正殿是一线起的。后墙、山墙和隔墙均是石基砖砌，前墙是十根明柱分档竖立，档中安装成宫殿式扉扉，当瓦扣顶筑成的出厦式殿宇。殿顶上是五脊六兽。正脊中间立有一米高的三物，一物是大象，背驮好似古塔叠起，象旁两物纯属塔型、尺度略低中间大象；其余各脊都是兽头中前，但兽叫何名，难以说清。同正殿连成一体的抱厦是柱式建筑，前排四根成行、二排两根担边、后排乘用正殿四柱，十根明柱围成方格、担木扣瓦盖顶，筑成长檐抱厦。左右边脊弯形沿中，角下垂合金钟铃一对（后已被盗），观赏十分优美。厦内顶端悬匾较多，可谓匾群，前后、左右，连同正殿内外共有43面。匾额书体，正草隶篆各样俱有。正中梁一匾书有“真大丈

夫”四个字，字迹苍劲有力。前中檩悬匾为正楷书写“正大光明”四个字，笔势庄重敦厚、气韵严谨。上述二匾书法出众，在匾牌中夺魁。在正殿门柱挂有一付木制楹联，右联为“**单刀**跨马入候门进则以义退则以义”，右联为“挂印封金辞相府名不动心利不动心”。传说此联是明代傅山书写、后人由山西省×××地依样托来，剔刻制作的。此联书法具有感人之态，动人之悦。殿内彩画装饰，塑像满位。一进殿门，便是斗砖铺地，天花板顶棚围至前二中梁，二中檩至檐至露明椽都是彩笔绘画，画出山水花卉、鸟兽飞奔，工艺精细，令人入胜。围板前悬一块特制横匾、点缀有致，十分美观，匾底翠玉兰色，上书“气壮山河”四个金字，字画悬浮绘画，上端是八洞仙人云中浮游，下端是山水风景、鸟兽、花卉，看上去是花中套字、字上现花，优美至极。正台龛阁坐着一米五、六高的关羽塑像。关羽身着绿色战袍暨有金绿色披甲，腰结玉带，脚登朝靴，金脸佛面，手络长须，右手架髦，左手托膝，蚕眉凤眼，气宇非凡。台下摆着一张供桌，桌上陈设香炉、供器、馨盂，是恭敬时的用具。供桌两旁站立孙乾、简雍、周仓、关平四位塑像。孙乾、简雍执册抱簿，关平托印、周仓持刀，整个殿宇显得一派森严。

从正殿出来走至院中，东西两侧落有配庭。东、西各五厢，是对称建筑。三面庭墙石基磨砖砌成，宫殿式屏扉独挡前面。庭门前檐台排栽四根明柱，椽椽勾斗，与屏扉前墙紧紧连接在一起，构成五脊瓦顶出厦式庭宇。东西两庭屏扉和出厦椽椽都是彩笔绘画，四面外山墙刀刻槽池，池中一刻松鹤、一刻丹凤、一刻骏马、一刻竹鹿，山墙前码头刻画工艺更为细致，有的是水陆动物，有的是翔毛花卉，海马朝阳、犀牛卧月、朝

阳、夕晖刻绘在四个后墙码头。庭内没有塑像安坐，但是，满面墙壁彩画有素，从“桃园结义”开始到西配庭“水淹七军”止，整整画了半部《三国志》。

配庭南端围墙上留有对称便门。东便门出去是奶奶庙院，西便门外侧又是一座小庙院，院中座落三间出檐正庭，内坐四位塑像，一为鲁班，一是龙王，其余两塑不知何名。东墙壁上砌有一块与墙齐平的碑状石板，上边刻着交纳布施人的姓名、金额（多为手工行业），落款建于乾隆三十八年，道光二十四年重修；板尾具名；住持僧宗禄、宗寿，僧徒荣华、荣贵等。

再向前行是前配庭。东侧三间、西侧三间，全是砖木结构出檐建筑。庭内设备简陋，纸打顶棚，大炕一盘。东庭镇公所办公占用（民国年间），西庭是商会差役宿舍。靠配庭北山墙是牌厢。牌厢墙壁素画，椽檩彩绘，内立碑牌十五块，其中东碑厢七块，西碑厢八块。

前配庭和山门间隔之间落成一对“月宫门”。所谓“月宫门”，是用磨砖砌成月亮似的圆洞，供人们来往通行。东门出去是奶奶庙院和剧场。西门外是一处小院。院内有三间普通房屋，门顶上端悬一匾，上书“超公踊跃”四个字，后来，这是商会的办公室。院中没有什么摆设，只见房背壁中心砌有一块“照壁”上刻成方一米高大的一个“福”字。

据说，建筑关帝庙的工程师和各种技工是从山西五台聘请来的，他们都是能工巧匠。在施工建设中，设计周密，工艺配制协调，因而建成了工程质量高、工艺精细、美观大方、雄伟壮严的庙宇。监建人：张乡耆。末期住持僧法名：清庚。庙会节日是正月初二日，演戏三天。

现在，关帝庙还残存着抱厦、正殿和东、西配庭。但是，

已经改变了原来装饰的面貌，成了土右旗制药厂的车间、库房；拆除了的庙址建起平房作了办公室；原来的剧场地址现为旗教育局招待所占用。

玉皇庙

玉皇庙建于清朝乾隆初年，是一座小庙。后在四十八年（1783年）蒙汉人民又进行重建，扩大了寺庙规模。约在一千八百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正殿、配庭、过厅和山门钟楼等建筑物组成了一座整齐的庙宇。

上了九层台阶便是九间正殿，其中三间正殿中塑有玉皇大帝坐像，地下站立八大金刚；东正殿塑轩辕皇帝坐像，地下塑有站像；西正殿塑着班禅师祖坐像，地下也有站像。从正殿下来，东、西两侧各建五间配庭，东庭内安坐药王神农氏，西庭塑像回忆不清了。庙院中央是穿心过厅。过厅前，东、西两边又有各五间房室，是和尚的宿舍、炊事室、仓库所占。山门宽阔，组成的建筑物较多。门中两侧站立“四大天王”塑像，门墩外卧石狮一对，一对旗杆迎天直竖；山门左右留着旁门，一侧是钟楼、一侧为鼓楼。

本庙有和尚管理。末期禅师和尚法名：诚来，共有徒弟九人，比其它各庙和尚都多，经济收入也大；但到民国年间就远不及关帝庙了。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为庙会节日，由和尚筹备，商行资助（主要是成衣、罗笼、饮食行业），演戏三天或五天，热闹一番。庙址现改建成包头市水泵厂用。

城隍庙

城隍庙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位于解放街东段坐北向南。庙的规模不算很大，占地面积约一千八百平方米。以砖木为材，建有正殿九间，东、西配庭和前庭各五间，后堂庭房三间，别野两间，山门前旁设有钟鼓楼，山门东西有旁门，山门墀台宽敞，上卧石狮一对，庙院中央直立铁鼎一尊，所有这些建筑物构成了庙宇的整体。

正殿中央塑有城隍坐像，长方形供桌摆在台前，安放供品齐全，供神使用。殿内两旁塑站四像，一持笔砚、二捧簿籍、三是牛头手执三杈长矛、四为马面手拄狼牙锤。东正殿塑有判官坐像，西正殿塑有城隍小像。这位城隍小像安坐在抬架上（无顶桥）两面加杆，每年逢寒食节这天雇上桥夫舁上出府，在街巷巡游一次。

东、西配庭有十六个站像，是阴府衙役，形状奇怪，手持各种刑具，个个张牙舞爪，看上去使人惊心动魄。有一个青面獠牙、形像阴险狡诈的塑像，只要稍微碰动它的脯胸，眼球立即活动起来，小胆成人和一般儿童都怕的不敢进庙观赏。

后堂内的供台龛阁坐着城隍奶奶佛像，台前摆放供桌一张。桌两旁站着四位姑娘塑像。堂内套间为寝室，设备不错。地下铺着8×8的白兰色栽绒地毯，木板做炕，炕上常放缎被褥两卷，缎靠枕一对。院中杨柳成荫、鸟语花香，是玩乐避暑的好地方。

前配庭，西庭为和尚宿舍，东庭在早用途不知，后来本庙和尚为赚得大笔收入吸食大烟，从东城门外“寄骨祠”专管灵

柩而失去信任的张三那里，接拦灵柩存放东庭。尸体腐烂，年年逢到夏季臭味满庙，直到日伪时期才督令葬埋。

每年有一个祭祖城隍神灵的节日。节日由站候社主办，有二人台、晋剧交替演出三天。二人台在山门墀台演毕，晋剧接着在剧台开戏，形成对台表演，较为热闹。

本庙末期和尚法名：和月。庙址已建农机厂办公大院，剧场建为车间。

观音庙

观音庙是分年度建成的。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完成了庭、房、门等主体建筑工程，形成了庙宇。间隔三年又补建起乐楼和钟鼓楼，庙宇完整了。庙址建在南城门里大路西侧地带，坐北向南。在大约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筑起出厦式正庭五间，东、西配庭各五间，山门，还有钟鼓二楼和乐楼（乐楼除庙会外，平时不开放）山门台上蹲着石狮一对，台阶两侧竖立一对石制旗杆，旗杆造型美观。上述就是全庙的主要建筑物。

正庭中三间内塑南海大士观世音菩萨坐像，东、西侧庭都有塑像，供桌、供器齐全。东配房是和尚的宿舍（末期和尚法名：和寿）；西配房在民国年间南区小学做了教室。庙会活动节是二月十九日，由恒山社主办，演戏三天。

庙址在六十年代全部改建了民房，东西配房尚存，也为居民所住。这宅的后墙是白灰线条古砖实垛，现正对二道巷西口偏南些便是。

财神庙

财神庙建于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座落西城门内大街南端，占地面积不足一千平方米，建有出厦正庭五间，南、北配房各五间，单山门、旗杆、石狮、钟鼓楼俱有，并有坐东迎西的戏台，所有建筑均是砖木结构。

正庭中三间，内塑商纣之赵公明谓之财神爷；南一间内塑马王神，是三头六臂十二掌，掌中持有刃剑钺斧，棒锤钩镰；北一间内塑何像未知。

南北配房西区小学与和尚占住，单山门内无装饰，旁有便门。

庙会活动节日，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三天，由西大社负责经费开支。此庙庙会不同于其它庙宇，有其俗习特点。每到春节初二日五更时，有附近商店前来迎接财神，来者都是大、二执事掌柜，在财神塑像面前焚香、叩拜、鸣放鞭炮举行礼节。他们认为迎到真财神，能招财进宝，纳布施比之多花一些。

最后本庙当家和尚法名，音善。庙址已无痕迹，在六十年代百货公司建家属房占了半数，其余扩为马路。

吕祖庙

本庙建于嘉庆八年（1802年）座落北门内路旁，有抱厦式正庭三间，单山门。庙院是土围墙，西墙上留有一个小便门。在庙庭西侧大路中单建起一座与庙相依的楼阁，楼底下是约宽六米、长十二米的穿心洞道，行车无阻。洞顶上铺底，长与宽

均是十二米，四周砖砌八十公分高的透孔围栏，中间落成庙庭。庭中隔墙分成前后两厢，各开一门。前庭塑有手执宝剑的坐像，名叫真武，隔壁背后塑坐是文质彬彬，面向北方的文昌。

吕祖的庭宇，抱厦在前，四明柱围边。东边厦抱柱横梁上挂着六十公分大的一个铸钟。宇内塑吕纯阳之像，称谓吕祖。吕祖金脸佛面，巾冠黄眼，手持拂尘端坐于龛台中间。台前设有供桌，桌上备有供器香炉、馨盃、签筒。

大路西是禅院。院中有正房五间、西房五间，除和尚占用外，北区小学做了教室。

庙会活动年年一次，和尚主办，牛祺社资助。倘若年遇农人抢墒下种，庙会节日推迟到秋收后的九月初进行。本庙庙小收入大。末期禅师法名：本虞，有两个徒弟。原庙址东一半在六十年代改建为民房，西一半建路占用。

奶 奶 庙

奶奶庙建于乾隆三十八年，庙址东毗育才书院和巡警营（两院合并）西连关帝庙，建筑占地一千二百平方米。该庙在民国二十四年某天突然发生火灾，一夜把七间正庭焚毁。后于二十七年（1938年）仿照原貌重建，当年告成。

新建庙宇有出厦正庭七间，上庭台阶五层，露明柱六根，屏扉门面。东、西无厦配庭各五间，也是五上台阶。有山门、旁门，门外即是剧场，南端是剧台。

正庭内景：斗砖铺地，画栋雕梁，内壁彩绘，外壁瓦刻，抱柱珠红油漆，旋口牙板三兰颜色素画，可谓鲜艳夺目。内沿

北墙筑成长形坐台，台上塑着突头式月牙形一座山岭，树木、花草、鸟兽陪衬。岭中留有上圆下方三个洞孔，洞中各塑奶奶佛像，并且金山还约有半百小洞眼，庙会前夕住庙和尚暗暗塞入部份小泥儿，没生养儿女的夫妻在节日那天早去暗暗摸回家里去，如若以后生下男或女，便认为是奶奶给奉送的，要酬敬还愿。

山墙两边有台墩四个，上站塑像。西配庭是和尚宿舍，东配庭为仓库。庙中央立着铁鼎一尊。山门简陋，走廊门前有耳室各一间。

重建庙宇，是由丁绍先、刘子民、杨清兰、甯天贵、张步云、张百平等筹办的。他们重建正庭用的技工是：木工崔双宝、瓦工刘梅令（二位系萨拉齐人）；塑工阎才旺（原萨县五区人）；画工张宝（沟门村人）；检监人、泥匠宝子王××（萨县城内人）。这些技工，由于技术水平差异，经过验收表明，新庙塑、画工艺高于旧庙标准，而瓦、木刻制等工艺不及原旧水平。本庙新建落成后，四月十八日庙会节未变，由和尚筹备、工商行业主办，唱戏三天。末期禅师法名：清庚，他连同关帝庙一齐管理。

七庙之谈就到这里。在撰写前我去访过一些知情老者，共同回忆了古庙的情况，信心百倍地想全面、细致地写出原各庙建筑、工艺设置状况和风貌特点，留谕后世。但是，由于七庙建筑各异，工艺复杂、名目繁多，同时又失存多年，其中细节实难以写出，再加水平不高，只能作出上述轮廓介绍，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提出纠正意见和补充，以便完善古迹形像。

萨拉齐街巷取名由来

葛子英供稿 王怀瑾整理

萨拉齐在最早时期荒野人稀，仅有少数蒙古人民在这里居住。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开垦移民，从山西、陕西等邻省陆续迁来不少汉族人民。农民垦田、工人营建房屋，蒙汉族人民共同建设祖国山河大业，为子孙后代谋幸福，共享康乐。后来在萨拉齐建立县制，修筑城墙。

在始建房屋时，清朝政府一无规划，二不投资，完全由老百姓自财自力任意兴建，因此房院伸前缩后很不整齐。那时并无街巷，随着人们聚居建筑方位而称呼。东边的谓东营子，靠南的称南营子，靠西的叫西营子，北边的叫北营子。自从建县设厅才有了比较简略的规划，按规划逐渐将各个营子连建起来，形成萨拉齐的街巷。在同治年间开始给街、巷取名。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原来取名的街、巷又有不少更改。现就当时街巷取名的由来分述于下：

街巷取名

萨拉齐街巷的名称，大都以乡土、功名、人物、商号、事物、典故等而取的。

（一）以乡土乡情取名。比如，从山西忻州、崞县、大同等地迁来本地的人，他们居住在一块，而且在本巷又占多数，

因而取名忻州巷、崞县巷、大同巷等……。

(二)以商号取名的。如永和店、德懋永是两家商行。他们经营粮食和杂货，当年在本地享有盛名。因此他们开店巷道便得名永合店巷、德懋永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当地的知名人士刘盛五回来萨拉齐永合店巷买到一处住宅后，于是便把永合店巷改为“光复巷”了。

(三)以功名职位取名街巷。如，张××约在咸丰年间考中进士学位，府第建在南营子一个胡同里，庭房有角兽、大门口蹲着一对石狮，可称功名人家。因此，把这个小巷定名为“张进士巷”，解放后改名归了大南街。又如，丁绍先在日伪时期，担任萨县公署第一任县长，伪县政府更换门牌时，就将丁所在的北五道庙巷改为“丁绍先巷”。

(四)从社会安定程度来取名的。比如太平街，原称后衙门口。这里因驻扎保卫团(地方治安队)，歹徒不敢轻易在这一带胡作非为，故取名“太平街”。

(五)以人物取名的，旗杆巷就是一例。清朝期间，候管代(官衔)名宪章，买到周××一处砖木结构、三合头出厦式庭院，自己栽起一对旗杆，因此取名“旗杆巷”。由于他的官衔品级不够清王朝规定在庭竖立旗杆、门蹲石狮之类的资格，由地方士绅出面反对取缔了旗杆，但巷名未改。日伪时期“旗”字改用“棋”字仍叫“棋杆巷”。因字非音同，解放后改为“勤劳巷”。

(六)以人艺取名的。太匠巷就是这个类型。最初从山西太原迁来的小手工业者居住在这片从事雕刻、油画、炉食等工艺，而得名“太匠巷”。

(七)以典故取名。“孝帽巷”是很典型的一例。事情发

生在同治年间。本巷住一户赌博汉，其名不知，其妻姓李。她多谋巧辩、又善于交际。因丈夫赌博输钱甚巨，讨债主逼得无法，她设计让丈夫以讨债为名外出年余不归，许多债主果然不来了。可是还有个赌棍经常来逼要欠债，而且责骂家中老小。李氏感到这计不行，另设一计。她聘用一人把丈夫的鞋和一袋书信装好，一日乘赌棍正来家逼债时，手持书信布袋交付李氏。李氏见到鞋物惊异地询问来人，来说：“我在河边拾得这些东西，特意给你送来”。李氏接过东西查看书信，书信云：“因债务累累不敢回家见债主，只有死路一条，再世重逢吧！”李氏便又哭又闹地向赌棍说：你把我男人逼死了，你要偿命。后来做了一顶孝帽给儿子戴上，假设灵堂作祭奠。可是这个赌棍居心不良，继续去讨债，并且逼李氏作他的续房。李氏为制服赌棍求得安宁，在翌年萨县同治文山迎春之日，李氏趁机拦桥告状。她备有清水一盆、明镜一面，和披麻戴孝的儿子跪在道旁。文山下桥叫李氏伸冤后，让母子二人回家听候。不久，文山下令将地痞流氓、歹徒、赌博汉抓获押牢审理，有罪者法办，有民愤者挖土筑城墙。李氏的官司打赢了，从此李氏住的小巷便取名为“孝帽巷”，日伪时改为“小磨巷”，解放后又改为“工会巷”。

关于街巷取名和更改原因不止上述这些情况，还有许多。例如“马阴阳巷”后来改为“前进巷”，是为破除迷信的缘故，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斜街斜巷形成原因

萨拉齐有几条斜街斜巷，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中自然形

成的。如现在粮食三库门前，是早年萨拉齐的农牧产品中心交易市场之一。东民主巷、西民主巷（当时称新县营子）是市场的东南窗口。凡通过大沃兑、公盖营两条大路来萨拉齐成交自己农牧产品的农牧民都要经过东、西民主巷进入市场。随着市场的繁荣，顺路两旁逐步建起了房屋，这样东、西民主巷便形成了斜巷。在同治年间萨拉齐筑起城墙后，民主巷通向东南的两条大道被堵塞。

后炭市斜街也是同样原因形成的。早年这里是一个煤炭集市。运售煤炭的伙户、车户为进城路近，从西北方向进沟内拉上煤炭往来路经威俊进入萨拉齐西北门，年长日久踩成一条由西北略偏东南方向的斜路，路两边建筑起房屋就成了一条斜街。

失存街巷

在建设中由于需要，有些原定名的街、巷已经失存。比如太匠巷，原从中心岛十字街南口起，到城关镇镇政府门口东侧止，因修建拆除划归了大南街；茅屎巷，原在中心十字路北起，至现在的图书馆止，也因扩建马路统归了大北街；入市街也已消失。其街东起镇政府机械厂，西至现在的公共水暖锅炉房止；县府巷，由原武装部门东侧向北，直至后炭市街，因兴建楼房，旧址无影迹了；西三道巷，因建起民房堵塞不通了，失存的街巷不止这些。例如耶稣教堂西墙外，原南北直通一条叫“一人巷”，就因建筑堵塞了。如此等等，不再多叙。

总之，萨拉齐的建设昔不如今。解放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萨拉齐的建设速度更快，原城内筑起数座高大楼房和一

批高质量住宅，拓宽大街铺成柏油路面不说，城墙四周外的建筑也扩大了镇的范围。尤其是从东门外至西北门外这块土地，原来基本上是荒滩，现在工厂、宿舍、办公楼建筑也无空隙，与原来的旧镇连成一体，形成了很多新街新巷，这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谈新街新巷，谨就原街原巷的名称，及更改情况供读者了解。兹列表如下：

城内街巷名称及更改情况明示表

原 名	更(现)名	原 名	更(现)名	原 名	更(现)名
大东街	大东街	东猪圈巷	利生巷	崞县巷	崞县巷
学校巷	学校巷	西猪圈巷	节约巷	大同巷	大同巷
复兴街	复兴街	头道巷	头道巷	野鬼三道	西三道巷
大东后街	解放街	二道巷	二道巷	张家巷	共和巷
永合店巷	光复巷	三道巷	三道巷	财神庙巷	自由巷
郝家园子		四道巷	四道巷	复合西巷	开明巷
东河槽	东河槽	大场面	大场面	夏家巷	堵无巷
碾子巷	碾子巷	大南街	大南街	万恒店巷	运动巷
王状元巷	劳动巷	马阴阳巷	前进巷	东柳匠巷	红卫巷
董厚衣巷	光明巷	水圪洞沿	水圪洞街	西柳匠巷	向阳巷
东五道巷	利明巷	管家巷	英雄巷	岳文明巷	同乐巷
园子巷	园子巷	太匠巷	进步(无)	油房巷	后炭市
南河槽	南河槽	德懋永巷	益民巷	后炭市街	后炭市
东新县营	东民主巷	关帝庙巷	(堵)	西北门街	西北门街
西新县营	西民主巷	正大街	和平街	大北街	大北街
回回巷	回回巷	孝帽巷	工会巷	通顺街	和平街

续表 1

原 名	更(现)名	原 名	更(现)名	原 名	更(现)名
	团结巷	入市街	绥中街	杨仁巷	革新巷
	变工巷	茅屎巷	拆 无	忻州巷	忻州巷
三官庙街	互助巷	土地祠巷	拆 无	北五道巷	联盟巷
复兴隆街	互助巷	大西街	大西街	丁绍先巷	凯旋巷
关帝庙街	大众街	一人巷	堵(无)	张拐拐巷	凯旋巷
铁匠巷	无	纸房巷	纸房巷	后沙滩	新劳巷
棋杆巷	勤劳巷	达子巷	光荣巷	张进士巷	新划入大南街
西营盘	营盘街	天盛隆巷	自新巷	玉皇庙街	劳动巷
魏家巷	积极巷	张二威巷	兴隆巷	吕祖庙巷	无 迹
赵老三巷	永远巷	小街巷	己 堵	常家巷	新民巷
礼拜寺巷	育新巷	卢福街	农业街	中市街	中市街
太平街	太平街	北达子巷	友好巷		

百灵庙暴动的领头人

——云继先

土 夫

1936年2月，正当大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加紧叛国投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动下，云继先毅然率领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千余名官兵，高举爱国抗日的旗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灵庙暴动。

云继先系土默特蒙古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生于原萨拉齐县（现在的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乡后湾村，其父云宇是内蒙古辛亥革命著名的领导人，云继先从小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云继先少年时在本村读过几年小学。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天，他与乌兰夫、奎璧、云长河等人入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由于受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接受革命思想，积极上进，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李大钊将其送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和1923年入党的土默特蒙古族云耀先分配在一起，先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后在第一军的云耀先团任警卫连连长。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山东境内时，云耀先牺牲。1928年春，云继先奉部队党代表之命，专程将云耀先遗骨运回家乡安葬。不久调南京驻防。1930年——1932年在南京军政二校蒙藏高级教育班学习。

1932年秋，云继先应邀回内蒙古帮助德王组建蒙古干部学生队。行前找乌兰夫征求意见，乌兰夫对他说：“可以，你去了要把队伍带好，要为内蒙古民族以至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效力。”蒙古干部学生队成立后，云继先任队长。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后，云继先任保安处第二科科长。

1935年，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加快了叛国投日的步伐，引起了蒙古族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蒙政会内部也动荡起来。这时，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委员奎璧以及党员李森、赵诚、云清等有关人员，多次到百灵庙进行武装暴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乌兰夫告诉云继先等人：只要德王公开投日，我们就在抗日的旗帜下暴动，率领蒙旗保安队占领百灵

庙，通电全国。

1936年元月下旬，云继先等回土默特旗过春节，专程去向乌兰夫报告情况，商量问题。乌兰夫给他指出：“德王投靠日本，是民族的败类，是祖国的叛徒。一旦德王公然在日本的操纵下搞起独立运动来，我们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暴动一搞成，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暴动发起之后，能占住百灵庙就在那里扎下来，如不能占住百灵庙就从那里拉出来。”对乌兰夫的意见，云继先表示赞同。

这年的2月18日，云继先等回到了百灵庙。这时德王已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设日本顾问部，而且改元易帜把叛国降日的心迹已化为行动。蒙旗保安队中的爱国官兵人心思变。云继先见事态已至燃眉之急，就与朱实夫、云蔚等商量确定了暴动的有关事宜。

2月21日太阳落山后，暴动人员按计划分头行动。云继先、朱实夫身着便衣去了南卡，不顾哨兵的极力阻拦，强行闯进新兵连队长云麟的住屋。云麟见来头不妙急忙去取枪，被同屋的司务长伊力盖抢先把枪抢到手中，并与云继先、朱实夫站到一起。云继先、朱实夫对云麟说：“我们要脱离德王。德王追随日本人，和日本人勾结。我们不跟他干这个，你听我们的。”随之，云继先控制了新兵连，并派遣各分队长带领新兵向军械库赶去。与此同时，云蔚说服了巴征玉中队，袭击了稽查处，击毙了顽固不化的李凤诚，然后合兵一处，智取了军械库，夺得大量枪枝弹药。当夜凌晨两点多，全体暴动官兵和文职人员在南卡会合。大家胡乱填饱肚子后，云继先和暴动骨干们商量，临时把部队编成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特务队，并让文职人员先行出发，一中队担任后卫。翌日凌晨四点多，云继先带着

暴动队伍离开百灵庙，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方向进发。

当暴动队伍行进到岔岔村六公里处时，德王的百余袍子队骑马追击而来，担任后卫的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入战斗，边打边走，约半小时，追击的人马被迫返回。云继先命令部队在白音陶勒亥村住了下来。当夜，云继先让文职人员和部分体力差的官兵，乘坐傅作义派来的汽车先走，并打电报通知保安队驻乌拉特中旗的陈应权带队到武川会合。会合后，暴动队伍达一千一百人。

二十三日，当暴动队伍行进到当浪忽洞村时，傅作义密令孙兰峰的三十五军四二一团将暴动队伍包围。二十五日，在傅作义的策划下，由任秉钧和苏鲁岱起草，曾厚载改稿，以云继先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发出了通电，与此同时，傅作义又派温永栋带六辆汽车来到暴动队伍驻地，以欺骗和逼迫手段收缴了暴动队伍的武器。当时云继先虽已清楚陷入了傅作义的圈套，但考虑到在傅作义辖区行动，一旦发生冲突就将腹背受敌，于是屈从了裁决，决定到前山再相机行事。

暴动队伍到了台阁牧后，云继先和朱实夫进行了重新编队。将暴动队伍编为一个总队，两个大队，两个特务队。云继先任总队长，朱实夫任副总队长。为了应付日本特务机关，暴动队伍接受了傅作义临时给予的“归绥防共大队”和“萨拉齐防共大队”的称号。云继先带“萨拉齐防共大队”驻水涧沟门、板申气一带。

绥远省当局对这支暴动队伍严加防范，并用少发乃至停发军饷、军衣的手段卡他们，以求达到使他们自动离散的目的。德王对这支暴动队伍更是恨之入骨，不仅通令缉拿云继先、朱实夫等人，而且派员潜入暴动队伍进行策反工作。

这年六月，“萨拉齐防共大队”驻板申气一个分队的一百来人哗变东窜。云继先得知情报后立即率部由水涧沟门赶去阻击，结果击毙二人，跑掉十来人，其余都被拦截回来。

这年九月上旬的一天，绥远省参议赵锦标给暴动队伍训话，无端指责他们不安分，不老实，进行露骨的威胁，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这时，混在暴动队伍中的德王爪牙章文锦等人乘机发动哗变，于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从毕克齐先行动手，首先绑架了云继先的警卫员韩伍，接着以“喝兵血”为由囚禁了云继先和朱实夫，在夜色未尽时枪杀了云继先。九月十四日，傅作义派一个团的兵力乘铁甲车、骑马追击哗变队伍，击毙百人，打散一部分。不久，中共西蒙工委联合当地爱国人士，以百灵庙暴动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为骨干，重新成立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以后又几经改编，逐步壮大，在我党的实际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经雨传

史银堂

—

王经雨，原名王景玉，1911年5月出生于萨拉齐县（现土默特右旗）河子村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候常听母亲讲《三国演义》、《水浒》、《岳飞传》等故事，见到不公道的事爱打抱不平，直到争出了是非才肯罢休，见到穷人遇难、他常把自家的

钱、粮、物品予以接济。因他排行老二，家里人与村里人常亲昵地称他为“二麻烦”。

王经雨八岁读私塾。十五岁进入包头省立二中学习。进校不久，他认识了因躲避国民党逮捕从绥远公学转来的李逢春。李逢春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见王经雨学习吃力就主动给他补习功课；见王经雨富有正义感就给他讲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讲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列宁的革命事迹。王经雨听后对共产党有了初步印象，对列宁产生了羡慕敬仰的心理。李逢春还把他收藏的都德的《最后一课》，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纪念碑》，赛甫林娜的《第四十一个》等作品借给王经雨阅读，王经雨读后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为《第四十一个》塑造的女英雄的果敢机智行为而深深感动。当王经雨了解到李逢春家庭穷苦，依靠哥哥背煤赚钱供给时，便常常把自己的钱和衣物周济李逢春，帮助他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1928年9月，王经雨转入中山学院学习。在中山学院他又结识了1927年加入少年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刘深源及杜如薪、苏谦益、杜珽等进步青年。在这些青年的帮助和影响下，他阅读了高尔基、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辛克菜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语丝》、《创造》、《思想》等刊物上登载的文章，了解了我国南方红军闹革命的情况，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形成了鲜明的爱憎观：对共产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向往；对封建团体、国民党反动派则鄙视远离，深恶痛绝。

有一次，国民党选省代表到中央开会，学校负责人白镜潭派人到各学校活动，要选民选举他们指定的候选人，并采用“拉米式”的方式引诱学生加入国民党。当时白镜潭的得力干将高存仁对王经雨说：“咱们萨县人应抱成一个团体，那样力

量就大了，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充任宣传员或纠察员，能拿到不少月薪……”

王经雨平时对高存仁及其鼓吹的那个团体的胡作非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当即明确回答道：“我是来念书的，不是抱成团体同人家打架的！我家有的是钱，不缺薪水花！”

高存仁见金钱、地位对王经雨没有诱惑力，就亮出底牌恫吓说：“你痛快点儿说，入不入我们国民党？”

“我现在对国民党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等弄清楚了再说吧！”王经雨不慌不忙地给了他个软钉子。

“你不入党要干甚？”高存仁狡黠地又问。

“我想谈恋爱。”王经雨有意地把题差开了。

“入党也可以谈恋爱。”

“那我还是先谈恋爱后入党吧。”

高存仁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不几天，有个叫张海芳的女同学又来动员王经雨加入国民党，王经雨估计到是受了高存仁的委托而来的。结果坐了许久，谈了许多甜言蜜语，也没有丝毫打动王经雨的心。

又有一次，王经雨的一个在国民党任职的亲戚，穿着相当漂亮的军装从南京回来了，王经雨回家正碰上他鼓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井冈山红军的“战绩”。开始王经雨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越听越蹙气，于是就打断他的话抢白道：“你们把红军消灭完了没有？你们把共产党消灭完了没有？红军和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把剥削阶级消灭不了，被压迫的人们就要起来反抗！”

“那……反正少了……”那人被王经雨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发问和议论弄得十分尴尬，半天才喃喃地说出这几个字来。后来

气得饭也没吃就走了。

1929年春天，刘深源因闹学潮被当局怀疑为过激分子开除了学籍。这在王经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感到在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里，青年人是没有美好前途的，思想极度苦闷，想到革命成功的苏联寻找美好的生活。1930年春天，王经雨与班内一个外蒙有亲戚的女同学贾洪恩交上了朋友。贾洪恩经常给他介绍苏联及外蒙的情况，并借给他《中学生日记》和《大学生日记》两本书。他两曾商量一同先去外蒙然后再去苏联的打算，但后来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去成。这件事王经雨终生引以为憾。

1931年，王经雨从中山学院辍学回家。当时刘深源正在美岱桥以开小铺卖货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河子与美岱桥相距八里路，王经雨成了刘深源小铺的常客。碰到地下工作者有危难，他就主动引到自己家里，供吃供用，谈论时事。1933年，杜如薪、杜琏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追捕，藏到了王经雨家里。几天后，杜如薪又引来一位从北京来做地下工作的李同志，在王经雨家住了四个月。这期间，刘深源、杜如薪、杜琏、李同志与王经雨在一起看书读报或到山沟里游玩、谈论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得到不少启发和帮助。那时，王经雨把自己比做孟尝君，在房内挂着“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甘”的字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王经雨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激动、兴奋。1936年为了寻找出路，他自愿去受了四个月的壮丁训练，嗣后又考入傅作义的军官学校住了四五十天。原本打算到军队中施展自卫救国救民的抱负，但他见到的是教官们吃喝玩乐，听到的是学员们的污言秽语。国家的存亡、人民的苦难、他们全然不顾。王经雨明确认识到抗日

救民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他们身上，便又回到家里。

1937年10月，归绥、萨拉齐、包头相继沦陷。王经雨看着大好河山被日寇铁蹄践踏，人民遭战争蹂躏，心如刀绞？寻找着抗日救国的道路。

二

1938年秋天，奉党中央和毛主席之命，八路军李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支队敌工科于源到美岱召一带开辟工作，主动找王经雨了解情况，讲述李支队挺进大青山的目的和任务，动员王经雨出来帮助他工作。这时，王经雨的三弟王如玉从八路军支队政治部回到家里，说他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并说八路军就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改编的，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是人民的子弟兵……王经雨听了这些介绍，心情万分激动！参加革命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而今这光明大道就摆在他的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投入这一革命行列，痛快地答应帮助于源开展工作。一些亲戚知道王经雨要投身革命队伍吃惊地问：“你走了咋呀？这么多的家业你不要了？你的母亲、妻儿、兄嫂、姐弟都不顾惜了吗？”

王经雨斩钉截铁地答道：“国已破，何以为家？咱们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我王经雨不当亡国奴！”

王经雨的母亲对儿子的抗日决心非常赞赏，她叮嘱儿子说：“我不怕你革命抗日，只怕你老狗扒墙头，扒上一下就软下来。”母亲意味深长的话成为王经雨此后坚决抗日革命的巨大动力。

于源把王经雨安排在美岱召伪军自卫团赵明亮部当文书。

一开始他想不通，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于源看出了王经雨的心事，就给他讲打入敌伪内部开展工作的意义和方法。王经雨知道了自己工作的份量后，便主动和自己团中的同乡、青年拉关系、交朋友、争取他们抗日。与此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给八路军购买物资，传送情报。当他得知于源要找安全地方印刷宣传品时，便把于源安排到自己可靠的亲属——陈顺家里，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年年底，我党又派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等同志来美岱召一带开展工作。经于源联系，王经雨又和他们接上了头，一起研究制定了在美岱召一带建立抗日救国会和党组织的计划。1939年2月，李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专门找王经雨谈了话，使王经雨真正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救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砥柱……从而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切迫愿望。同年3月，经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介绍，王经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将原名王景玉改成了王经雨，意思是要经受斗争风雨的考验，将自己锻炼成坚强的革命者。

王经雨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主动。白天，在伪自卫团内给官兵做工作；晚上，进村秘密串联，以拉家常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的意义。很快，在美岱召、美岱桥、河子、沙图沟一带秘密组织起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接着又从救国会员中挑选骨干成立游击小组与党的组织。这时王经雨介绍刘深源入了党，并变卖一些家产给游击小组买了一支枪。

就在这一时期，八路军经常派武工队到美岱召一带配合当地的游击小组开展活动，但不时遭到伪警察和特务的袭击。美

岱召警察署有个叫达挠的特务头子，是协力气人。他凭仗对本地情况熟悉的条件，想尽各种法子刺探武工队和游击小组的活动，并惨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王经雨和武工队的同志们商议决定除掉达挠这个祸患。

九月中旬的一天，王经雨从美岱召伪自卫团部给正在协力气的达挠去电话，他寒暄了一阵后说：“赵明亮队长请你马上来团部，有要紧事商量？”接着用关切的语气说：“为了防止出事，我带两个弟兄到半路接你。”

“好，我马上去。”达挠以为自卫团发现了武工队与游击小组的什么活动情况向他汇报，放下电话便别上手枪，兴冲冲地出发了，过了大脑包村来到美岱沟口河槽，就看见王经雨从对面走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当时正值中午，四野无人，异常寂静。王经雨快走几步迎上前去，显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抓住达挠的手说：“你辛苦了！”两人没说几句话，后边的两个人已经赶到。两支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达挠的胸口。

“不准动！举起手来！”

“啊！”达挠惊叫一声，疑惑地看着王经雨。王经雨朝他轻蔑地一笑，露出两颗尖锐的虎牙。那两个人立即上前下了达挠的枪，并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王经雨低声向那两个人交待了几句就返身向美岱召伪自卫团部走去，达挠被押到了大西沟八路军的根据地。

当天夜里，狡猾的达挠趁看管战士不备，偷跑回村。第二天，王经雨得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吃一惊。他考虑到这下自己的身份要暴露了，必须得马上转移……但还没有来得及和有关同志商量，日本兵便将美岱召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岗哨林立，不许任何人出村。王经雨当即考虑到这是来抓他的！他还穿着伪

自卫团的衣服，或许能够混出村去。于是，他硬着头皮向村南走去。刚走到村口，就被站岗的鬼子用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挡住了。其中的一个鬼子咿哩哇啦地用日本话查问王经雨，王经雨沉着地摆了摆手说：“我听不懂。”鬼子用狡黠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阵，然后扯着衣服，让他蹲下，拣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用汉字写道：“你是王经雨吗？”写完后用凶狠的目光紧紧盯着王经雨。

王经雨心中一惊：“难道鬼子认出我来了吗？”但转念一想，“不可能，我又不曾见过这两个鬼子。他们一定是冒诈！”他想到这里镇定自若地接过鬼子手中的树枝，也在地上写道：“我不是王经雨，是太君让我找王经雨的。”正在这时，给村里跑差同情革命的尹月月恰巧走过来，看见情况不妙，急忙走上前边指划边说：“是太君让他到车站去……”

“开路！”鬼子放走了王经雨。

王经雨从容地走出村口，一片树林挡住了鬼子的视线。傍晚，王经雨顺利地找到了游击小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经雨参加革命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周围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王经雨那样大的家业都舍得扔下，咱们还怕甚？”不少人也随之参加了革命。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敌人，1940年初，党组织决定将几个游击小组合并，成立萨县游击队，王经雨任队长，八路军派长征干部杨思华来任指导员。游击队员有七十来人，编成两个排五个班。

三

萨县游击队建立后，进行了一个时期的集中整顿和训练，队员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面对日、伪、顽、匪多方面的敌人，游击队发挥群众支持、熟悉地形等有利因素，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神出鬼没地活跃在大青山上和土默川上；打击敌人，宣传抗日，保护群众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0年秋季的一天，王经雨、杨思华带着游击队到民生渠以南开展工作。太阳刚出来，他们进了柳树淖村，当地群众宰了两只羊慰劳他们。但没等饭熟，岗哨跑来报告：一百多鬼子从毛岱如狼似虎地开来了。王经雨、杨思华分析了敌人的力量和打法，做了战斗部署。战士们上了土围子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只见五个鬼子打前阵，扛着一挺机枪、两支步枪，张牙舞爪地向村围子走来。当他们靠近村围子时，王经雨让神枪手老武三射击，四枪打死三个鬼子，剩下的两个返身跑回树林。接着鬼子在树林里集中机枪、步枪向我阵地猛烈射击，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个别队员有些恐慌。王经雨和杨思华镇定自若地从容指挥，命令老武三击毙鬼子队长和打得最凶的一个机枪手。敌人气急败坏地又组织了三次进攻，都被我游击队击退了。午后，又有伪骑兵大几十人直扑西门，离围子四五十米时，我游击队几十枝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七零八落，伏在地上不敢动。王经雨向伪军喊话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要一致对外打日本侵略者……”不一会儿，对方举起一条白布，王经雨让他们派人来洽谈。几个伪军来到围子下

说：日本人都在东南拐角，他们是张老毛部某团，要求把伤员运下去。游击队答应了他们的恳求。

太阳落山时，鬼子开来十六汽车的增援部队，用掷弹筒往村里发射催泪瓦斯弹。在杨思华的带领下，游击队员们将一个“哧哧”地冒着青烟的催泪瓦斯弹挖坑埋掉。

晚上七点钟左右，王经雨和杨思华交换了意见，认为敌众我寡，不能和敌人硬拼；决定兵分两路，由敌人防守薄弱的西门、东门突围出去。夜幕降临后，王经雨首先带领一个排从西门突围了出去；敌人发现游击队从西门突围，立即调集东门外的敌人去增援西门；杨思华乘机带领余下的一排人从东门顺利地突围了出去。

这次战斗，萨县游击队旗开得胜，打死打伤敌人廿来人，还打死敌人一只军犬。从此，萨县游击队军威大振。

柳树潭战斗后，萨县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他们一面造谣说“游击队被全部消灭了”，一面却又调集重兵，向萨拉齐以东、察素齐以西、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这块平原，展开了篦梳式的“扫荡”

游击队稍事整顿后，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与鬼子展开了迂回斗争。遇到敌人的零散活动，就乘机吃一口“肥肉”，遇到大股的敌人，感到胃口不好消化，就暂时将它放过去。就在这次反“扫荡”中，游击队在群众的协助下，把萨县“片通司令部”派出十个配合日寇“扫荡”搜集游击队情报的特务全部抓获。

不久，游击队把营地建在美岱沟深处的黄土尖，配合正规军在顶门石、陶思浩、东老藏、沙兵崖等地打了一系列胜仗。

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王经雨带着游击队集中在纳令沟休

息，鬼子突然把美岱召村包围起来，同时，把通往大青山的美岱沟、沙兔沟封锁，严防村里人去给游击队报讯。然后进村喊起了村长和通讯员裴守信，让找带路人。裴守信是救国会员，当他得知鬼子是进山围剿游击队时，专门找了十几名基本群众应付鬼子。鬼子从大路出发了，裴守信抄小路进山，直奔游击队的驻地，找到王经雨后，便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情况。

王经雨和几个领导研究后，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

“一分队一班，占领沟西的制高点，鬼子没有接近时，不准射击，我很快派副指导员去支援你们。”

“二分队长，你带一个班去抢占沙兔沟的五峰山制高点，严防鬼子从后面包围你们，到达制高点后，与副指导员他们取得联系；鬼子从正面向你们攻击，你们就往山下滚石头砸狗日的！”王经雨缓了缓气，又叮嘱说：“一定要注意沙兔沟方面来的敌人，假若鬼子不爬山，你们就监视他们的行动，不要开枪惊他们；假若鬼子爬山，你们就要很快转移到五峰山的北面，从侧面打击敌人。”

“副指导员，你带领两个班埋伏在与他们成三角形的那个山头，发现敌人不要射击，如果敌人向你们的方向爬山，也不要开枪，就从山上往下滚石头砸狗日的，不要暴露目标，你们如果被包围了，也不要慌忙地撤退，就在你们埋伏的山头下边，有一个十分险要、又很安全的石崖，在那里隐蔽可攻可守，可进可退。”

“留下的人由我和王弼臣同志带领，占领北山顶……”

王经雨对这一带的环境了如指掌，果敢而井井有条地部署完以后，同志们便各自进入阵地，等候着敌人的到来。

“叭叭叭”的几声枪响，接着就是鬼子的机枪和掷筒爆炸

声，炮弹和子弹呼啸着从人们的头顶上掠过，游击队一枪也没有还击，默默地伏在山顶上。

鬼子试探着打了一气，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象乌龟一样伸出了脖子，一个，又一个……都逐渐地暴露在游击队的面前。

“打吧，队长！”通讯员急不可待地请示队长。

王经雨沉默着，象是一个很沉着的猎人，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鬼子。

“不要急，你没看到大队的敌人还没有走到我们脚下吗？如果一开枪，鬼子就缩回头去，那我们的脚就踩不住他们的脖子。”王弼臣同志很有把握地答复通讯员。

鬼子虚张声势的机枪和掷弹筒还是不断地射击着。为了使鬼子更多地耗费一些子弹，测试一下鬼子的射击技术，游击队的一个战士，就给他们设置了个假目标——用木棍支起一顶帽子晃了晃。真是生了效，立即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来了，四挺重机枪向“目标”发出了疯狂的吼叫。就这样，把鬼子吸引到游击队埋伏线的西面，游击队员们清楚地看到鬼子快要接近副指导员他们埋伏的山腰了，便从山顶上把大石块往下滚，轰隆隆滚个不停，砸得鬼子哇哇乱叫，也顾不得听候什么撤退的命令，便连滚带爬地往下撤退。鬼子又试探着进攻了几次，每次都让游击队击退了。鬼子进攻东山头时，不仅遭到压头盖顶的大石头，又遭到西山头游击队的打击；鬼子进攻西山头时，游击队采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鬼子轮番向游击队进攻，游击队就互相交叉着打击他们，打死打伤四、五十个敌人。

敌人原计划正面战斗打响后，从侧面、背面进攻的敌人会很快聚拢来，三面夹攻，一举把游击队消灭干净。可没曾想到向导故意把那两股敌人带上崎岖的山路，其中一个还把鬼子引

到三架石湖里，连人带枪洗了个冷水澡，等他们赶来纳令沟游击队的驻地汇合在一起时，王经雨已带领游击队撤离了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去了。

1941年夏天，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萨县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二连，王经雨任连长。1942年春天，又改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二连，王经雨仍任连长。从1940年春天萨县游击队成立到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王经雨学习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沉着、镇定、机智、勇敢地指挥这支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一直坚持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有时独立行动，有时与正规军或兄弟游击队配合，先后打胜了柳树淖、黄土尖、陶思浩、纳令沟、沙兵崖、东老藏、大脑包、五里坡、察素齐、大南沟、前脑包……等三十多次较大战斗和不计其数的小战斗，在大青山、土默川一带起了抗击日、伪、顽、匪主力军作用。

四

1940年8月，王经雨兼任了萨拉齐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县长，从此，他一面指挥所辖部队与敌人作战，一面带领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大青山深处的根据地，也相机到敌人占领但我方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沿山平原地区，宣传抗日，搜集情报，除奸肃特，征收税捐，筹粮筹款，动员青年参军参战……。40年秋天，他亲自动员正在萨县耶稣堂学校上学的亲戚——赵顺当了县政府秘书，41年，又动员在河子揽长工的张占元等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1941年夏天，上级又给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布置了税收

任务。可这时敌人对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及其部队连续进行了残酷的军事“扫荡”与严密的经济封锁。王经雨带领着政府工作人员和部队整天钻梢林、爬悬崖与敌人“捉迷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我方的处境也相当困难，给养接济不上，收税任务也无暇去完成。为此，王经雨昼思夜想，琢磨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时，萨县日寇宪兵队队长冈田义一，通过与王经雨所带部队的多次较量，深感这是一支单用武力征服不了的棘手力量，便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用重利诱降的毒计。

一天，王经雨的表弟、陶思浩乡乡长乔卯突然上山来找王经雨。见面后，乔卯看着王经雨憔悴的面容怜悯地说：“你们成年累月地飘飘零零，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呷了一口水，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日本人让我转告你们，只要肯归顺，你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还让我们几个乡长做保人。”

王经雨听到这里，明白了乔卯的来意。顿时，两道眉毛高高竖起，眼睛里放射出愤怒的光芒，正要发作，猛然间心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何不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呢？”想到这里，他竖起的眉毛舒展开了，装作犹豫的样子说：“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不好作主，等商量一下再说吧！”

那时，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住在沙兔沟村后的干沟子里，正好这时绥西专署副专员靳存智和民教科科长罗仲群来到这里。经过共同研究，大家认为：敌人招降的险恶用人昭然若揭，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但现在正是收税的黄金季节，如果断然拒绝谈判，势必和乡长们顶牛，鬼子也会立

即进行“扫荡”，这样，上级交给我们的收税任务就完不成了。如果跟敌人“谈判”，一方面可以争取时间完成征税任务，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下当前的衣食困难问题。于是决定由王经雨出面和敌人进行“谈判”。为了诱惑敌人还造出假舆论：“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的领导人王经雨和王弼臣，一个是本地人，一个是口里人，两人合不来。”

敌人信以为真，马上派出代表来“谈判”。我方为了掌握敌人的幕后活动，让靠近我们的一个伪保长侦察敌人的行动，派雷电云每天晚上和他在美岱召村东的一棵大树下联系。谈判时，王经雨首先提出：“下山也可以，但总不能让我们饿着肚子去吧！”敌人听后，就让各大乡给我方送粮食、肉、油及整篓整篓的干货。就这样，王经雨一边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一边派人下去抓紧征税。战士们边吃着敌人送来的给养边说：“等我们吃饱喝足了，再狠狠揍那些狗日的！”

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提出要到山下“谈判”，王经雨又提出：“我们下山还需要些衣服和子弹。这一次同志们以为敌人不会答应了，便做好战斗准备。谁知冈田义一诱降心切，又把东西送上山。

一直与敌人“蘑菇”了两个月，冈田义一发现被捉弄了，但还不肯罢休，决定让“反共挺身队”队长郝得胜（外号巴红潭）和伪警察署巡官曹合年等人，与我方在山下进行最后一次谈判。王经雨他们看到队伍得到很好的武装，税也收得差不多了，决定和敌人“摊牌”了。

第二天晚上，王经雨带着董平、刘克文、赵顺等几个机智精悍的同志来到的约定地点——沙兔沟沟口。为了预防敌人突然袭击，王弼臣带着机枪班埋伏在沟口的小山头上，不一会

儿，巴红淖、曹合年等带着几个保人和几个警察也到了，还扛来一口袋麻花。见面后，巴红淖笑容可掬地说：“王县长，请先吃点儿干粮……”

王经雨没吭声，脸上现出冷若冰霜的表情。

双方沉默着，寂静的旷野只能听到蚂蚱有节奏的叫声。

巴红淖一看这情景，心里打开了鬼主意。

王经雨扫视了一下四周，沉着脸说：“咱们都是军人，我看小气点吧，对各位检查一下！”赵顺、董平、刘克文等立即对来人挨个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武器。

“郝队长，我看咱们还是进山里谈吧！”王经雨低沉而有力地说。听口气，没有一点商讨的余地。巴红淖听了不禁心里一怔，想道：“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先下手为强吧！”一个阴险的诡计随即产生了。表面却一本正经地说：“随王县长的便吧！”

于是，双方人员呈一字形顺着沟往里走。按照事先安排，王经雨走在最前面，赵顺跟在巴红淖后面，监视其行动。董平、刘克文也分别监视着其他人。走了一段路，只听“扑通”一声，巴红淖突然摔倒在地。“干什么？”赵顺厉声问。“不小心，让石头绊倒了。”巴红淖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一边爬起来继续赶路。又走了一段，巴又摔了一跤，一往起站，“叭”地打了一枪。大家都警觉地站住了。只见巴红淖没命地向对面的山头窜去。原来，巴红淖这狡猾的家伙，事先将手枪藏在褰腿里躲过了我们的检查。这家伙第一次装作摔倒就想掏枪而没有得逞，第二次摔倒时就势把枪掏了出来。这一切早被赵顺觉察到了，就在他端枪射击王经雨的一刹那，赵顺眼疾手快，举枪将巴红淖的手枪拨转方向，子弹便呼啸着射向对面的山头。乘

着天黑和慌乱之际，巴红淖和曹合年连滚带爬地逃跑了。几个保人和伪警察被押到山上，经过教育，又放他们回了家。

随着这场“谈判”的结束，冈田义一诱降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他恼羞成怒，一面纠集了大批日伪军进行“扫荡”，一面四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捉拿王经雨。但他们连王经雨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在这场智斗“谈判”期间，王经雨他们赢得了充裕的时间，不仅胜利地完成了税收任务，而且得到了大量给养，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

五

由于王经雨带领萨县游击队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与仇恨，一方面调集重兵进行军事“扫荡”，另一方面用毒辣的手段进行经济封锁，妄图把这支抗日人民武装消灭干净。

敌人的“扫荡”是极其凶残和野蛮的。凭着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装备，象耙地似地打“蚕食战”。有时全线出击，横着扫，有时分片包围往紧缩；驻扎以后就在山顶上设岗放哨，监视我方的行动。敌人所到之处见人杀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抢光，见了石碾石磨也要从山坡上滚下来打个稀烂。

敌人的经济封锁更是毒辣透顶。为了把山上的抗日武装与平川群众的联系割断，失掉物质和弹药来源，把游击队饿死、困死在深山老林里，他们首先把山前小村烧掉，把群众赶到大村，在大村的周围修筑了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碉堡，驻守着众

多的日本宪兵和伪警察、保甲团丁，白明黑夜站岗放哨。对大青山的几个入山口，敌人防守更加严密，沟口前挖掘了“遮断壕”，埋设了铁丝网，修筑了炮楼和碉堡，派有重兵把守，不许人们出入，更不许把粮食、布匹、盐、药等物带进山里，如若发现，不是杀头丧命，也得倾家荡产。

敌人开始“扫荡”时，遵照上级指示，王经雨率领游击队机动灵活地打“麻雀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42年，日寇纠集了数万兵力，大举进犯，王经雨带领游击队利用地形熟，道路熟的有利条件与敌人迂回周旋“捉迷藏”。敌人从大路来，他们从小路走；敌人从正面来，他们从侧面走，敌人住在大沟里，他们就住在小壑中；敌人白天“扫荡”黑夜休息，他们就白天隐蔽在偏僻的山旮旯里，黑夜出来活动。王经雨他们就这样与敌人周旋，巧妙地钳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敌人严密封锁、疯狂“扫荡”的日子里，王经雨带着游击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大青山的深山密林中活动，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

1941年大年三十，王经雨他们把携带的粮食在两天前就都吃完了，同志们挤在寒冷低矮的窝棚里，肚子饿得叽哩咕嚕直叫，眼巴巴地盼着下山的同志能给弄回些好吃的来痛痛快快地过年。可谁知黄昏时下山的同志只给带回些山药来。因为当地有大年三十禁吃烧山药的忌讳，所以一个个梅气地低下了头。王经雨见此情景没有惊动大家，出去拾了些柴烧火烤起山药来，他一边翻烤一边自语：“人们说‘大年下吃烧山药是灰心入肚呢，’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看哇吃上烧山药不仅能止饿，还能打鬼子呢！”说着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王经雨的言行把

大家逗笑了，一个个也都烤着山药吃起来。进入1942年，他们常常连烧山药也吃不到了，王经雨就带着战士们挖野菜、采野果吃。什么蕨菜、野韭菜、两叶葱、马屁泡、灰菜籽、苦菜、野山杏……都吃遍了。每当他看到有的战士端着清水煮野菜发愁时，就抢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鼓励大家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还吃不到咱们这样的菜呢！可红军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学习红军，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同志们在王经雨的带动和鼓励下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1942年秋天，日寇调集近万人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根据地围攻。王经雨及其带领的游击队被围困在八峰山上。这八峰山高耸入云，峭壁直立，山顶长满茂密的油松和杂草，很适于防守和隐蔽。当王经雨带着游击队撤入八峰山时，穿的鞋子差不多都磨破了，粮食也吃得一干二净，而老天爷也象有意和他们为难，大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三天三夜，同志们一个个被浇得精湿，疲惫不堪。第四天早晨雨停了，王经雨挑选了八双能穿的鞋派雷电云等几个同志穿上下山去筹集给养。为了能很好地坚持下去，王经雨给留下来的人开了个会，在会上提出“学习红军，战胜困难”的口号。这时，一个姓李的战士喃喃地说：“我出来打日本死也甘心，现在可倒好，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晚上铺着石头睡觉，走起路来比小脚老大娘晃得还厉害。日本人来了别说打，就是爬也爬不动。”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反驳他的意见说：“你说得不对！没粮食吃我们先忍受一下，不是还有野菜吃吗？鬼子真的来了，我们一定能拼死他几个！”

王经雨一看争执得很厉害，忙插嘴说：“同志们，别争

了。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就是再艰苦也吓不倒我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决不灰心，决不动摇，现在我们被围困是暂时的。雷电云他们很快会给我们搞来给养的！”同志们听了很受鼓舞，不由得直着嗓子喊起来：“我们要克服困难！”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那个姓李的战士呜呜地哭起来，用手打着自己的头说：“脓包！脓包！”

十来天没尝到一粒米了。生长在周围的野菜也都吃光了。有个同志想到别处再找些来，刚站起来就眼花缭乱，天地旋转，刚一迈步，扑通一声摔倒了，另一个人上去把他扶起来……

天终于放晴了，阳光暖烘烘地照在人们身上，大家都挣扎着起来活动，突然一个战士大声地喊起来：“你们看，人来了！向着我们这里走来了！”大家随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从踩石矶那里来了六个人。

人影渐渐近了，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是雷电云他们回来了。同志们都很高兴地拥上去，真象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兴奋极了。大家见了面，手握得那么紧，眼里含着热泪，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我们胜利了！”雷电云摇着王经雨的手，眼睛里流露出骄傲的光芒。

“电云同志，你们辛苦了！”王经雨感激地说。

战士们高兴地抢着把他们带来的粮食和新鞋连拖带拉地往沟里拿，谁也说不清在路上摔倒过多少次。

来的六个人中有两位农民，过去都给游击队作过联络员、情报员，现在大家见了面分外亲切，他们拉着王经雨的手兴奋地说：“从你们撤到山里后，咱们庄户人白天盼，黑夜想。特

务们造谣说，把游击队全部消灭了，我们虽说不信，可心里也没有个底儿。”

“敌人消灭不了我们！看！我们不但活着，还要消灭敌人呢！”大家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游击队有了粮，有了鞋，又开始活动了。一个漆黑的夜晚，王经雨带着游击队又连续袭击了美岱召，协力气的敌人据点。王经雨曾在他母亲面前立下誓言：“我愿做一条柳木扁担，宁折不弯，革命到底！”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一直坚持战斗在大青山上。

六

解放战争打响后，王经雨更加意气风发，投入新的战斗。1945年10月，我军解放了萨拉齐，王经雨担任萨拉齐县县长。他带领有关人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萨拉齐县城和美岱召、苏卜盖、鄂尔格逊等地，动员青年参军，组织地方武装，筹集军需，支援前线；慰问革命烈士家属，敦促伪政府工作人员投诚；剿匪肃特，登门动员老同学出来工作；组织人员办教师学习会……

1945年11月，王经雨调到龙胜县当县长。次年2月，由于地区缩小，干部集中在龙胜县之故，王经雨由县长降为县民政科长。他深知这是形势的需要和共产党干部应能上能下的道理。职务的变化，非但没有影响情绪，而且工作干得更起劲了。

1946年9月，王经雨到晋绥党校学习一年，认真总结了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进一步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1947年9月，王经雨担任托和清县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长，一方面组织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另一面整顿县武装大队，扩大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1948年10月，组织上又调王经雨担任萨拉齐县县长。这时，正值第二次绥包战役期间，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军，筹集物资，做好支前工作，并与高鸿光、章叶频、韩燕如等同志举办时事研究会，亲自登台给学员讲课。

1949年2月，他担任萨包支队副政委。7月萨包支队与龙胜县大队合编，他仍担任大队副政委。11月，包头军分区成立，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1950年7月——1953年12月，王经雨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954年担任乌盟军分区副政委兼乌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9月28日，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12月，转业到地方，历任中共乌盟盟委书记、内蒙干部文化学校党委书记、内蒙党校党委副书记等职。

解放后，王经雨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环境变了，可一直没有放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要求子、侄努力学习，经常写信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布置阅读书目。对烈士子女也关怀备至，常从思想上、经济上予以大力资助。

1957年春节，王经雨的儿子、儿媳从丰镇回到老家，王经雨待儿媳坐定后就安顿说：“你在家住三天，一天得拾八箩头粪交到队上。”村里本家的小姑、小叔见新过门的嫂子有些难为情，都争着说：“嫂子，没事儿，明天我们帮你拾。”王经雨听后严肃地说：“你们能代她拾粪，能代她锻炼吗？”1961年，党发出“干部支援农业”的号召。王经雨带头动员当人事科长的儿子和做秘书工作的儿媳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王经

雨就是这样要求、教育子女的。

王经雨生活上非常俭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但遇到同志们生活上有困难却常常解囊相助。为了教育后代继承革命传统，于1959年撰写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大青山上》，并将所得稿费全部赠送给美岱召中学。他患病住院期间，亲友们带着糕点、罐头去看望他，他知道后，便让爱人照价付款，并给乡下、外地来的人拿上车票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经雨被隔离审查。在此期间，他每天打扫厕所。有一次，儿媳回家正碰上他清扫厕所，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第二天天一亮，儿媳悄悄起来，替他扫了厕所。不料这件事被监督王经雨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责骂王经雨：“你这个老滑头，让你接受改造，你怎么让别人帮着干呢？”王经雨看着佩戴红卫兵袖章、满脸稚气的年轻人，嘴角颤了颤没有说出一句话。他后来对家里人说：“我们不能对群众有怨恨情绪。”

有一次，外单位来了两个调查人员找王经雨，让他证明黄厚是土匪。王经雨知道他们的来意后，拿起笔来写道：“黄厚是土匪，我也是土匪，因为当时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都这样称呼我们。”王经雨把“证明”递给那两个人，那两个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1971年，王经雨从干校回到党校，要求军代表给他分配工作，可军代表让他下乡插队落户，他只身到了沙图沟村，每天清晨四点就起床拾粪，还抽空给美岱召中学师生讲大青山抗日英雄故事。他的子女们为老人的不平待遇发牢骚，他宽慰子女们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相信党和人民会了解 and 正确对待我的……”

1974年，王经雨患了半身不遂症，而且日趋加重，于1981年10月15日病逝，终年七十岁。

〔根据王经雨档案材料及其所著《大青山上》（革命回忆录）和张永兴、董平、陈顺、王弼臣、张恒山、靳存智等同志以及王经雨家属的回忆整理而成〕

晋梅五

云呈玉回忆 董文华整理

晋梅五（晋福），蒙古族，美岱召村人。晋与本村的名人经叔、都格勒达是同族。和经是叔侄关系，经为晚辈。

晋梅五生于1894年，卒于1958年，他辞世后留下我们姐妹俩过上了寡妇生活，我是他的二房。

晋梅五20岁时于绥远中学毕业。毕业后参加了土默特旗地方武装老一团，一连扛了七年枪杆。大小战役都参加过。

1915年，芦占魁造反，大部队窜进土默特旗境内及其毗邻，城乡人民受到严重损害。老一团为使蒙汉族人民安居乐业，骑兵驰骋于大青山、湖泽和平原。在岱海滩他不幸受伤。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肩窝，当即昏倒在地。弟兄们把他救出来，回到家里子弹无法取出，痛得最厉害时又呼吸困难，团长玉禄（玉顶成）用大烟嘴对嘴地喷，终于把晋喷醒。后经一位女牧师的按摩寻找，最后才把子弹的位置确定下来，因子弹在胸腔上面，不伤性命，最终残留在身。

晋梅五英勇善战，尽忠报国。从战士晋升到班长、排长。一次，老一团到包头附近剿匪肃特，路经井成玉与土匪接了火。团长玉禄不幸战死。土匪驮着玉禄的死躯从西跑到东，晋梅五一直尾随不离，土匪见状惊慌，觉得继续驮死躯不方便，干脆割首级弃尸体，晋梅五仍紧跟不离。土匪无法，只好找了一块地方将首级埋下。晋梅五知道掩埋地点后立即跑回归绥，通知玉禄的亲属设法将首级偷回。

玉禄家，忙安葬，可只有死躯而没有首级怎么办？家中人只好到银匠铺上打银头。银头打好了，第二天就要安葬。晚上，晋梅五赶回来见状，马上带人返回去取上了首级。

因晋梅五保团长有功而官加一品，之后，老一团团长李根车退位，晋被推举为团长。

晋梅五当团长后，我随他住在包头，团部也一度设在包头。当时，老一团的任務除了剿匪肃特以外，还暗地隐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我家，经常隐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有吉雅泰等四五人，他们白天在我家打牌，晚上出外搞革命活动。后被山西晋军发现，想法设法把老一团搞掉。老一团虽然力量薄弱，但一直顽强对付。最后打不过晋军，不得不自行解散，自此晋梅五隐居家中，住在萨拉齐。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解放了萨拉齐后，不但建立了汉族政权，而且建立了蒙古族政权。即十苏木委员会。晋梅五被推选为苏木长。晋苏木长在萨拉齐解放期间，办了许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萨拉齐解放后，国民党气急败坏。在萨拉齐古镇不大一块地盘上空，经常有几架飞机盘旋，一次，大南街刚刚有一小商贩把手推车推到街上卖货，突然，一架飞机在盘旋低飞之时射

下一梭罪恶的子弹，将推车的商贩打死。就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晋苏木长经常出没于衙门，经常与解放军的司令、当地军政负责人李维中，王经雨等人联络出席会议。晋掌管着衙门里的一串钥匙，有半个月の開粮库救济穷人的热闹时期，在此间晋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晋梅五参加革命，许多蒙古族青壮年都来投靠他，然后经他介绍随解放军大部队加入革命队伍行列。一天，有晋的熟人尔计喇嘛之子、绥远某保安队队长李成林投靠到晋的门下，请晋与解放军首长说情办“收复”。对于李成林这种起义行动，晋梅五不但不冷眼旁观，而且满腔热情地接待了他，这天，地点在我家。李成林在面见解放军内操 湖南口音的司令李维中、王经雨等人时，立正姿势站在地下，手和腿不由地发抖，生怕对方处治他。解放军的首长们说他不要害怕，只要诚心诚意参加革命就行。最后，李成林起义投诚将一个大队的人马交了解放军。

美岱召村的辛亥革命先驱经权之女经爱鱼 青山 大学毕业后，居然保了国民党。在萨拉齐获得解放期间，被俘后，解送到萨拉齐衙门院内。因经是人才，解放军想利用她，叫她给革命做些贡献。经爱鱼叫晋梅五五爷，她五爷受解放军首长委托劝说她投诚。他开始说一臣不保二君，后来勉强随王经雨等首长撤离萨拉齐，其间，晋给经做了许多工作。

（云呈玉是晋梅五的夫人本稿是由她忆述整理成的）

内蒙二人台著名表演艺术家 刘全同志纪实

李 微

一、简介

呼和浩特市民间歌舞剧团著名演员，内蒙古二人台表演艺术家刘全，今年五十五岁，汉族，中共党员（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9月24日出生于内蒙古萨拉齐县（现在土右旗）苏波盖乡新营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未能入学读书。11岁学艺，十三岁登台演二人台。1950年参加萨县宣传队，1953年参加绥远省前进实验剧团。三十多年来为二人台事业虚心进取，博采众长，几番飞跃，攀登了一个个艺术高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不讲衣着，不尚言谈，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但一上舞台却神采奕奕，风流潇洒，扮相高雅俊美，嗓音圆润高亢，行腔婉转自如，跑起园场如行云流水，演啥像啥。他，来自人民，演出于人民之中，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的珍爱中，成长为一名二人台表演艺术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他是萨拉齐的明珠、骄子，也是土右旗的骄傲、光荣。

二、苦难的童年

解放前，内蒙古农村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土地贫乏，生产落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刘全一家五口人，父母哥弟。父亲因劳累过度，又缺医少药，抛下病妻幼子而谢世，哥哥十二岁，弟弟五岁，刘全只有九岁。孤儿寡母，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他只好和哥哥给人家打短工，当小长工，放猪放牛，拣柴拾粪，土炕无席，吞糠咽菜，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文化生活了。但土默川流行唱“爬山调”，逢年过节便有二人台小班打土滩演出，刘全最爱看二人台。有时为了看一场演出，竟走出几十里地，再跟着小班连看几个台口。这初级的文化表演，引起他心底艺术的共鸣！

有一年，秋收就要到来，刘全看山药地，正遇村里小班演出，他美美地看了一场戏，可二亩半山药地都被猪拱了，他一夜没敢回家，狠狠地挨了一顿揍。

三、矢志学艺事竟成

刘全学会了几句二人台，到滩里放开嗓子唱两句，声音竟格外的清脆，致使他忘了疲劳和身上的鞭痕痛。多次请求，才得母亲同意。他开始了正式学艺，拜本家叔叔刘二泉为启蒙师傅，同时学艺的还有两位师兄，刘平安学唱丑，张万福和刘全学唱旦。学徒期为二年，三年登台演出。

学艺生涯开始了，刘全的天赋条件并不比别人好，但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勤学苦练。师傅给两位师兄教戏，他在一旁认真看，注意听。看完自己再练。那时没有练功排练的地方，只好把场面当作练功场。他早迎朝霞，晚披月光，练唱腔、练道

白、练动作、练走场。为了跑场稳，头顶一碗凉水，稍有歪斜，凉水顺势流下来，流在身上，凉到心上。练慢步，要脚跟踩脚尖，两腿中夹根木棍，不许掉下来。每天踢腿上百次，跑场上百圈，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过去了，刘全已成为萨县一带无人不知小有名气的旦角演员了。刘全朴实淳厚，从不骄傲，他以惊人的毅力，攀登艺术高峰。

四、演出生涯

师傅刘二泉，为人正派，演出认真，是萨县一带有名的二人台旦角演员。在他的传授下，刘全学会了很多二人台剧目。三年出台已能演“走西口”、“打金钱”、“打秋迁”、“打樱桃”、“打连城”、“打后套”、“小放牛”、“祝英台下山”（二人台剧名）、“种洋烟”、“扇子计”等剧目。三个艺徒都能演出了，刘二泉便正式组成二人台小班。演员丑角刘平安，旦角刘全、张万福。乐队笛子刘二泉，扬琴郎双喜，四胡刘格其。由刘二泉领班，每年春出秋回，走遍了土默川的远乡近村，由于演出认真，三个演员都很年轻，扮像漂亮，嗓子都较好，很快就在萨县一带有了名望，老乡们亲切称刘全为我们的“全全”。有时两个村同时请刘全去演出，竟拉拉扯扯，争个不停。为了满足乡亲们热诚邀请，他演出后，不卸妆，再赶到另一个村去演。

在旧社会，民间艺人同样被认为是“下九流”，低于其它阶层的劳苦大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有一次给地主家演出，因戏中一句台词和地主有些相连，当时地主的儿子踢翻了扬琴，破口大骂。无耐，师傅领着大家，找了个破庙住下，连饭都没吃上。

赚不来钱饿肚子，辛辛苦苦挣来点钱又让土匪刁去。在后山演出挣了点白面和莜面，本来打算大家分点回家过年。在韭菜滩遇上土匪，连行头服装及挣来的面，全部抢去，师徒们沿路乞讨，才回到村里。那年刘全才十四岁（47年）。

五、阳光雨露育花红

解放了，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在党的文艺路线光辉照耀下，全国艺苑，百花盛开，万紫千红。二人台这株民间艺术之花，竟登上了舞台，进了从未进过的剧场，犹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刘全同志的命运也随之起了根本的变化。1950年3月，他参加了萨县减租反霸宣传队，成为一名文艺战士，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1950年10月至12月，刘全参加了绥远省文教厅举办的第一期民间艺人学习会，文教厅长是刘启焕。民艺会的干部有李治、苗文琦，刘瑞等。学习会成员有来自全省各地区有名望的艺人和搞创作的同志。刘全是涂培蕾同志骑马接来的，他是初次来到归化城（现在呼和浩特市）。

两个月的时间，学习会学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懂得了文艺应当为政治、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并交流了技艺，结束时还做了汇报演出。地点在新城的“克洛布”，市公安局小礼堂，归城人民电影院和大西街的同乐剧场。演出都是清唱，刘全登台演唱了“五哥放羊”、“打连城”、“惊五更”、“十对花”等节目，由于他嗓子好，唱腔美，这次演出初露锋芒，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和赞扬。

学习会结束后，刘全回到萨县又参加了县土改宣传队。配合土改工作排练了现代戏“三女劝夫”，他扮演“张三女”，焦

七扮演“高三牛”，在“小女婿”中他扮演“陈快腿”，“柳树井”中扮演“刺儿菜”。按照县委指示下乡巡回演出，刘全是主演，开头演现代戏，后来还要演二人台节目。担子很重，但刘全干活儿拣重的干，箱子挑大的扛，表现了他优秀的思想作风和高尚的品质。

六、参加全省会演并首次进京

1952年绥远省文教厅举办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刘全带着二人台剧目“打秋千”，又一次来到呼市。刘全扮演大姐姐，张万福扮演二妹妹。刘全以细腻的表演和轻盈的台步博得观众好评，人们评论他真不愧为“赛水上漂”。之后被评选为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演员之一。这次被选中的演员还有刘银威、高金栓、张二银虎，乐队有张来运（扬琴）、赵四（四胡）、王富生（笛子）、任万宝（四块瓦）。参加全国会演的节目有“打金钱”，刘全、刘银威扮演。“打秋千”，刘全、刘银威扮演。“走西口”高金栓、刘银威扮演。带队的是绥远省文教厅的张炯、姚士英二同志。

正当桃李争妍季节，刘全随演出团去到首都北京。先住在什锦花园绥远省驻京办事处，后又住在棉花胡同中央歌剧舞剧院。当时有华北地区的领导张处长来看望并接见了全体成员。

“打金钱”与“走西口”这两个节目演出后，均受到中央首长及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和全国各地文艺代表团的热情赞扬，并且说：“想不到绥远地区还有这样好的节目”。每次演出，观众反映都很好。尤其是“打金钱”演到带起霸来，掌声不断。反身转脸踢霸时，观众竟担心的惊叫一声，“唉呀！”

好危险呀！”接着掌声如雷，几次谢幕，还是下不了台。只好从带霸起再演一次，才满足了观众的要求。演出结束后，文化部的领导同志上台接见并讲了话，并说：“二人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尤其是“打金钱”短小精干，舞蹈精练，地方特色浓，民间味道足，这个地方戏很有发展前途”。

刘全这个土默川的苦孩子，做梦也没想到能来到这过去是皇帝住去的地方——北京。他更没想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共同观看会演的部份节目，同时演出的还有湖南民歌独唱“小乖乖”，河北省的“跑驴”，新疆哈萨克舞蹈等优秀节目。这次会议使刘全大开了眼界，除观看各省市会演节目外，还观看了四大名旦之首，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出的“宇宙锋”和京剧名武生李少春演出的“大闹天宫”等精彩表演。

会演结束后，刘全、高金栓、刘银威应邀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传授二人台节目“打金钱”、“走西口”的技艺，在歌剧院学习的有艺界名流郭兰英、朱丹、李波、李菁等，还有吉林省二人转的两位演员也在那里传授节目。刘全发现二人转旦角手绢运用很有特点，虽是一方块手绢，却可以扔起来转几圈，不仅是一件很好的道具，而且也是一件很好的装饰品。他在教学过程中，挤时间请教吉林的同志学习扔手绢的技巧。然后和刘银威同志仔细钻研，觉得单层手绢太轻，扔出去转不了几圈，便将手绢加厚，变成双层，再将两块手绢的角错开，成为八角形，又在手绢上镶银线，缀光片，加以美化。这样手绢增加了重量，比过去扔的高了，速度转的快了，转的时间也长了，使观众看的更清楚了。于是将扔手绢加到“打金钱”的戏中，通

过实践，获得成功。

刘全又进一步推敲琢磨，设计出手绢前出手，后出手，大出手，小出手，双出手交换，两人交换扔等高难度较大的扔法。把原来拿在手中的死道具，变成满台飞舞，光彩耀目的活道具。从此以后，二人台的八角手绢的表演得到广大的观众的欢迎和赞美。因此有好多文艺团体纷纷前来取经学习，竞相延用。八角手绢几乎遍及全国。有趣的是又传回了东北娘家。1984年夏，刘全带徒弟段八旺、王美容等到东北艺术团学习时，二人转的权威、专家马力同志对刘全说：“我们的八角手绢是向你们二人台学来的。”

授课结束后，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想把刘全同志留在北京做教学工作，可是刘全想我演的是地方戏，怎能离自己的家乡，于是他谢绝了歌剧院领导的挽留，仍然回到家乡。

七、赴朝鲜慰问

绥远省前进实验剧团正式成立后，接到中央的通知，“打金钱”被选定参加赴朝鲜慰问。绥远省政府文教厅组建了一支二人台演出队。由姚士英同志带队，于河北省保定市狮子表演队同归天津歌舞团，统一为“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又与天津歌舞团编为“华北慰问团第六分团”，总团长是贺龙元帅，分团长由曹火星担任（天津歌舞团团长），副团长有鲍昌、肖云翔、姚士英等三人。二人台进京会演的全体人员参加演出节目有“打金钱”、“打秋千”、“小放牛”，演员刘全、刘银威、高金栓三人。

1953年金秋九月，第六分团到沈阳市后，贺龙团长向全体团员讲了话，并组织学习了必要的军事知识，出国纪律以及朝

鲜风情等注意事项。十月的一天，全团人员乘火车从丹东过了鸭绿江。当列车进入朝鲜国境后，看到的是一片悲惨景象，大好的锦绣山河变成了一片废墟，美丽的山头被炸成光秃秃的，即将收割的庄稼到处是炮弹坑，房屋倒塌，残墙断壁，真是惨不忍睹。朝鲜人民的美好家园和宁静的生活，竟被美帝国主义践踏成杀人的战场。敌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当我们看到这些凄凉景象，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刘全怀着一颗炽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的心情，投入到紧张的慰问演出工作之中。

六分团到达元山市后，欢迎的场面令人无比激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搭彩牌，鞭炮齐鸣。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笑着、跳着、流着热泪排出有二里长的队伍，和慰问团的同志热情拥抱、握手，并将演员扔起来，再接住。朝鲜的大娘，大嫂，没有绢绸，将被面撕开，做成绢花，送给慰问团的亲人。绢花，苹果、热泪、这是战士和朝鲜人民的情和心。

元山市是北朝鲜的第二大城市，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摧残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竟没有一个演出的地方。慰问团只好在用木头搭成的小礼堂里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长及朝鲜人民军领导，朝鲜党中央的领导上台接见了慰问团的演员。第二天慰问团和志愿英雄代表开了座谈会，并介绍了黄继光、董存瑞、罗盛教等英雄事迹。英雄们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使慰问团同志深受教育。刘全同志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忘我地工作着。慰问团沿东线边走边演，他们不讲条件，不挑场地，乐器自己背，服装道具自己扛，跋山涉水，徒步前进。在山沟演，广场演，营地演，医院演，居民区演。通过倾泻万吨炮弹的上甘岭，一直演到“三八线”。刘全不管在哪演，都很认真卖劲，演出时顶风冒雨，下台时满身

汗，什么活都抢着干。战争的洗礼，沟通了人们的感情，战士与慰问团员亲如手足。朝鲜人、中国人，情同骨肉，在心底里交融着，用不着语言来表达，真是情无涯，义无涯。

这次出国慰问演出为二人台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刘全舞台生涯增加了不平凡的经历。归国后，姚士英、刘全因表现突出，在分团受到了表扬嘉奖。紧接着又在沈阳市、太原市慰问朝鲜战场归国部队。在天津歌舞团传授了“打金钱”、“小放牛”、“打秋千”三个节目。曹火星团长真挚的挽留刘全在天津歌舞团工作。他呀！只有十九岁，十九岁还是个孩子，但他又一次拒绝了天津的挽留，回到了哺育他成长的家乡。他有自己的追求、志向、要演家乡戏，要演给家乡人民看。

1954年春天，应北京芭蕾舞团的邀请，刘全、刘银威又去到北京，将内蒙土生土长的二人台之花“打金钱”传授给那些立足尖跳“天鹅湖”的学生。

八、两次会演获奖

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举办“第一届戏曲音乐舞蹈会演。”刘全与刘银威演“打金钱。”刘银威扮演“马立渣”，刘全扮演“马妻”。这个节目经多次加工修改，两人配合默契，演出非常成功。刘全扮演旦角，清新俊美光彩照人，唱腔优美、清脆。表演潇洒细腻，传情动人，台步轻盈，耍手绢更是一绝。第一次手绢出手扔的很远很高，刘全用“丹凤朝阳”姿势接住手绢，场内观众顿时掌声如雷，惊呼叫绝。第二次为“红梅缠腰”，手绢从背后扔出手，用“兰花望日”姿势接手绢，台下又一阵热

烈的掌声。第三次是反手腕扔出手绢平转，再用食指尖往上顶手绢达一米多高，手绢在空中旋转，由快转慢，轻轻落在食指尖上。刘全顶着旋转的手绢绕着男角走小圆场，这叫“红云绕塔。”然后带起霸来，两把彩扇，上下翻飞，一条银霸，前后飞舞，速度之快，表演之精，使全场观众鸦雀无声，直到演完时，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几次谢幕，掌声难平。再以带霸演起，才算满足了热情的观众，演出结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植林、王逸伦及宣传部、文教科的领导同志上台接见了演出的成员并对“打金钱”倍加赞赏，并说：有创新突破，特别是手绢给剧目增加了色彩。报社记者采访了刘全同志，并写稿赞扬见报。中国唱片社从北京赶来，将“打金钱”灌制成唱片出版发行。这次会演刘全获得奖金、奖状、奖章。不少艺术团体如：战友文工团、山西歌舞团、总政文工团、伊春森林文工团等团体，颇有造诣的名演员都来向刘全求教学习。

1957年内蒙又举办“第二届戏曲音乐舞蹈会演。”刘全与王建国同志演出“小放牛，”王建国扮演“牧童”、刘全扮演“村姑。”这戏刘全以腿功见长，整个戏中，载歌载舞。快步跑场，稳如水上行船。慢步、婀娜多姿。错步、碎步、退步，各有特色。他用各种步法创造了各种意境，情从景生，边唱边舞，唱、作、念、舞浑然一体。尤其是那细软的腰肢，穿着绣花的彩裙，这分明是位妙令少女，谁人识破那渔婆罩下竟是一个青年厚生。一个男同志演活了一位娇媚顽皮的村姑，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肯定。刘全又一次获得了奖。同时将“小放牛”灌制成盒式录音带公开发行。两次获奖，他骄傲了吗？没有。他那朴实无华，对名利从不看重，他珍藏了奖章，

又投入了演出、排练。

九、向党中央汇报演出

1958年夏，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遵照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的指示，并经中央批准，调呼市民间歌剧团进京向党中央作汇报演出。喜讯传来，全团同志非常激动。二人台这株民间艺术之花要再一次进京，在中南海给中央首长作汇报演出。在内蒙和呼市两级政府领导下，全团进京。领队有内蒙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同志，呼市市委书记赵霖同志，呼市文教部部长阿尔嘎木扎同志，内蒙文化局王伟局长及呼市文化局包德力局长等。在北京车站下车后，立即去到天安门广场进行街头演出。演出的节目有民歌对唱，独唱，以及宣传交通安全的小戏“公事公办”，最后刘全、刘银威演出“打金钱。”以后又在车站，前门广场都做了街头献演。北京市人民怀着浓厚的兴趣，里三层外三层的挤着观看。

剧团住在“天桥剧场”三楼，二楼住着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在这里先后观看了苏联乐团的交响乐及中央歌剧院演出的“蝴蝶夫人”。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五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大轿车将剧团全体人员接上去中南海。汽车进东华门通过沿途哨卡，和各口警卫，到达中南海小礼堂。晚间为中央首长献演内蒙地方戏，节目有“挑菜”，演员郝秀珍、王素珍、常润兰。“借冠子”，演员亢文彬、张奎。“走西口”演员祁凤英、刘银威。“挂红灯”，演员王建国、李秀莲。“打金钱”，刘全、刘银威。观看演出的中央首长有刘少奇、朱德、陈毅、周总理、贺龙等领导同志。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贺老总及民革党主席李济深、黄炎培等上台接见全体人员和大家一

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随后在北京市政协剧场向八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代表作汇报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在后台接待室请全团同志吃了茶点。刘金这个旧社会的贫苦孩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进了中南海，见到了党中央的首长。只有新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给予文艺工作者这样高的荣誉和地位。他朴实的阶级感情得到了升华，他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忘我地工作着。激动、兴奋，他处在幸福的回味中。

首都的六月一日，鲜花盛开，万紫千红，一辆小轿车接走了刘金、刘良威，他们在劳动工人文化宫，为首都的少年儿童作了节日联欢演出。

在京期间，剧团先后还在“长安戏院”、“人民剧场”“东四剧院”等地，为首都人民进行了公演，均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十、乌兰夫主席宴请和艺术交流

六月初的一天，乌兰夫主席邀请全团人员同游颐和园，并共进西餐。同时参加的还有内蒙的领导同志杨植林、奎璧、苏谦益等。饭后共乘龙舟游湖，上岸来到慈禧太后的大戏台，在乌兰夫的提议下，刘金、刘良威登台献艺，演出拿手好戏“打金钱”。领导同志与游园群众共同观看了演出，并在石舫前与全团同志合影留念。

呼市歌剧团在京期间，曾向各文艺团体学习并进行了艺术交流。在中国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节目，并与名演员舒绣文、李翔等艺术家在茶话会上进行座谈之后，又同中国评剧团、杭州越剧团、浙江绍剧团，共同联欢演出。评剧院的新风

霞、张德福 演出“打狱 劝夫”一折，杭州越剧团演出“风雪摆渡”，浙江绍剧团六令童，七令童演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一段。刘全、刘银威演出“打金钱”。演出后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艺术交流并合影留念。

十一、向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汇报演出

中国文联副主席田汉同志在文联小礼堂组织各协会负责人，老作家和各界知名人士，观看二人台雏形艺术初级阶段的打土滩式的演出。刘全演旦角，刘银威演丑角。舞台中间放一高桌，两边两把椅子，打扬琴的坐在中间，吹笛子的坐左边，拉四胡的坐在右边，唱丑的兼打梆子，唱旦的兼打四块瓦。那天是周治家打琴（拉塌地）张挨宾吹笛子（吹塌天），赵四拉四胡（神杖）。在一阵热烈欢乐的牌曲演奏后，唱丑的亮调然后出场亮相。动作是“金鸡独立”，耍眼珠，抿胡子。唱旦的亮调，手托高桌转身出场，亮相是“凤凰三点头”，随后整鬓，耍眼，提领子，闪腰，抽鞋，打扇子看丑角，一羞一闪腰，丑角忙上前一扶，旦角一推，相视一笑。开始走场，“天地牌子”、“半园”、“掏八字”等，都是二人台走场名，边唱边表演。就这样按打土滩时的表演法演了“怀胎”，“祝英台下山”，“五哥放羊”的片段。田汉副主席和老舍同志都十分赏识，并和刘全等几个同志在文联楼顶平台上合影留念。

歌剧团在北京期间正值十三陵水库修建之际，文化部安排全团到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并慰问演出。北京的六月骄阳似火，热的人喘不过气来，十三陵工地连棵树也没有，真是没遮没栏。正好这天是毛主席、朱德、贺龙、陈毅等中央首长来参加劳动。毛主席头戴白色草帽，穿件白衬衣，向人们频频招

手。晚上剧团为工人献艺，坝底当舞台，工人和全体观众坐在两边修好的斜坡上看。演出的小戏是“翠香记”和二人台的“打金钱”等，均受到观众们的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赞赏。

十二、内蒙百万首民歌进京汇报演出

1958年11月至12月，内蒙古文化局组织了内蒙百万首民歌进京汇报。为了配合展览演出，由刘全、刘银威，和林民歌手巴淑英三人代表汉族民歌手，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代表蒙族民歌手，还有十几位乐队同志和呼市老大娘合唱团。由布赫同志带队，又一次去到首都北京。住在东四北极阁旅馆，在北京北海公园白塔下进行展览演出，刘全和巴淑英民歌对唱，一连唱六、七首，观众仍然掌声不止。最后演出“打金钱”。后来又在北京棉纺三厂等处进行了演出。

十三、赴青海，西藏慰问演出，并参加全军文艺会演。

1959年冬天，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纠集叛匪，发动武装叛乱时，刘全受内蒙军区文工团邀请，由内蒙军区司令员孔飞同志带队赴青海地区慰问平息叛乱的内蒙军区某骑兵团及青海军民。由刘全、刘银威、李秀莲、张挨宾、温万、石风梧六人组成二人台小组，节目有民歌对唱，“十对花”、“压糕面”、“割被麦”等。并演出二人台“卖菜”，“打金钱”。在玉林子军营中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行程二万多里，演出约六十多场。

1960年9月，刘全又随内蒙军区文工团赴西藏慰问平叛部队。在内蒙军区政委席达同志带领下，他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翻过风光秀丽，水草肥美的祁连山，跨过传说中唐僧取经

路过的红似火光的火焰山，走过四大名山之一的昆仑山，登上海拔五千多公里的唐古拉山，渡过悬崖陡壁的通天河，才到达西藏首府拉萨市。在拉萨市的广场上为部队和藏族同胞做慰问演出，随后就深入部队演出，他们走到那里演到那里，从雅鲁藏布江畔，演到西玛拉雅山脚下。由于西藏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他们很不适应，呼吸困难，浑身无力。就这样，他们仍坚持演，坚持唱，从不叫苦叫累。演着演着，忽然枪声传来，部队又去围剿叛匪，枪声伴着锣鼓声，这是刘全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演出。演出节目中的民歌对唱“卖菜”、“打金钱”受到部队战士和藏胞一致地热烈欢迎。尤其是内蒙、山西去的战士，看了演出欢欣若狂，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拉着他们的手，久久不忍离去。

在拉萨大礼堂，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驻西藏军区张司令员做了专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们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在慰问期间，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召庙，金壁辉煌的——“布达拉宫”和达赖喇嘛极度豪华的公馆“罗布林卡”。然后在公馆门前的露天舞台上与藏戏共同联合演出。同时参观了文成公主的寺院。往返约两个多月。西藏反动农奴制度对藏胞非人的残酷压迫，令人触目惊心。刘全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1962年8月刘全应内蒙军区文工团邀请，再次进京参加“全国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刘全与李秀莲演出二人台喜剧“卖菜”。刘全扮演“柳青”，李秀莲扮演“二姑娘”，演出后被评为优秀节目，并在中央电视台录了相，实况播出。同时还在北京中山公园及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公演。会演结束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首长及军委领导同志接见参加全军文艺会演

的全体文艺战士，并合影留念。

刘全在军区文工团工作时，穿着军装享受着营级的待遇已经三年了。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演出深受欢迎，孔飞司令员与呼市政府交涉，要正式调刘全、李秀莲到军区文工团工作，当时的呼市市长阮慕韩同志坚持不放刘全，说啥也不同意调走，几经交涉，相持不下。有人出主意让刘全别回团上班，部队待遇比地方高，按军令升级，留在军区再提一级就是团级了。刘全正值而立之年，留在军区，搞二人台的人少，只能做个享福的演员，回剧团，二人台演员荟萃，编导、作曲人员齐备，尤其是他对二人台的酷爱，对二人台艺术矢志不渝地探索，定能取得更大的效益，于是他脱下了四个兜的军装，仍回到了呼市歌剧团，继续投入了演出工作。李秀莲调到了军区文工团，可刘全他又一次放弃调优越工作的机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十四、参加“三独”会演，“二人台”二人转再次进京汇报演出

1961年的内蒙文化局在乌兰恰特举办独唱、独舞、独奏“三独”会演。刘全参加会演，独唱了二人台“惊五更”及“爬山调”、“阳婆上来东到西”等节目。会演虽未设奖，但演出时颇受到观众的好评。

1963年12月份，内蒙文化局又在乌兰恰特举办“二人台二人转地方戏会演。”此次刘全参加了呼市歌剧团二人台改编的小戏“闹元宵”的演出。“苏小凤”、“苏母”“张老九”分别由王素珍、亢文彬、董文扮演。刘全则改演生角，扮演年青小伙子刘连城。他们精心设计了舞灯、转茶盘、舞扇及观灯的

舞蹈场面，四个名演员，配合的真可谓天衣无缝，此剧演出时效果极好，被评为优秀节目，并列为汇报演出节目又一次进京演出。团长布赫同志，副团长席宣政同志。这次到首都北京住东四旅馆，先后向中央领导及首都各界作了演出，节目有二人转的“接闺女”，二人台的“闹元宵”、“打金钱”，现代戏“邻居”，在民族宫首场演出时，观看演出的有中央文化部周扬部长、萨空了、老舍等同志。接着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政协副主席陈叔通观看了演出，接着在中央党校演出，党校校长杨献珍同志中国剧协田汉同志、杨翰笙、夏衍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在全国文联和人民大会堂先后演出三场，军委李达、杨得志、楚图南等同志也观看了演出，随后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时，陈叔通同志，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均观看了演出。每次演出结束，都受到首长们接见和鼓励。特别是演出团在西单长安大戏院公演三场时，全部戏票提前三天售完。在京期间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联欢演出“闹元宵”，受到艺术家胡朋、歌唱家马玉涛、贾世俊等同志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与此同时，演出团观看了中国评剧院演出的“会计姑娘”。河南省豫剧团演出的“朝阳沟”。并听取了常香玉同志关于戏曲表演艺术的报告。“闹元宵”在中央电台录了音，深受群众的欢迎。

十五、培养下一代，甘当人梯

1959年12月，呼市成立了艺术学校。设晋剧、歌剧（二人台）班，校长魏佩珍，副校长金玉玺（康翠铃母）。根据工作需要，刘全调艺校任团支部书记，兼歌剧班教研组长。他为二人台后继有人而高兴，在艺术实践中，尊重传统，勇于创新，

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为二人台事业献出了一片忠心，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传于后代。刘全的主课是：唱腔、身段、表演等。他因材施教，重点培养，传授技艺，严格要求。在生活处处关心学员，不但教演戏，而且还教育做人。他教导学生要讲戏德，讲台风，他呕心沥血，茹苦含辛团结同志，为歌剧团下一代培育出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在呼市艺校三年，与樊二仓等老师共同努力，到1962年调回歌剧团，同时带回来二十多名新演员，现在歌剧团的中年骨干演员底文杰及土左旗乌兰牧骑的主要演员李仁等即是呼市艺校的尖子学生。回团后除参加演出外，一直担任学员队的队长，内蒙艺校，呼市艺校的好几届毕业生分配来团又成为他的学生。

1985年刘全退下舞台后，将自己担任的角色都分别传授给年青的演员，并带着徒弟段八旺北上铁岭，再次向兄弟剧种“二人转”学习技艺，回来后加工排练，排出了第四代“打金钱”，他将艺徒扶上了成功的艺术阶梯。

十六、演出活动

刘全从十三岁出台演二人台戏，已有四十多年的舞台生涯。他除多次赴京汇报演出和到外省市巡回演出外，大部分时间活动在内蒙古西部区的广大城镇和乡村。无论是乌兰察布的大草原，还是八百里的河套川，以及鄂尔多斯草原的小村，和美丽富饶的大青山土默川一带，也不论是那遥远的边防线和生产钢铁，煤炭的厂矿区，总而言之在林区、牧区、边远山区、牧场、以及召庙、寺院、剧场、广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从党中央和国家的领袖，首长和地方各级领导同志，到各地区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各界人士，都观赏过他的精湛表演，并

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毫不自满、骄傲，而是虚心若谷，兢兢业业地钻研技艺，推陈出新，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赞誉。

1962年4月刘全随歌剧团一起，分别到宁夏、甘肃、山西、河北、内蒙东部地区作巡回演出时，他除了参加繁忙的演出外，并在业余时间和各地领导及文艺团体座谈。曾多次应邀亲自传授“打金钱”的艺技。特别是在太原市和晋剧中路梆子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牛桂英、马玉楼等同志，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李桂云同志、河南梆子（豫剧）表演艺术家崔兰田等同志与刘全、刘银威共同联欢演出，吸取经验，取得成就。

十七、“文革”挨整及重返舞台

1966年至1976年间，呼市民间歌剧团也和其其它文艺团体一样，遭受了为期十年的空前浩劫。剧团领导被打成“走资派”，批斗、隔离。刘全同志也被列为“三名三高”，是刘少奇、乌兰夫文艺“黑线”的“吹鼓手”遭到批判，并剥夺了他登台演出的权利，责令其管了服装、库房、做芭蕾舞鞋、拉大幕。二人台被定为“流氓”剧种。刘全同全团演职员一起被下放到呼市郊区茂林太生产队，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刘全也没放弃练功、练唱。他劳累了一天，仍然凌晨即起，一路小跑，来到远离村庄的旷野，练走场、练手绢、练唱腔。他坚信：总有一天会重返舞台，从古至今，哪有不唱戏的时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被禁锢的文艺事业得到了解放。二人台这个内蒙古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之花也获得了新生。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戏仍搬不上舞台，只许演现代戏。剧团下乡，刘全不登台，老乡看不到刘全的演出，气

的骂街。刘全听到耳里，记在心上，想来想去请剧团的编导写几段配合中心工作的新词，并请谱曲的同志将二人台调子稍加改动在开演前和换场时与任粉珍同志上台对唱。这一下可不得了，每次“对唱”十来支曲子，还下不了台。“对唱”成了每场演出必不可少的节目了。从此以后，刘全、任粉珍对唱的“银镰飞舞收割忙”、“赶上大车送公粮”、“对花”、“割莜麦”等节目，红极一时。内蒙电台并作为每周一歌节目，由中央台向全国播放。并参加内蒙民族民间演唱会演，获荣誉奖。

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卅周年之际，内蒙文化厅举办全区文艺调演。刘全与任粉珍的对唱参加了会演，荣获优秀奖。刘全演唱，风格独特，很受群众欢迎。他唱腔高亢、明亮，刚柔相济，虚字衬腔奇巧，吐字清晰，字正腔清，若断似续，刁字灵巧，清脆圆润，行腔委婉，优美动听。他善于把真假声巧妙的结合起来，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真声甜美，假声柔和，韵味十足，民歌风味浓郁。当一句“唛拉拉的红桥迎风飘扬”尾音未落，台下便响起热烈的鼓掌声和喝彩声。内蒙成立四十年大庆，内蒙台将他的唱腔专题介绍播出。

1979年春节，大年卅晚上，内蒙电台播放了二人台对唱专场演唱。除刘全、任粉珍对唱外，还有巴盟杭锦后旗、乌盟和呼市郊区乌兰牧骑等同行的对唱。刘全正在吃年夜饭时，他激动的放下了饭碗，为二人台的复兴流下了欣喜的泪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传统剧目大开放。歌剧团的二人台传统戏“打金钱”、“闹元宵”、“探病”、“借冠子”、“卖碗”等相继上台。唯独“走西口”无男角，搬不上舞台。歌剧团的领导经过再三研究，把“走西口”男角“太春”这一角色交给了刘全同志。刘全内心斗争很激烈，他想自己是饰演旦角

出身。而且名望较高，改演男角后，除演一些移植古装戏的袍带小生外，便是演载歌载舞，说唱相宜的火炮戏。如今自己即将退出舞台，该享清福之时，却一反常规，从新开拓戏路，要演硬唱功的男角。难度大，困难多，演不好半辈子的身誉毁于一旦。好心的同志们也劝告他，不要老也老啦干那既没把握，又会丢名誉的事。还有人说你干脆坐着吃吧！在剧团里这些年，你进过藏，过江（指赴朝）挣下了，演不演还怕缺了你的工资吗？刘全的妻子也担心他拿不下来，劝他别演这个戏了，他却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哪有我刘全的名誉。我是演员，我不怕丢名誉，我要演戏”。这简朴的几句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他在文艺表演的战线上，从未退却过。于是接受了任务，便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之中。为了演好“走西口”的男角，刘全每天摸黑起床，跑步到公园、喊嗓子、练道白、练唱腔、练动作。在一天紧张的排练中，不耻下问，不怕麻烦，不服老，不怕苦，不怕累，反复练习。晚上回到家后，仍再琢磨人物的刻化和塑造，感情的变化，争取表演完美，出新。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刘全的妻子李晓密同志。她在刘全艺术生涯中，出了不少力，献出了全部心血。可以说，刘全的成名，有着李晓密同志的很大的功绩。李晓密，原是呼市歌剧团的小生演员，他扮象儒雅端庄，表演文雅潇洒，专攻移植古装戏中的小生，是个台柱子。为了刘全在艺术上有更大的成就，全力投入二人台事业，她主动毅然地退下舞台，扔掉了多年的功底，结束了心爱的艺术生活，把家务和孩子们的一切生活琐事全部兜揽起来。这种牺牲个人事业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样，刘全便全心全意的把精力都用在学习、排练、演出上，以至迅速成名。现在刘全要演“走西口”的男角妻子更是关心备

至，每天晚饭后，教刘全表演动作及唱腔，分析剧情和表现人物的特点。帮助刘全尽快掌握了人物性格，及唱腔润腔，较完满的塑造了人物的形象。就是时至今日，每逢刘全演出，李晓密总是跟到后台，给他打鬓、包头，正这弄那的，直到演出结束，才相随回家，总结经验，以臻完美。经过刘全的刻苦努力，认真排练，“走西口”在较短的时间内排成熟搬上舞台。首场演出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与赞誉。刘全那精湛、准确的表演。高昂、清脆的唱腔，人物感情的刻化、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特别是唱道：“你哭的哥哥我心痒难道，破麻乱燥，不好活的实在难活”这句唱词时，观众每次都要报以热烈地掌声。演出的成功，连本团领导及同志们都出乎意料之外。就这样，刘全在台上演，妻子在台下看。每次演完除虚心听取同志们和观众的意见外，回家还要和妻子共同总结，找出毛病，加以改进，使其不断提高。“走西口”从开场戏演成压轴戏，并成为呼市歌剧团优秀保留节目之一。因此“走西口”、“闹元宵”都由内蒙电视台录音、录相，并经常播放。深受广大群众喜闻乐听。

十八 刘全的表演特点及演出的优秀剧目

刘全从艺近四十年，他的表演特点是，自然、洒脱、夸张而有分寸。有激情而不造作。他体会角色深刻入微，细腻严谨，从不局限导演的启示与剧本的安排。常常在演出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由表及里的推敲、琢磨，赋予角色新的生命，以至他扮的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灵活现的。

刘全从小就谦虚好学，深知艺术是无止境的道理。他尊师而不守旧；继承传统而不泥左右；博采众长而不照搬。模拟并

不是创作，吸收他人之长，要有选择地柔和到自己的艺术中去，扬长避短，为己所用。及至六十年代，艺术风格日臻成熟。在刘全成名的过程中，深得各剧种老前辈的教诲。1956年前进剧团在包头市东河区财神庙和平剧场演出时，由于剧目新颖，演员阵容整齐，竟将当时在漠南剧场演出的“水上漂”剧团（王玉山）和在黄河剧场演出的孔月卿剧团顶的退票停演。

晋剧艺术家（水上漂）王玉山老师说：“我唱了几十年的戏，没想到竟叫这些二人台娃娃顶的退了票。”这位老演员，心地善良，品格高尚，对二人台团不但不嫉妒，反而到后台看演出。看了刘全演出“打金钱”倍加喜爱，又给刘全贴片子，又帮刘全包大头，刘全便向王老师求教，王老师毫不保守，在后台讲了戏曲表演中手、眼、身、法、步等诀窍，并做了示范动作和眼神的运用。每天散戏刘全不卸装便向王老师学起走场。在很短时间里，他便向王老师学会了两套女起霸，三套剑舞，两种女骑马。1957年又向呼市名老艺人凤凰旦（王治安）学了“风台关”中的双刀枪对打及刀花下场。团里演出移植川剧“芙蓉花仙”时，刘全扮演一花仙，将双刀枪及刀花下场运用到与邪恶的芭蕉仙对打中。一口绣绒刀舞的满台银光闪闪。观众看后编成顺口溜说：“从今到古初看二人台打武”。在朝鲜演出时，向山西晋剧院著名刀马旦演员冀萍同志学习了化妆与包头。在太原与丁果仙联欢演出时，丁老告诫刘全说：“你这样年轻，名望就这样大了，千万不要骄傲”。这些名家的指导，刘全都深得教益。

刘全舞台生涯，经回顾，演出的剧目及扮演的角色分别是：“打金钱”中的马妻。“打秋迁”中的大姐姐。“打樱桃”中的旦角。“探病”中的陈翠云。“小寡妇上坟”中的小

寡妇，“小放牛”中的村姑。“挑菜”中的铁锁。“卖菜”中的柳青。“怀胎”中的兰英。“下山”中的祝英台。“闹元宵”中的“刘连城”。“走西口”中的太春。现代戏“小女婿”中陈快腿。“高三牛”中的张三女。“柳榆井”中的刺儿菜。“三湖河”中的李文华。“追书担”中的解放军。“衣锦菜归”中的会计。“山村姐妹”中的小丢儿。“五姑娘”中的寿公公等等。

有人认为刘全只能演二人台，其实不然，在一些移植剧目中，刘全都扮演了主要小生，有“乔老爷上轿”中的乔老爷，“天仙配”中的董永，“借女冲喜”中的卞福，“吹鼓手迎亲”中的席老八，“打狗劝夫”中的赵德芳，“琵琶记”中的蔡伯谐，“惊五更”中的小生，“烤火下山”中的小生等。

刘全的舞台艺术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一生中演出不少二人台风格炽热的拿手好戏。象“打金钱”、“小放牛”、“打秋迁”、“挑菜”、“闹元宵”、“走西口”，以及风格浓郁的民歌对唱，都深受观众的欢迎。特别“打金钱”更是集创作一生艺术精华的代表戏，“走西口”也是他优秀代表戏之一。在内蒙卅年大庆时，多次公演，曾在呼市新城宾馆为回乡参加庆典的乌兰夫副生席及陈锡联同志演出。在乌兰恰特为文化部黄镇部长演出。在内蒙军区为军委首长杨勇、杨德志，杨成武等领导同志演出。在呼市文化宫为老山前线英模代表团演出。也为回乡探亲的原绥远省人民政府生席杨植霖同志演出。为内蒙文联第三届全体代表演出。为全国科技代表会演出。总计先后演出超过了百余场。

刘全现在呼市文化局艺术顾问委员会工作。他是呼市歌剧团的名演员，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职称，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党

支部委员，呼市文联委员，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内蒙戏协分会会员。现在他年过半百，基本上退出舞台生涯，但他的心还是热爱二人台事业。他在顾问委员会中尽职尽责当好参谋，并不断地毫不保守的向年轻一代传授技艺。李二子、内蒙广播文工团演员郝星霞登门求教，刘全教了二人台唱腔。内蒙二人台剧团霍伴柱，乔二丽登门求教，他传授了五十年代的“打金钱”。山西阳高歌舞团来学习时，刘全传授了“闹元宵”。大同歌剧团，清水河乌兰牧骑等，都来向刘全请教学习，他有求必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1984年带徒弟段八旺，王美容赴东北吉林·铁岭艺术团学习。回来后再次加工“打金钱。”1986年呼市举办“昭君杯”文艺大奖赛时，“打金钱”参加演出，获特别奖。导演刘全获奖金。段八旺获演员优秀奖，工资浮动一级。王美容获演员奖。1989年河北、山西、内蒙三省市二人台大奖赛艺徒段八旺再次参赛演出“打金钱”获一等奖，工资浮动三级。

刘全打算继续培养下一代，为内蒙西部区的二人台艺术事业的振兴、发展、繁荣献策献计发挥余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刘全是内蒙二人台艺术的一颗光彩照人的名珠，他的技艺超群，芳香塞外。

记一生多难的贾海峰先生

吕 贵

贾海峰先生是萨拉齐县简易师范学校（即今萨一中的前身）的创始人，也是该校的首任校长。

他父为染工，幼年家境清寒。1921年毕业于绥远省立师范学校。后又考入太原党政学院。取得文凭后，他的同窗绝大部分在政界工作，唯他离开所学的专业，而从事教育工作。在萨拉齐县立一校和女子学校先后任教。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占绥远，萨拉齐县也相继沦陷。贾海峰先生在此国难当头，毅然投笔从戎，团结和联络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参加了陈之的（绥远省四大文豪之一）主建的“萨县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改属“东北推进军第二旅”，任第四团团长。驻伊盟准格尔旗，以后又任东胜县八个月县长。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几经辗转，重返故乡。

贾海峰先生于1946年，在萨县参议会任参议员。由于他热心教育事业，就一心想弃政执教，所以积极倡导，首创了萨县唯一的中等学校——简易师范。1947年春，学校开办后，中途因发生了“禁粮事件”，同年6月，他被逮捕入狱。我不多赘述，仅作些补充。

贾海峰先生，尽管与萨县简师的师生相处时间很短，却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是他的学生，对他这段往事历历在目，他对我教诲，迄今思之，言犹在耳。今就所知，着重忆述他一生的坎坷，聊表缅怀之心和崇敬之意。

萨拉齐县，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文化教育较发达，人才辈出。当包头和内蒙西部地区各旗县没有形成城市的时候，萨拉齐就是数一数二的大城了。抗战前，就涌现出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不但有上海、北京，太原等地大专院校的毕业生，而且有一部分大学生，赴美、英、日等国留学，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有的任了大专院校的讲师和教授，有的任了当时的军政要员。中级知识分子也遍及萨拉齐和其他地区。

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刚刚摆脱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的萨县十八万人民，又陷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致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征兵征粮，苛捐杂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尤其教育事业备受摧残，学校瘫痪，师资缺乏，设备破烂不堪。农村小学多属私塾，公立的寥寥无几。中等学校没有一所，中途辍学的青年遍及全县。真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中。

贾海峰办学校培育师资

1946年，贾海峰先生基于自己是个师范毕业生，同情广大的失学青年，联系了李雨田，杨明亭，吕士俊等老友向县参议会提出了倡议：办一所师范学校。办学方案一经县参议会研究，一赞成。其他参议员如周子麟等和参议会秘书胡志登先生，均表示同意，并愿协助筹建。办学宗旨是为全县中途辍学的青年，提供学习场所和深造的机会，从而来培养一批合格的师资，充实教师队伍。但阻力很大，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不予拨款，让自筹资金。为此，贾海峰先生伙同其他参议员和兴建委员会的委员，度寝忘食，不遗余力，四处奔波，千方百计筹集办学经费。利用日伪时占用过的地方，作为校舍。并根据师范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应设置的课程，物色了学有专长的教师。专职和兼职的教师都有。开始聘请。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筹备就绪。初具规模后，于1947年春开始招生。贾海峰先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使这所学校就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岁月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诞生了。

但办什么模式的师范学校，贾海峰先生和他的老友们早有计划。实行了男女兼收，不另分设，混合学制。为了便于管理

实行男女一律住校起伏。但由于经费不充足，本着一切从简，以办好学校的原则出发，校舍是简陋的民房，没有课桌，以长条凳子背后加一长条木板代替；没有课本，由教导处刻写油印，教室内不安装电灯，冬季上早晚自习让学生自备煤油灯；学生伙食，每日两餐，不是糜末烩饭带碱菜，就是莜面、煮山药蘸盐汤。每周吃一顿白面馒头。真是名符其实的“简”师。粮食不够吃或接续不上，贾校长将个人积攒的粮捐献出来，供学生食用。为了改善学生们的伙食，将自己喂的猪杀了无偿地让学生伙食吃。同学们对此，个个赞不绝口，从3月份编班上课，直到5月初基本步入正轨，教学秩序正常，师生之间和同学与同学之间，由生疏到熟悉，互相间的感情逐步趋于融洽，沉浸在愉快而欢乐的气氛中。

正如1948年7月以刘昆之名落款，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师杨明亭给“同学录”写的“弁言”（即序言）记载：“我萨位置绥中，向称本省先进县分，学校创设，为时尤早，故人材蔚起，代多俊彦。不幸，抗战期，地方一切备遭敌蹂躏之躏，而教育事业，摧残尤甚，前基尽隳，进展中绝，损失至巨，影响尤大。兴怀及斯，良堪痛惜！胜利后，无间贤愚，企识文化教育，攸关国本，图强求存，舍此奚属，敌于百废待举之中，首谋之恢复，然迭经祸乱，困难特多，计划虽周，推行匪易，而师资不敷，尤成窒碍主因。地方人士，有见及此，爰倡议从根本着手，盖欲谋教育之发达，须先培植之师资。斯即我校为适应地方需求而创之缘起也。”

迨至本校开办后，困厄多端，尤感棘手，中途复遭事故，……”。

二、大官僚勾结奸商、倒运粮食

同年5月，同学们正以喜悦的心情，刻苦学习之际，当时旱象严重，粮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城乡人民异常恐慌，贪官污吏趁火打劫，就在这荒年暴月，青黄不接之时，大官僚勾结奸商，疯狂地将天泰店，五和堂明记，复兴隆等几家大粮店囤积的粮日夜偷运外地，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此刻，一向对于劳苦大众深有感情，不畏权势，爱憎分明的贾海峰先生，抽身到乡间以参议员的身份进行了调查。从乡村返回县城后，会同李雨田先生，均以拯民之意，在县参议会上发出了紧急呼吁，“不准奸商继续贩运，禁止粮食出境”。但国民党政府当局置若罔闻。县长高云山无动于衷，不顾人民的疾苦，仍然怂恿奸商倒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贾海峰先生回到学校，向全体师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非法行为。汇报了农民缺衣少穿的悲惨情景，暗示了学生起来作反抗的精神准备。并决定当晚行动，在夜深人静之时，杨明亭老师草拟传单的内容，刘绍仁画漫画，张孝儒写标语，我和周宏达刻印传单，为利用“六三”禁烟节大会的机会，宣传禁止粮食出境，打击投机奸商做好了准备。

6月3日的拂晓，即将传单、标语、漫画张贴于大街小巷和重要机关，学校和商店的显眼地方，上午在关帝庙戏场举行了禁烟节大会。当大会议程进行到自由讲话时，贾海峰先生首先登台理直气壮地说：“今天是禁烟节，也可以说是‘禁粮节’，众所周知，最近，城里的老百姓，买米买面十分困难，乡下的粮也让奸商们买空了，如今人无粮吃畜无料，粮食如此

缺乏，竟然往外运走。时至今日，无人过问，成何体统……”接着，杨明亭老师也登台讲话，以讽刺的口吻，愤怒声讨了国民党当局，坐视不顾人民生活，怂恿粮食出境的行径。顿时使那些官吏们和奸商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台下的人群由鸦雀无声，转入议论纷纷。会后，简师的师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经过游行和宣传，车站的居民和附近沟门，威俊，吴坝，北只图，小袄兑等几个村的饥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将萨拉齐车站堆集如山待运的粮食抢了。简师学生闻此消息，立即整队出动了一部分学生赶到现场，本想劝阻群众不要乱抢，但已去的晚了，将粮抢的差不多了，就是劝阻也无济于事了。

事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了一些奸商和有利害冲突的坏人造谣说什么：“简师生集队去抢粮”；“简师必有共党分子”，“贾海峰私藏的枪枝弹药也不少”，“简师生要暴动”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罢了。

这一壮举，触怒了国民党政府当局，县长高云山为了邀功请赏，立即电告绥远省政府，说什么“萨县简师学生已暴动，是共产党人挑动起来的”。并立即命令警察局和稽查队派便衣特务，分布在学校周围监视，对贾海峰先生派专人跟踪盯梢。其实，经历多次打击报复的，不畏强暴的贾先生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对强盗们施行的毒手，随时做了应付的准备。

隔了不久，正逢“端午节”，这天学校根据学生要求放假，城里的和乡村的学生都回家过节。中午，贾海峰先生和李雨田先生与全校的教职员工会餐。不料绥远省警备司令陈光斗亲自率领一连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着七辆大卡车，来到萨拉齐

镇。顿时，全街戒严，禁止通行。立刻将简师学校包围了，四面架设机枪。此时警察局的主要官员和稽查队的陈吉山等也配合活动，早在学校附近隐蔽的便衣特务，都持着手枪，直闯学校的里院（即西院），将贾海峰和李雨田（当时是县教育科长）逮捕。这时，我正在学校，亲眼看到了临危不惧的贾海峰先生从西院走到东院，从东院出了校门，镇静自如，毫无惧色，两次从容不迫地向我们在场的同学讲：“你们不要怕，我是三不死的何文秀；希望你们安心学习好了，不要因我遇事而松懈，我姓贾的从来没做过半点亏心事，怕啥？”他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令人敬佩，他对我们的嘱咐，永远难忘。

当时，好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了贾海峰先生，登上了汽车我情不自禁地含着眼泪，几乎放声哭出，只用模糊的眼光送走了贾先生。当时稽查处设在绸缎庄“同德钰”院内（即今拐海清饭馆所在地），将贾海峰先生和李雨田先生拘留了一夜，后押送归绥市。

隔了两天，县警察局和稽查队的人员，将贾海峰先生在军队时的护兵韩生贵、贾二银二人捆绑着到了学校。当时是夜间，灯光也不亮，看到军警们逼着他俩要枪，经过搜查，甯说有枪，连颗子弹也没发现。此时军警们为了回避学生，将他俩又从学校押走，出了校门，就在操场上对韩贾二人进行毒打，逼着要枪，直打得他们死去活来，毒打声和哭叫声传到了校院里，我和几个同学站在大门里偷听，将两个小时，才平静下来。实际上只有一枝步枪，藏放在西院东寝室的炕洞里，第二天下午取出交给比日本鬼子还凶的军警，才算了事。

杨明亭老师为了自身安全，秘密逃走避难，学校也从此停课，学生解散，其他老师也很少到校。对“六三”那天街头演

讲的，张贴标语的和散传单的被警方发现，记起名字的李荣、周宏达、张孝儒、朱诚等四位同学，政府当局下令：“开除”，但校方无人理睬。同年第二学期开学，到校人数很少，无法开课。延至10月中旬，新任校长刘昆到职，杨明亭老师开始露面，学校才复课。对被开除的同学，为了减轻其他同学的压力，学校采取了不公开宣布的办法，个别通知，以转学为名离开学校。

暑期后，同学们又欢聚在一起，显得格外亲热，畅谈了别后的情景。消息灵通的同学们说：“对粮食‘禁’也罢，‘抢’也罢，无可非议，打击了投机粮商，伤害了他们的利益，缓解了饥民的紧张情绪。善良的人们都认为发生的禁粮事件是正义的。全国有不少地方的饥民被迫起来反抗已经形成高潮，不单单是咱们萨拉齐如此，反饥饿的地方多得很！”。对贾校长和李科长被捕后的消息说法不一，有的说在归绥市，有的说已解到张家口，有的说国民党当局根本没理由治他的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回来。

贾海峰先生自从47年6月被捕，先在绥远省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管押，受尽了折磨和摧残，由省军事法庭审判。每次受审，坚信自己完全正确，决心抵抗，针锋相对地反驳法官，丝毫没有让步。他对所谓的犯罪事实，一概否认，不服判决。所以从绥远解送到张家口，交国民党“张垣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理。此间，绥远省参议会会长张欣向傅作义求情，并派李致方为代表赴张垣晋谒傅作义主任请求释放。傅说：“我二十多年是从绥远起家的，绝不能把地方人士惩办了。但是，我做一天官，就不给贾海峰一天自由”。最后，法庭判决贾海峰死刑，这时，傅作义已升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已迁到北京市办公。军法处

长刘敬臣带上判决书去北京让傅总司令“画行时”，傅将判决书阅过后坦率地说：“贾海峰和我打了廿多年交道，我是知道他的，……”，说完，将判决书扔到地上，拒绝画行。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贾海峰才被释放，恢复了自由。

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后，贾海峰先生即将家眷从归绥市直接迁到包头市东河区安家落户。以开设车马店和从事兽医工作维生。他的妹夫李贵（五牛子）是内蒙著名的兽医，他把五牛子治牲畜病的经验笔录下来，边学边实践。在从事兽医工作十余年后，取得了很大效益博得东河区和包头郊区农牧民的好评。后来在东河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立了“东门大街兽医站”他担任了站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营业。

贾海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挨整被斗。被打成“漏网反革命”逮捕法办，判刑十年，送内蒙古柴磴劳改农场劳改。1975年，按照党对国民党团县级以上的人员特赦的政策规定释放了贾先生。当时人民政府拨了一部分款让他旅游参观，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照顾。贾先生回到包头市东河区与家人团聚时，时已年逾古稀，区政府根据他的年令和健康状况作了妥善安排。贾先生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对他的温暖，逢人便说，念念不忘党对他的好处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

三、久别重逢，共叙往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先生落实了政策，我和贾海峰先生历时三十三载未见面。1980年夏，我在包头东河区街头，巧遇卅年没会过面的程景华先生，在互相谈话中，提到贾海峰先生。我立即请他带我去拜见贾先生，于是他便陪我去召拐子街三号院内，找到了贾海峰先生。他当时认不出来我是

谁？经程景华先生介绍，他就夸奖我说：“我听海山说，你的书法有很大长进。我记得在简师时，任和卿去世，我拟的挽联，可能就是你给写的。”我说：“是，你老人家的记忆力真不错啊！”接着，让其孙子到饭馆买了一小盆“稍美”，让老伴炒了几个菜，共饮了欢聚酒。畅叙了阔别之情。从此，我一有机会就去探望贾先生。

1981年我由旗委宣传部调到旗政协工作，我任了文史资料专职委员以后，我与贾海峰先生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更能深入地了解他一生的坎坷，提供了方便条件。他年事已高，经历丰富，在我旗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他知道的比较详细，早在80年冬，包头市政协召开第一次文史会议时，他应邀出席参加。通过这次会议，他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文史工作做了一定的贡献。为市和区、县推荐了不少撰稿人员，为“抢救”和挖掘文史资料，提供了不少线索。

从1981年到1985年他与世长辞的几年间，我每逢去包头市参加会议或联系工作时，总要抽暇去看望他老人家。从闲谈中，得知了不少历史真实情况。

贾海峰先生于47年6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向在场的同学们说：“我是三不死的何文秀。”这是我脑海里记忆最深，也是当时难以理解的一句话。从近几年接触中，经过聊天才知道此话的寓意。

贾海峰先生谈及往事之中，对自己一生坎坷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旧社会给国民党做事几十年，遭到的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经过的生命危险太多了！何止‘三不死’呢？就在抗战的八年中，萨县的许多优秀儿女牺牲我算是一个幸存者。自从1937年9月参加了抗日，经过不少的战役。最危险的

一次，就是1940年冬在伊盟战场上。日寇不甘心失败，调动了大批的骑兵和汽车，向我率领的部队防守阵地——高龙渡口冲来。当时的战斗很激烈，我在指挥作战中，突然有颗炮弹落在我的身边而爆炸，当时震昏倒地，半截身子埋在沙土里，幸亏有跟随我的一条狗救了我的命，算是死里逃生，一没受伤，二没丧命。真危险的很。……”

接着，他谈到在伊盟东胜县任县长的一段历史。1942年部队整编后，即离开所在的团部，由专员陈应道推荐当县长。谁都知道，东胜是个穷地方，生产落后，人民生活很苦。当县长期间，时运又不佳，农业歉收，军队需要的粮草也征不够。所以我自作主张，减免了一点公粮和税收。结果触怒了伊盟警备司令陈长捷，傅作义主席立即派视察员解宝武去东胜处理这个问题，不料竟以“共党分子嫌疑”的罪名，罢了我的官。这还不算，给我带上手铐脚镣，坐上老牛烂大车，在严寒季节，送往傅部所在地——陕坝，投入监狱，严刑逼供，倍受摧残，折磨了四个多月，患了重病。因查无实据，经我的妹夫李致方（解放初期任萨县专区教育处长）的活动，由于存灏先生保释出来。要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几乎死在狱中。

贾海峰提起这桩桩辛酸往事，情绪低沉，难免伤心。我为了让他欢心，就便以清代的七品官郑板桥作了对比讲述了一番，使他立即高兴起来。我说：“您老人家好比清朝的七品县令郑板桥。他爱民如子，曾以助农民胜讼，救济灾民，得罪了豪绅而罢官。罢官后，以卖画为生，成了著名的书画家，倘使板桥先生生在今天，一定是受人民尊敬的好县长。”他说：“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祖祖辈辈留臭名，这种官不仅会降低人格，也没好下场。我当了八个月县长，宁愿自食其苦，不愿

人民遭殃。我不是这种好心肠，这次就把命送了。”

1944年春，贾海峰先生为了拯救无享受难的老百姓，意在砸开日伪的县公署和宪兵队的监狱，他率领部下突然进行了一次震动全县的“夜袭萨拉齐战斗”。那时我还在萨拉齐西营盘新的模范小学读书。这是初次印入我脑海里的“贾海峰”，因他口吃不少人称“贾夹咳”，但只闻其名，未见其面。

当时萨拉齐的情况如何？那时候的人都知道，遍地土匪，城里的人一到晚上就不敢出门，农村正在耕作季节，有骡马的庄户人一律不敢拉到地里使用。日本鬼子正在作垂死的挣扎，特务横行，以抓“土匪”为名，大肆搜捕，将大批无辜的老百姓，分别拘禁在县公署和宪兵队的监狱里。尤其是在宪兵队拘禁的人，经常被日本鬼子和特务们，动用各种酷刑，如浇开水，灌煤油，灌辣椒水，放狼狗咬，用刺刀乱戳等残害我无辜居民，更严重的成批地押到西门外官坝河槽附近杀害，这里经常发现尸体被野狗啃，刽子手就是当时萨拉齐的警察署长崔瀛。

贾海峰先生就是在这种局势下，亲自率领他的部队，先消灭了以刘明红为首的一股匪患，接着进行了夜袭萨拉齐战斗。他说：“那天晚上，我带领三十多人，从萨拉齐城墙的东南角的水道进城，打算先砸县公署的狱。没想到县公署门前约五丈高的大炮台内集聚了不少敌军警。枪炮火集中，激战了一小时也没有突破。反而引起了相距不远的宪兵队鬼子兵龟缩在门前的小堡垒内，又给我军的冲击设置了障碍，无法前进。最后在撤退时，只将为日伪政府和鬼子服务的“厚和洋行”（今邮电局住址）砸开，缴获了一些零星物品和日伪换取农民粮食的全部布匹。然后又从城墙的东南角撤出”。他又说：

“这次袭击没有按原计划完成。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侦查工作、情报工作都差，再加上寡不敌众而造成”。竟管如此，但震慑了鬼子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都乘机争权夺利，扩充势力。傅作义东进以后，命令我的部下随高理亭东进。我当时想见见马占山将军后再做决定。不料高理亭给傅写了报告说：“贾海峰不愿随他东进，集结在美岱，想投靠八路军。……”所以解除了我带领的驻守在美岱的全部兵马，都归高理亭所有。同时，顽固坚持打内战，居心险恶的高理亭，竟以投靠大青山八路军游击队的罪名，将我逮捕入狱，又把我的家抄了。拘禁了三个月后，因无证无据，才获得释放。

最后他说：“我贾海峰不是给穷苦老百姓办好事，才落了个好名声。我的同行和部下都认为我是正派人，我能活到今天，有今天的好日子过。觉得心安理得啊！”

1984年，正逢他八十寿辰。两个儿子和闺女都为他过寿做了准备。他都拒绝了，并且说“咱们的生活经常有酒有肉，每天不是白面就是大米，过与不过有何区别。”尽管他这样说了，儿女们也按原计划给办了。那天恰好我也去了。儿孙满堂、欢聚一起，为他的八十寿辰，喜气洋洋庆贺了一番，共同祝贺他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贾海峰先生是一位多难的爱国民主人士。为人忠厚，勤劳朴素，秉性刚直，不畏强暴，厌恶富豪爱护贫穷人，热心教育。抗战前后，不论萨县、固阳、包头和伊盟等地都有一定的名气，凡知道他的人，往往提起他的名来，无不称赞。

两包草药除百忧，一根银针解千疾

——记萨拉齐著名中医大夫董贵

葛子英

一、贫苦的童年

董贵原籍萨县东园村人（现包头郊区），出生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自幼家境贫寒、少吃无穿，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本村罗秃子，随母亲在罗家生活。继父养育到十岁时给地主放牧。十一岁到包头张鞋铺学习修鞋五年。1921年（民国十年）离鞋铺，参加国民第一军红十字医院当医兵三个月后离职回家，自谋职业，仍以修鞋为生。

二、发愤学医

从河南省来的一个野医生同他居住在一个屋子。这个行医先生就在本村治病（姓名不详）。董贵因修鞋收入少，就便给医生做饭、烧茶，挣点补贴度日。他看到当医生不错能赚钱，很想学医。但是，自己仅仅念了一个冬书，文化基础太差，于是每到晚上便向同居住的医生求教。这个医生只不过应付而已，就随便授些药性歌诀和简单文字。就这种问答式的学与教，医生感到麻烦便告诉他买一本“小字典”让他先认识字。董贵买到了小字典好象得到学文化的钥匙，认真学习。但一个字典怎也解决不了学习中的一切困难，逢遇上难题还是去问医生。自己苦恼，医生讨厌。这位医生认为：朽木不可雕也，有时不

理睬他。可是董贵求医心切，不耻下问，勤学苦练。医生看到他这种求知精神好，便把教过的知识试问了他一下，董贵有问必答。医生没有想到一个无文化的人竟能将所教给的对答如流，感到十分惊奇，真是天下奇才，因此感动了医生。

从此这个医生不厌其烦地耐心教育他。董贵亦下定决心努力学习。经过两年的教与学，医生又一次测验他，觉得董贵医学大有进步，并给以鼓励和赞扬。董贵提出愿拜医生为师，这位医生也同意收他为徒，于是结成师徒关系。从此董贵更加殷勤侍奉师傅。每天除给师傅做饭、烧茶外，继续努力学习，背诵药性、汤头、脉诀。攻读医书，又买了许多医书，一心一意钻研学习，但打开书本生字生词仍然很多，如同“群羊挡道”。仅查字典哪能解决这么多的生字。因为医学上有很多专用字词，如偏旁部首和医学上专用词语小字典又无详细注释，感到小字典又不能解决疑难，又买了一部《康熙字典》后，才解决了“群羊挡道”难题。后来有人遇到医学上专用字词向董贵请教，董贵立刻能回答出来。这就是他记忆特别好记得准的效果。正因为董贵他记忆力强，又勤学好问，学而不厌，刻苦钻研，所以他的老师对他十分珍爱。又经过二年的学习，他已经掌握了医学上的基础知识，并能跟随老师实习治病。首先从针灸着手，老师亲手示教，学会了针灸技巧，又通过实习两年后，那位老师年事已高，准备返回原籍安度晚年，不再行医了，便把他擅长针灸技术全部传授给董贵。

从1931年起（即民国廿年），董贵就在本村独自行医。他的实际医学效果显著，深得当地人的称赞。董贵自己仍觉得自己专务行医功夫欠深。一面修鞋一面看病，白日工作，夜间学习。这样苦心孤诣经历了五年，医疗技术逐步提高，治病效率

收效甚好。因而名声传播，周围各村无人不晓董贵的声望。从此他便专业行医。1951年迁到大城西乡苗六营村行医。1956年迁来萨拉齐城内单干行医。1957年参加萨拉齐镇中医联合医院（全国先进集体医疗单位萨拉齐镇卫生院）工作。

三、在萨拉齐镇卫生院

董大夫参加卫生院时年方五十岁。然而医疗水平较高，在群众中享有威信。患者就诊日益增多。特别是擅长针灸，而且对其它医术同样钻研。如诊断学的切脉准确，药物学钻研渊博；对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学得深透；尤其是对《医宗金鉴》学得更好。每天上午在他的诊断室排队候诊，平均每天工作量40例左右，当时全院有八位中医大夫，求他诊断的人数最多。因他服务态度好，团结群众，爱护集体，爱院如家，视病人如亲人。尽管他的工作量大也没有把他压垮，处处为病人着想，为集体着想。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中草药缺乏情况下，他使用药物灵活。比如开用一个“四物汤”，按规定以当归为主药，但市场缺此药，他改用“鸡血藤”来代替，同样能收到疗效。他不死记搬硬套。开出处方如买不到缺药，董贵再改其它草药代替，用药比较灵活。这样既解决了病人的治疗效果，又增加了医院的收入。

四、高尚的医德风范

董贵大夫对诊断学学得透彻，掌握了四诊的诀窍（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当接触病人时先切（诊脉）后问再观面色。甚至不问即告诉病人之病情，因此深得病人的信任。特别是用针灸治疗收效显著，主要

是他对针灸学研究得深透，掌握了“子午流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穴位来针灸，收到百发百中的效果。曾几位危重病人，如马子义先生之长女（回族）三十多岁时患出血病，上由鼻腔，下由阴道两处同时出血，经萨拉齐几位名中医、西医治均未见效。病情严重，拖到晚上十时许病人垂危命在旦夕。患者家属请到董贵先生，他当即出诊。他见病人面色苍白，危在眉睫，马上采用针刺急救。取主穴“风府”配穴“风池”等，病人立刻停止出血转危为安。翌日复诊作了详细检查，连服中药两剂治愈。

又有一例患者是阿刀亥煤矿工人，年六十二岁，曾在一九六六年前患脊椎劳损，肥大性脊椎炎。重度腰背疼痛，两下肢瘫痪寸步难行。曾去呼市多处治疗数月均未收效。同年返回萨拉齐到镇卫生院特请董贵大夫治疗。患者仰卧在担架上停放在他的诊断室地下；董贵大夫先对患者作了检查后当机立断，告诉几个徒弟说：写入院单办理住院手续，住院治疗。患者入院后董贵大夫主要采用针灸治疗并配合内服中药，经两个月的时间病愈出院。此人名叫邵二和现仍健在。

五、精心带徒学习

董贵大夫在工作百忙中带徒弟学医，先后教出不少徒弟。成名的有刘华、张德义、孙如云等，这三人现都在萨拉齐从事医务工作，董贵大夫教徒弟学医有一特点是：丝毫不保留的态度，耐心传教精心指导，特别在实践中找经验。治疗见效的功在何处，未收效的失败在那里，和徒弟们深钻细研总结经验，这是他认真教学的唯一特点。

董贵大夫医学理论上不够渊博，但他的实践经验丰富（临床

经验)，在治疗上十有八九的把握。尤其是对患者耐心诊治丝毫不马虎，以白求恩同志救死扶伤的精神对待工作。群众相信他，每日求他治病的患者很多，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全部看完了才下班，因为他每天上午下午迟下班半小时是平常事，连药局的调剂员也对他产生反感，但他总是废寝忘食，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诊治。深受患者的爱戴和徒弟们的敬佩。

六、董大夫的声誉

董贵是自学成名的大夫。虽然医学理论水平不高，但实践经验（临床经验）丰富。特别是针灸治疗有神效。医德风尚较高，处处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几经他治过病的人均很赞誉他的医疗精神。带领徒弟培养下一代他诲人不倦，毫不保留地传授医术。因此，董贵大夫不仅在萨拉齐地区负有盛名，在河西、后山（固阳）等地，不少人也知道他的名望，董贵大夫逝世后三四年，还有准格尔旗的患者来求他治病。

董贵大夫由于工作很认真，学习深钻细研，劳累过度，积劳成疾，不幸于1971年辞世，他年仅六十四岁。

本辑总校对：云广耀、樊文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土默特右旗文史资料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8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